

中世纪的世界
Medieval World

黑 死 病

THE BLACK DEATH

[美] 约瑟夫·P. 伯恩 / 著 王 晨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生动的历史故事，详尽的人物传略，有趣的原始文献 打开神秘的中世纪大门

黑死病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遭受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它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受影响地区有四分之一到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

在本书中，读者将了解中世纪和现代医学对这场瘟疫的看法。书中探讨了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城市、个人和艺术的影响。年表列出了灾难中的重大事件及其时间，8幅插图展现了艺术家如何描绘瘟疫对自身和社会的冲击。附录提供了12篇原始文献，其中一半是首次翻译，它们的作者目击了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布拉格、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的瘟疫。本书还附有按主题分类的参考书目指南。

上架建议：历史 文化

ISBN 978-7-5520-0254-6



9 787552 002546 >

定价：29.80 元
<http://www.sassp.org.cn>



中世纪的世界
Medieval World

黑 死 病

THE BLACK DEATH

[美] 约瑟夫·P. 伯恩 / 著 王 晨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死病/(美)伯恩著;王晨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中世纪的世界)

书名原文: The black death

ISBN 978 - 7 - 5520 - 0254 - 6

I . ①黑… II . ①伯… ②王… III . ①瘟疫-医学史
-世界-中世纪 IV . ①R51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277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Black Death*, by Joseph P. Bryn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4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CLIO, LLC.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2-435

黑死病

作 者: [美]约瑟夫·P. 伯恩

译 者: 王 晨

责任编辑: 施恬逸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254 - 6/R · 019

定价: 29.80 元

前　言

对学生们(也包括我)来说,黑死病不仅呈现了一幅非常复杂和令人着迷的中世纪画面,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镜子。1966年,政治和科技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开展了一项针对黑死病的研究,试图确定热核战争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如果苏联投放了核弹,社会是否会崩溃进而陷入混乱?研究者的结论是“否”,历史证明,即使遭受了大面积死亡和由此产生的冲击,社会和政府仍能存活下去。^[1]40年后的今天,无论历史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这样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公众都对中世纪的大瘟疫产生了更加强烈和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受到许多“新”疾病以及潜在致命时疫的威胁。自然似乎正前所未有的用埃博拉、SARS、艾滋病、西尼罗河病毒和噬肉菌威胁着人类,而炭疽、天花,甚至腺鼠疫则进入了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的武器库,当需要支持某项政治活动时就随时可能被使用。从生物学角度看,世界似乎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650年前,欧洲、北非和中东的许多地区遭受了一次生物灾难,它快速抹去了约35%的人口。也就是说,在一个1000人的大村庄里,人们在短短4个月内不得不为其中的350人挖好坟墓,让他们安息并向其致哀。兰德公司看到了它和核战的相似性。人类精神经受了巨大考验,但最后挺过了冲击并为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像中子弹一样,瘟疫摧毁了人,却对物质世界秋毫无犯。

许多历史学家关注的是1347—1352年瘟疫第一次爆发的后

果。这首次打击在心理、精神、思想、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影响是什么？直至中世纪结束，各地大约每 10 年就有一次瘟疫爆发，对此人们的反应是什么？黑死病同封建制度的衰亡以及方言文学、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关于黑死病的问题还能继续深入探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仍对这种疾病的本质和起源，传播和致死的方式、地点和原因争论不休。甚至“什么是黑死病？”这个基本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多年前的答案“由老鼠和跳蚤传播的腺鼠疫”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一位研究该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新书开篇大胆地宣称黑死病“可能是任何疾病，但家鼠携带的腺鼠疫除外”时^[2]，我们知道正统理论已经被下了战书。

在本书中，我将试图概述正统理论以及现代黑死病研究对它的挑战。这样做也许得不到明确的结论，却能体现出我们对这种疾病和它种种影响的理解正在进步，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注释：

[1] J. Hirschleifer, *Disaster and Recovery: The Black Death in Western Europe*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66), p. 26.

[2] Samuel K.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致 谢

感谢马歇尔·坡和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机会,允许我使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并帮助我获得 2002 年夏季计划的资助。还要感谢佩奇·卡特和贝尔蒙特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辞辛劳地帮助和鼓励我,为我找到更多资料。特别感谢麦琪·蒙特维尔德、帕特里克·甘、杰夫·威廉姆斯和雷·王所作的贡献,感谢 2003 年贝尔蒙特大学荣誉研讨会的 7 名会员,他们为本书的总体结构和细节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简·恰恩斯以及所有在本书诞生过程中关注过它并为其献计献策的人。

年 表

约公元前 460 年到 公元前 377 年	理性主义医学的先驱,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生活的年代,他确立了健康的实践准则。
约 130 年到 201 年	希腊-罗马时期医生盖伦的时代,他撰写了关于体液医学和瘟疫的重要著作。
541 年到约 760 年	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第一次大流行)肆虐地中海,很可能是腺鼠疫。
980 年到 1037 年	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和医学作家阿维森纳生活的年代,他对伊斯兰和基督教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260 年	意大利佩鲁贾出现最早的鞭笞赎罪者组织。
14 世纪 30 年代	中亚或戈壁沙漠地区可能爆发腺鼠疫疫情。比萨圣地公墓的《死神的胜利》绘于这一时期。
1338 年到 1339 年	中亚伊塞克湖地区的墓碑表明,巴尔喀什湖 ^① 附近可能爆发过腺鼠疫。
1347 年	卡法事件:金帐汗国札尼别的士兵被认为将瘟疫带到了这片热那亚人的殖民地。热那亚人逃往君士坦丁堡,也将鼠疫带了过去。
1347 年秋	黑死病(第二次大流行)开始,君士坦丁堡、

① 原文误作贝加尔湖。——译者注

- 1348 年冬** 亚历山大和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爆发疫情，瘟疫开始在中东、非洲和欧洲扩散。
- 1348 年春** 意大利港口热那亚、比萨、威尼斯和拉古萨，法国马赛和法属里维埃拉爆发疫情。威尼斯成立第一个卫生委员会。
- 1348 年夏** 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和佩鲁贾，法国的阿维尼翁，阿拉贡的巴利阿里群岛，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大马士革，阿勒颇，耶路撒冷和开罗都爆发疫情。对犹太人的暴行出现在法国南部和阿拉贡。
- 1348 年秋** 罗马、巴黎、里昂、波尔多、勃艮第、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爆发疫情。英格兰和德意志首次出现疫情。鞭笞赎罪运动可能开始的时间。教皇克雷芒六世谴责反犹主义者的暴行。
- 1348 年冬** 伦敦和爱尔兰爆发疫情；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城市情况开始好转；反犹主义暴力蔓延到瑞士和上莱茵，教皇克雷芒六世再次谴责针对犹太人的暴力；鞭笞赎罪运动愈演愈烈。巴黎大学医学系发布《瘟疫须知》。
- 1349 年春和夏** 瘟疫穿过英格兰向北传播。瑞士爆发疫情。维也纳和上莱茵、弗兰德斯和荷兰爆发疫情。《劳工法令》颁布。
- 1349 年秋** 挪威卑尔根、科隆和莱茵河中游爆发疫情；克雷芒六世谴责鞭笞赎罪运动。最后一次有报道的迫害犹太人事件发生在布鲁塞尔；黑死病在伊斯兰世界结束流行。

1350 年	苏格兰和瑞典爆发疫情；罗马大赦年开始；鞭笞赎罪运动式微。
1351 年	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俄罗斯西部的普斯科夫爆发疫情。继《劳工法令》之后，英格兰又颁布《劳工法条》。
1352 年	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爆发疫情。
1355 年	因为疫情造成的紧张局势，锡耶纳九人政府垮台。
1358 年	薄伽丘完成《十日谈》；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
1360 年到 1363 年	第二波疫情：法国、加泰罗尼亚、意大利、不列颠、瑞典、挪威、普斯科夫、埃及，后来扩展到德意志和波兰。
1370 年到 1374 年	第三波疫情：法国、巴塞罗那、意大利北部、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德意志、埃诺地区。
1378 年	佛罗伦萨梳毛工起义。
1381 年	英格兰农民起义。
1382 年到 1384 年	法国、加泰罗尼亚、塞维利亚、葡萄牙、意大利北部、伦敦、肯特郡、爱尔兰、中欧、波罗的海地区、莱茵兰和波兰出现疫情。
1390 年到 1391 年	勃艮第、洛林、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疫情。
1399 年到 1400 年	意大利、北欧和塞维利亚普遍出现疫情。
1410 年到 1412 年	西欧、西里西亚、立陶宛和埃及普遍出现疫情。
1422 年到 1424 年	意大利、弗兰德斯和葡萄牙普遍出现疫情。
1429 年到 1430 年	意大利和法国奥弗涅高原发生大面积疫情。

- 1438 年到 1439 年** 意大利、法国、葡萄牙、不列颠北部、德意志、瑞士、荷兰、波兰、开罗和叙利亚普遍出现疫情。
- 1448 年到 1450 年** 意大利北部、法国、德意志北部和西部、荷兰和埃及普遍出现疫情。
- 1456 年到 1457 年** 法国北部、巴塞罗那和意大利普遍出现疫情。
- 1480 年到 1484 年** 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中部、伦敦、德意志和波兰出现疫情。
- 1492 年**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
- 1494 年到 1499 年** 法国南部、意大利、阿拉贡、苏格兰、卢森堡、德意志中部、奥地利、波西米亚和波兰发生疫情。
- 1666 年** 伦敦大火。英格兰宣布瘟疫结束。
- 1722 年** 法国马赛和西欧最后一次爆发疫情，传说病源地是叙利亚。
- 1743 年** 西西里的墨西拿最后一次疫情大爆发。
- 1771 年到 1772 年** 俄国最后一次疫情大爆发，莫斯科死亡 10 万人。
- 1894 年** 第三次大流行在东南亚、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开始。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耶尔森氏杆菌。随后研制出有效的抗腺鼠疫血清。
- 1896 年到 1914 年** 深入研究确定了腺鼠疫菌的所有传染病学特征。
- 1899 年 6 月 2 日** 携带腺鼠疫菌的日本客轮停泊旧金山湾，将第三次大流行带到美国。
- 1998 年** 发现中世纪瘟疫同艾滋病免疫力存在基因上的关联。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1
年表	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瘟疫	1
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公元 541 年到约 760 年)	2
中世纪的其他“鼠疫”	5
黑死病的起源、传入和扩散	6
黑死病的影响	12
第二章 黑死病与现代医学	16
腺鼠疫	17
第二次大流行是腺鼠疫吗?	22
黑死病不仅仅是鼠疫.....?	29
第三章 黑死病与中世纪医学	35
中世纪的医生	36
中世纪的瘟疫传单或须知	38
瘟疫成因的解释	40
瘟疫和人体	46
须知中的防治方法	48

中世纪的医生与瘟疫.....	54
第四章 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59
对人口的影响	60
黑死病对经济的影响.....	65
黑死病对教会和教育的影响.....	69
第五章 对黑死病的社会心理反应.....	76
教会的规定和民间的做法	78
鞭笞赎罪者	80
对犹太社区的攻击	85
第六章 欧洲艺术与黑死病	101
艺术中的黑死病	101
代祷的艺术	105
迈斯的论文及其反响	109
第七章 开罗与佛罗伦萨的个人和政府的反应	115
埃及开罗	116
意大利佛罗伦萨	122
开罗与佛罗伦萨的比较	131
第八章 结语：黑死病的结束和对它持续的兴趣	136
黑死病和西方的想象	138

人物传略	143
阿布·阿卜杜拉·伊本·白图泰	143
查理四世(卢森堡的查理)	145
克雷芒六世(皮埃尔·罗热)	147
普拉托的弗朗切斯科·迪·马可·达蒂尼	149
帕伽玛的盖伦	152
佛里尼奥的詹蒂莱	154
利萨德-阿德·丁·伊本·阿尔-哈提卜	156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158
亚历山大·埃米尔·约翰·耶尔森	160
 原始文献	164
1. 君士坦丁堡的黑死病(1347 年).....	164
2. 布拉格诗人眼中的黑死病成因	166
3. 瘟疫机制的一种解释:腐败的空气(1348 年)	169
4. 法国的瘟疫预防建议(1348 年).....	172
5. 15 世纪一位英国诗人对预防黑死病的建议.....	175
6. 瘟疫的医学体征(约 1447 年)	183
7. 瘟疫期间遗嘱的订立:意大利普拉多(1348 年)	186
8. 黑死病动摇了伊斯兰世界:叙利亚大马士革 的景象(1348 年).....	189
9. 瘟疫和人类的堕落:叙利亚穆斯林的 观点(14 世纪 90 年代)	195
10. 15 世纪早期的一首英语诗歌对死亡的思考	196
11. 寻找替罪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约 1349 年) ...	208

12. 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瘟疫	210
名词解释	215
参考书目指南	219
疾病史研究的一般性书目	219
关于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中世纪瘟疫的一般性书目	220
老鼠、跳蚤和腺鼠疫	224
对黑死病本质的新观点	226
瘟疫与中世纪的医学	227
瘟疫的死亡数字——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	229
文化、社会和宗教影响	232
屠杀犹太人和鞭笞赎罪运动	234
瘟疫和艺术	236
瘟疫在欧洲结束的原因	238
原始文献	239
有用的工具书	240
录影带和 DVD	24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瘟疫

黑死病常指 1347—1352 年间欧洲、近东和北非爆发的那次瘟疫，一般认为是腺鼠疫(bubonic plague)。常见但不准确的说法是，该名称源于伴随疾病出现的皮肤变色，即黑斑。“mors nigra”(拉丁文，黑色死亡)一词仅见于 1350 年一首关于那次瘟疫的拉丁文诗歌中，作者是来自今天比利时地区的占星家西蒙·德·科维努斯(Simon de Covinus)^[1]。更多见于 16 和 17 世纪瑞典与丹麦文献中的是“mors atra”，意为“黑色”或者“可怕”的死亡。有人认为，英国人直到 1665 年才开始用“黑死病”一词特指 14 世纪的那次疫情，以区别于这一年爆发的人称“大瘟疫”^[2]的毁灭性疫情。不过在书面英语中，“黑死病”直到 1823 年才第一次出现在某位彭罗斯夫人(Mrs. Penrose)的历史作品里。10 年后，巴宾顿(B. G. Babington)在翻译德意志医生海克(J. F. Hecker)的《黑死病》(*Der Schwarze Tod*)^[3]时也用到了它。所以这个词被普遍使用的历史并不长。中世纪文献中，那次瘟疫有许多名字，如瘟灾、骤死病、时疫、重大死亡或死亡等等，通常要加定冠词表示特指。它衍生出许多比喻，比如穆斯林就称其为装满毒药

的杯子、入侵者的军队、箭支或刀剑、掠食动物、蛇、火或者闪电。^[4]习惯上，“瘟疫”(plague)一词可以表示各种攻击或打击，既可以是“病瘟”，也可以是“蝗瘟”，具体意思要看上下文。

但 1347—1352 年那次可怕的流行只是持续了 350 多年的一系列疫情中的第一次，这种常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以后又多次爆发，在法国直到 18 世纪 20 年代仍有出现，北美和近东的时间则更晚。医学史上一般把这一系列的爆发称作第二次大流行。流行(epidemic)指较短时间内 的单次大面积爆发，而大流行(pandemic)则具有范围广和时间长的特点，通常反复发生，造成大量死亡。19 世纪初，东亚出现了第三次大流行，但由于现代医学的研究和发展揭开了鼠疫的秘密并找到治疗方法，疫情才得到了控制。

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公元 541 年到约 760 年)

第一次大流行指公元 541 年到约 760 年间地中海沿岸，可能还有西欧的一系列爆发，很可能是腺鼠疫。由于瘟疫发生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并且主要影响的是他的帝国，所以常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资料显示，疫情开始于埃及或者更南面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 今称埃塞俄比亚)或者苏丹^[5]，然后由船只传播到君士坦丁堡、近东、意大利和法国南部。7 世纪时它可能还出现在英格兰和德意志大森林以西的北部欧洲。当时的人注意到，瘟疫开始前出现了地震、洪水、大火、彗星和日食。世俗人士相信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这样的古代医学权威的说法，将之归咎于可能由彗星、大火和地震造成的“空气的腐败”。塞维利亚博学的主教伊西多(Saint Isidore of Seville)认为，腐败

是由过度的干燥、炎热和降水造成的。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是上帝对罪的惩罚，像诺亚时代的洪水一样，是上帝怒火的爆发。著名的英国僧侣和历史学家比德(Bede)采取折中态度，他承认疾病是“创世者的打击”，“来自天上”，“遵照神的意志”，但并没有把人的罪看成原因，他反而提到英格兰瘟疫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人背教或者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6]

腺鼠疫这个诊断结果是基于中世纪文献中反复提到的死者身上的肿块，或者“淋巴结肿大”。6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os)提到肿块、发狂和昏迷的症状。6世纪晚些时候，安条克一个叫艾瓦格里乌斯(Evagrius)的律师列出了淋巴结肿大、发烧、腹泻、痛以及眼睛肿胀和充血等症状。^[7]法国图尔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在6世纪末这样描述自己的见闻：“死亡很突然。腹股沟或者腋下出现蛇状伤口，毒性发作很快，病人第二或第三天就会断气。此外，毒性还会夺去患者的理智。”^[8]腹股沟、腋下或者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是腺鼠疫的常见症状。8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写道，在意大利西北部“有人的腹股沟和其他柔软的部位出现了像核桃或者枣子那么大的腺体肿块，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发烧，第三天人就会死亡。不过如果有人熬过第三天，他就有希望活下来。”^[9]

在目击者看来，死亡人数史无前例。格雷戈里继续写道：“由于棺木很快都用完了，只好把六个或者更多的人埋在同一墓穴中。周日的圣彼得大教堂里(位于法国克莱尔蒙)停放了300具尸体。”^[10]君士坦丁堡市内和周围一片凄惨。人们出门时要贴上身份标签，以防死时没有亲友在身旁。百业萧条，田地荒芜，查士丁尼派人在金角湾(Golden Horn)对岸的加拉塔(Galata)挖了

许多大墓坑。^[11]保罗记录说在意大利“哀号遍野，泪流成河。由于传言说逃走就能躲避瘟疫，居民纷纷背井离乡，只剩下狗看管房子……儿子抛下父母还未埋葬的尸体就逃走了，父母扔下发烧的孩子不管不顾。”^[12]普罗柯比宣称君士坦丁堡死了一半人，他同时代的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①则认为高峰时瘟疫每天夺走 1.6 万人的生命，总共造成 30 万人死亡。^[13]不过他表示官方统计只有 23 万^[14]，自己的数字是推断的。现代历史学家更加保守，纳菲和斯派瑟(Naphy and Spicer)的结论是 20 万，相当于总人口 50 万的 40%，布莱顿(T. L. Bratton)同意 40% 的结论，但他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只有约 29 万，所以死亡数字约为 115 320。^[15]

显然，即使要确定某座城市的总人口，很大程度上也得靠猜测，而算出死亡率则更加困难。由于中世纪的人口记录要么缺失和不完整，要么不可靠，现代对当时人口数字的重建(包括总人口、出生、死亡和流动情况)最多只是接近。即使有像以弗所的约翰那样的作者提供了看上去具体的数字，我们也必须谨慎。有些数字只是象征和比喻，表示“大得难以置信”，有些有失偏颇，更有些的来源和可信度都有疑问。

人们尽其所能对抗疾病，有人试图用火和带香味的烟雾来净化“腐败空气”，有人祈祷并参加游行，有人使用带有神力或魔法的护身符和咒语，基督徒在房子或者其他器物上画十字，有人背井离乡躲避瘴气。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疫情复发，根据法国瘟疫史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Jean-Noël Biraben)非常细致的统计，东方又爆发了 18 次疫情，西方是 11 次。^[16]然而，如同它的

① 约 507—约 586 年，叙利亚历史学家。——译者注

开始一样突然和神秘，疾病在地中海和欧洲消失了。可能是病源后继无力，或者潜在感染者获得了免疫力，或者其他某些原因破坏了疾病的传播途径，总之在接下来的大约 600 年里西方再没发生类似的疫情。

总的来说，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大流行的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拜占庭军队受到的重创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打开了通往巴尔干和意大利的大门。同时，新兴的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从拜占庭手中夺走了对埃及、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亚美尼亚的控制权。在西欧，穆斯林在第一次大流行结束前就已经征服了西班牙和西地中海，直抵法国中部。第一次大流行重创了拜占庭，很可能延误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

中世纪的其他“鼠疫”

在第一次大流行期间的高发年份，受到瘟疫袭击的不仅是地中海世界，还有中世纪早期的伊拉克，甚至还可能包括中国。中国资料的问题是它们与疾病相关的词汇十分有限，同时缺乏像约翰·保罗·格雷戈里和普罗柯比那样的叙述性记录。不过，在将一系列伊拉克和中国的疫情记录联系起来之后，研究中国史的崔瑞德(Dennis Twichett)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两国在非常相近的年份都爆发过鼠疫，或者至少是流行病，伊拉克和中国记录的时间分别为 639—640 年和 641—648 年，684—685 年和 682 年，706 年或 707 年，763 年或 762 年，836 年或 840 年，以及 872 年或 869 年。^[17]虽然没有叙述性记录直接把中国和西方的爆发联系起

来,但上述结论清楚地暗示了疾病可能通过贸易或其他接触在两者间传播。

腺鼠疫是否在西方的两次大流行间出现过?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在1347年袭击欧洲前,那种疾病已经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不过,研究伊斯兰世界瘟疫的史学家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发现了5次可能的局部暴发:1167年和1230年在罗马附近,1244年在佛罗伦萨以及1320年和1330年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18]俄罗斯编年史在1158年到1344年间提到9次“瘟疫”,不过并没有说那就是腺鼠疫。其中1230年的记录特别引人注目: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人们在4个大墓坑中埋葬了3.2万具尸体;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6 000具尸体被埋入大墓坑,随之而来的饥荒迫使人们卖儿卖女,靠吃草和猫狗为生,甚至人相食。^[19]1317年到1321年间,反复发生的饥荒在欧洲西北部造成大量死亡,成为中世纪一幕恐怖的景象。^[20]

黑死病的起源、传入和扩散

第二章将就黑死病是哪种或者哪些疾病展开讨论。这里先说一下历史学家长久以来的观点,即黑死病是腺鼠疫或者它的近亲肺鼠疫(由同一菌种感染肺部所致)。此外,历史学家一直认为是腺鼠疫引发了第一次大流行。但是如果腺鼠疫在8世纪60年代一直到1347年都没有在欧洲和近东流行,那么它去了哪里,为什么又再次出现了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或者得到广泛认同的答案。

造成人体感染腺鼠疫的细菌一般存在于啮齿动物和寄生在它们上的跳蚤体内。在美国西南部和俄罗斯南部有这种细菌天

然的病源地，偶尔可以听到有新病例出现。但这些地方非常偏僻，人和细菌接触的机会很少。从 8 世纪 60 年代到 14 世纪中叶，在亚洲的类似地方似乎就是这种情况，腺鼠疫细菌只在啮齿动物种群内传播，但不会置其于死地。历史学家猜测，当平衡状态因某种原因被打破后，疾病就开始向东、西或者南面传播，但仍然无法确定它的源头。

至今没有发现中世纪亚洲人关于腺鼠疫的资料，而中世纪西方关于亚洲腺鼠疫的资料也欠缺可信度，它们的作者不太了解亚洲地理，而且通常不说明自己信息的来源。谈到鼠疫的源头时，有人明确表示是“中国”，俄罗斯人则宣称是“印度”，而许多人只是说“东方”，但没有人否认黑海地区是亚洲通往地中海和欧洲的门户。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同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他认为腺鼠疫的病源地很可能在云南和缅甸一带或者满洲里和蒙古地区，在元朝时这两个地区都隶属中国。^[21]另一些人认为，病源地是戈壁沙漠或者喜马拉雅山脚的加瓦尔(Garwhal)和库玛翁(Kumaon)。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认为，鼠疫起源于中国或者中国流行过腺鼠疫的证据并不充分，并且它们在时间上太晚。他驳斥了腺鼠疫可能穿越亚欧大陆中部的说法，而是将病源地放在了俄罗斯南部，疾病可能从那里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22]

传播方式同样是个谜。可能是新的人类活动(行军和殖民拓星)或者自然原因(洪水、地震)惊动了病源地的啮齿动物，导致它们迁往人类居住地并与人接触，从而造成了传染。大多数学者认为鼠疫是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军队和官员传播的。粮食包里的家鼠或者人体和衣物上的跳蚤把疾病从中国带到了西方。另一些人则认为，疾病先在不同的鼠群间传播，最后到达西方草原

上的城市区。相关的书面记录很少,现存唯一的考古学证据是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南面伊塞克地区的三块1338年或1339年的墓碑,墓中的基督徒可能死于某种鼠疫。^[23]

到达黑海后,鼠疫有了“立传者”,它的传播途径被比较可靠地记录下来。最有名且至今没有争议的版本是:钦察汗国(Kipchak Khanate)^①的军阀札尼别(Djanibeg)对热那亚商业殖民地卡法(Kaffa)^②发动进攻。1345年,他的军队感染了鼠疫。两年后,他们把带病菌的死尸抛入城中。惊慌失措的热那亚人乘船逃走时把疾病也带走了。这种说法来自意大利皮亚琴察的公证人(或者是个法律文书抄写员)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Gabriele de'Mussis),由于学者们仍然相信他是目击者,所以这一切就显得更可信了。^[24]拜占庭皇帝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史官同样提到疾病来自俄罗斯南部。从黑海来的船只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和格雷格拉斯^③(Gregoras)都记录下了它们带来的恐怖(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1)^[25]。

进入水域后,疾病开始随着船只传播。君士坦丁堡的水手、老鼠和货物把疾病带到了地中海。1347年初秋,西西里的墨西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同时受到袭击。在北非和近东它很可能水陆并进,水路依靠沿岸的小船,陆路靠士兵、朝觐者或者商人。在西地中海,人们传说,1348年1月,一艘被警觉的热那亚政府拒之门外的墨西拿商船带着瘟疫停泊到了法国马赛。有不具名的编年史学家认为这艘船后来继续往西,把疾病带到了西班牙和法

① 13世纪中叶蒙古人在咸海和里海北部建立的国家,又称金帐汗国。——译者注

② 今天黑海北岸的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1204年至1475年间,先后成为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殖民地,是繁荣的贸易口岸。——译者注

③ 约1295—1360年,拜占庭天文学家和史学家。——译者注

国的其他港口,不过这不太可能。但是,的确有其他船只很早就把疾病传播到了亚得里亚海,感染了威尼斯和它的许多殖民地。

瘟疫可能从意大利东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中部和中欧。一位弗莱萨赫(Freisach)修道院的无名僧侣为此写道:“今年(1348)的瘟疫来势凶猛,从这海蔓延到那海,许多城市、村镇和其他地方几乎都人烟绝迹。”^[26]沿着欧洲的主要水道如罗纳河(Rhône)、卢瓦河(Loire)、莱茵河(Rhine)以及波河(Po),疾病得以向内陆快速传播。不过,最新研究显示,常用的陆上通道对晚些时候德意志疫情的传播同样有效。^[27]法国历史学家和医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Jean-Noël Biraben)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瘟疫在法国境内的传播,他得出结论说1348年到1349年间疾病平均每天前进1—4公里。^[28]

我们的地图显示,瘟疫进入内陆后于1348年初到达教皇所在的阿维尼翁,并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到达巴黎。由于正在进行的百年战争,法国大西洋一侧的海岸大部分为英格兰所控制,疾病经由这里传到了不列颠,可能于8月首先到达南海岸的梅尔康姆雷吉斯(Melcombe-regis)附近。英国密集的商业和交通网络方便了疾病的传播,据估计疾病每天传播约一英里^[29],但伦敦直到1349年初才爆发疫情,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爱尔兰。意大利比萨没有像热那亚那样警觉,结果疾病于1348年1月或2月从这里侵入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地,瘟疫从春天肆虐到秋天。疾病不仅经陆路从法国南部侵入阿拉贡,还通过与法国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有海上交通的港口侵入它的沿海地区。穆斯林控制的西班牙同样损失惨重,于是人们开始疑惑上帝究竟站在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一边。

1349年,德意志莱茵兰爆发瘟疫,并沿着北海海岸扩散。这

年下半年,丹麦、瑞典、挪威和普鲁士都出现疫情,第二年春天,疫情扩散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和河流。1350年,欧洲西北边陲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Orkneys)、设德兰群岛(Shetland)和法罗群岛(Faeroes)人口锐减。同一年,丹麦和挪威殖民者放弃了格陵兰岛。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在1349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未受到袭击,这说明瘟疫并没有沿着这一带的河道向北,而是从德意志和东欧向东传播。波洛茨克(Polotsk)、普斯科夫(Pskov)、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先后受到袭击。1353年,瘟疫终于到达莫斯科。《尼科尼亞编年史》(*Nikonian Chronicle*)^①将上帝的愤怒归咎于人的罪,它记载说在普斯科夫,黑死病被称为“邪恶之疫”(mor zol),许多人逃进修道院祈求宽恕,听天由命。有的人则把全部财产捐给教会,以期同上帝和解。在莫斯科,城市主教、大公西蒙·伊万诺维奇、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安德烈都死于瘟疫。^[30]

从格陵兰到莫斯科,从挪威峡湾到伊拉克的沙漠,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人们突然陷入了痛苦和恐怖中,却无法明白这一切的原因(他们给出的原因总是错的)。圣人和罪人、婴儿和老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农民都倒在了黑死病面前。埃及历史学家阿尔-马克里齐(al-Maqrizi)惊惧不已地写道:“瘟疫史无前例,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世界各地蔓延,从东到西,由南及北。而且,它不仅感染所有的人,甚至不放过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兽。”^[31]

但死神只是刚刚登上宝座。像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见人物传略)这样生于14世纪30年代的托斯

^① 16世纪一部俄罗斯编年史,记录了公元895年到1520年的事件。——译者注

卡纳男孩一生可能会见证 5 次甚至 6 次爆发。1367 年,大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见人物传略)在一封给友人,热那亚主教圭多·达·赛特(Guido da Sette)的信中写道:

书上也记载过瘟疫,但从没见过这样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这次瘟疫已经肆虐各地 20 年了,有时候会在某些地方停止或缓解,但从未真正消失。看起来好像要结束了,但还没高兴多久,它就卷土重来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种现象标志着神对人类罪行的愤怒。如果罪消失了,神的惩罚也会减轻。^[32]

历史学家认为 1353—1500 年间欧洲大约出现了 18 次大规模的疫情。俄罗斯每 5 到 6 年就会爆发一次。^[33]多尔斯(Dols)发现,在埃及和叙利亚,从 1348 年到 1517 年的 174 个伊斯兰历年份中(穆斯林使用阴历,每年比公历的 365 又 1/4 天略短)有 58 个是疫年,平均每 5 年半一次。^[34]到 1480 年前,西欧城市中平均每 6 到 12 年就有一次疫情报告,也就是每代人碰到 2 到 4 次,此后则是 15 到 20 年一次。^[35]但并非所有的疫情都会产生相同后果。教皇的医生,雷蒙德·查尔梅里·德·维瓦里奥(Raymond Chalmelli de Vivario)记载道:“1348 年,2/3 的人口受感染,几乎都死了;1361 年,一半人感染疾病,很少有人生还;1371 年只有 1/10 人患病,许多人活了下来;1382 年,只有 1/20 的人病倒,他们几乎全都活了下来。”^[36]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但他传递了重要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发病的人数减少,而且无论是死亡率还是死亡人数都大大下降。这种现象的原因仍不清楚,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不过,即使疫情的后果相对减轻,它们仍然使得人口数在中世纪余下的时间内呈下降趋势。

黑死病的影响

本书第四章将简述学者们关于黑死病对 16 世纪前欧洲人口、经济和地理的影响。瘟疫可能造成 1/3 的人死亡，重创了欧洲的人力资源基础。欧洲一下子失去了知识、技能、经验、关系和新鲜劳动力，许多东西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才能恢复。尽管官方试图提高生育率，但直到一个半世纪后欧洲人口才恢复到早前的水平。有的村庄消失了，有的城市一蹶不振。不过，随着人口的下降，平均每个人拥有了更多的商品、财产和货币，而且由于劳力短缺，人们可以要求加薪从而进一步增加财富。英国史学家将黑死病同封建制度的死亡、市场的理性化、对教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妇女在劳动力中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最新的研究继续对过去的假设和结论提出疑问，并且更加准确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和它经历的种种变化。我们对瘟疫的真正影响了解越深，就越能理解人们对它的反应。这正是我们在做的。

人们对黑死病的反应差异很大，不过有许多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反应。影响个人反应的因素包括他的生活地点、教育水平、信仰、财富和社会流动性，或者他在瘟疫中是否失去了亲朋好友，是否相信教会或医生，是否遭受经济或社会损失。许多人的反应是祈祷、逃难、帮助病人，遵循医嘱、参加游行或迷信活动，或者把犹太人、外国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政府档案显示，官方的反应是修建新的墓地、减税、照顾孤儿和采取措施阻止疾病的流行。医学书籍提供了解释、建议、疗法和希望。法庭记录显示瘟疫导致了一系列犯罪活动，包括抢劫、袭击、遗产欺诈和盗窃。一些有文化的人在日记、书信和关于家人邻居的故事中记录下了

自己的反应以及身边的事。这些东西充斥着见闻、轶事、焦虑的流露、疑惑，在遍地的死亡和痛苦中对答案无助的探求。最后的遗嘱中写满了恐惧、信念、希望和绝望，诗人们在作品中留下了自己悲伤、愤怒、厌恶乃至悔罪。我们在绘画和雕塑中不仅可以看到死神肆虐的街道，还有信徒在祈祷庇护，感恩康复。这类作品并不限于14世纪中期，在中世纪其后的时间里甚至更晚都能找到它们，因为人们世世代代都要面对瘟疫带来的恐惧。

第五章将讨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晚期生活的社会和心理影响。第六章关注艺术和习俗中所反映的时代动荡的影响。第七章将探讨佛罗伦萨和开罗各阶层的反应，做一个关于欧洲基督教和非洲穆斯林城市中心的跨文化案例研究。最后，第八章将略述关于鼠疫为何在欧洲消失的现代理论，以及为何现代社会仍然对黑死病如此感兴趣。

注释：

- [1] Jon Steffensen, “Plague in Iceland,” *Nordisk medicinhistorisk arsbok* (1974): pp. 41—42.
- [2] Tom B. James, *The Black Death in Hampshire* (Winchester, England: Hampshire County Council, 1999), p. 1.
- [3] J. F. Shrewsbury,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7.
- [4] Michael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6, n. 2.
- [5] Christopher Wills, *Plagues: Their Origin, History, and Futur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p. 57—58.
- [6] John R. Maddicott, “Plague in Sev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156(1997): pp. 18, 37.
- [7] Pauline Allen,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49(1979): p. 7.
- [8] Jean-Noël Biraben and Jacques LeGoff, “The Plague in the Early Middle

- Ages,” in *The Biology of Man in History*, ed. and trans. Elborg Forster and P. M. Ran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7.
- [9]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trans. W. D. Foulk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p. 57.
- [10] Biraben and LeGoff, “Plague,” p. 57.
- [11] Allen, “Justinianic Plague,” p. 12.
- [12]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p. 57.
- [13] T. L. Bratton, “The Identity of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Transac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1981): p. 174.
- [14] Allen, “Justinianic Plague,” p. 10.
- [15] William G. Naphy and Andrew Spicer, *The Black Death* (Charleston: Tempus, 2001), p. 22; Bratton, “Identity,” p. 178.
- [16] Jean-Noël Biraben, “Les routes maritimes des grandes épidémies au moyen âge,” in *L’Homme, la santé et la mer*, ed. Christian Buchet (Paris: Champion, 1997), p. 23.
- [17] Dennis Twitchett, “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 59.
- [18] Dols, *Black Death*, pp. 31—32, n. 57.
- [19] Lawrence N. Langer, “The Black Death in Russia,”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1975): pp. 54—55.
- [20] William C. Jordan, *The Great Famine: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1]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5), p. 145.
- [22] John Norris, “East or West? The Geographic Origin of the Black Death,”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1(1977): pp. 1—24.
- [23] T. W. Thacker, “A Nestorian Gravestone from Central Asia in the Gulbenkian Museum,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59 Overview (1967): pp. 94—107; David Herlihy,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 Naphy and Spicer, *Black Death*, p. 31.
- [24] 该描述的翻译见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26。德·穆西斯的记录显示,当时他仍然在意大利,因此并非目击者。
- [25] Christos Bartsocas, “Two Fourteenth Century Greek Descriptions of

- the ‘‘Black Deat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1(1966): pp. 394—400.
- [26] Samuel K.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0.
- [27] Edward Eckert, *Structure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Karger, 1996), *passim*.
- [28]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eens et mediteraneens* vol. 1 (Paris: Mouton, 1975), p. 90. 比拉邦的这本书是关于瘟疫在欧洲传播的最为权威和完整的作品。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内容可参见多尔斯的作品。两本书的新版添加了部分地区 70 年代中期以后的内容。
- [29] Graham Twigg,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An Epidemiological Dilemma,’’ in *Maladies et societe (XIIe-XVIIIe siè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Bielefeld, novembre 1986*, ed. Neithard Bulst and Robert Delort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89), p. 77.
- [30] Langer, ‘‘Black Death in Russia,’’ pp. 55—56; 另可参见 Serge A. Zenkovsky, *The Nikonian Chronicle* vols. 4 and 5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1989), *passim*.
- [31] Cohn, *Black Death*, p. 100.
- [32] 出自 Cohn 的“Letters of Old Age,” X, 2, Renee Neu Watkins 的引述。
- [33] Langer, ‘‘Black Death in Russia,’’ pp. 61—62.
- [34] Dols, *Black Death*, p. 223.
- [35] Naphy and Spicer, *Black Death*, p. 81.
- [36] Cohn, *Black Death*, p. 191.

第二章

黑死病与现代医学

大多数现代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是腺鼠疫及其变种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和败血型鼠疫(septicemic plague)(它们的感染部位分别是肺部和血液)。不过,从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这个结论受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挑战。总的来说,目前关于黑死病的起因存在三种模型:

1. **黑死病是腺鼠疫。**19世纪90年代晚期和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肆虐亚洲的第三次大流行的元凶是腺鼠疫,并且很快掌握了它的特性。他们认为,自己目睹和研究的疾病正是180年前在欧洲销声匿迹的黑死病。患者淋巴结的肿大(bubon,腹股沟淋巴结炎)和快速的死亡都证明了这点。研究者从淋巴结炎联系到细菌,从细菌到老鼠,从老鼠到跳蚤再到病人,整幅图景似乎更加清晰了。的确,中世纪人生活条件原始甚至肮脏,就像科学家们当时研究的印度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一样。在他们的生活中,老鼠和跳蚤一定司空见惯,没有人会考虑把它们写进历史和医学书中,而细菌的发现是最近的事,中世纪人的眼睛看不见它们。中世纪人把一切归咎于上帝、行星和腐败的空气,有时则是犹太

人,但从没有人提到家鼠、跳蚤或细菌。在阅读中世纪关于黑死病起源、传播、持续时间、症状和死亡数字的记录时,现代学生总是从新视角出发,把它和 20 世纪的那次腺鼠疫等同起来。

2. 黑死病绝不是腺鼠疫。大约从 1980 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腺鼠疫和它的特征,试图证明黑死病不同于第三次大流行。包括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在内的研究者不再从新视角出发解释历史记录,而是把现代对于鼠疫的描述同中世纪的记录进行认真比较。他们发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区别,于是开始为黑死病寻找另一种解释。既然两者的相似点如此之少,那么或者鼠疫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或者黑死病是其他疾病。

3. 黑死病是腺鼠疫和其他疾病。在这场争论中,有人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们的依据也是中世纪的记录。简单说来,腺鼠疫和其他任何疾病都有可能。首先就是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它们由同一种细菌引起,但没有淋巴结肿块。现在该模型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可能选择。

腺鼠疫

1830 年代,德国医生海克(J. F. Hecker)提出黑死病是由地震释放的有毒气体引起的。接下去的 60 年里,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①和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②等人发展了细菌理论,细菌取代毒气成为瘟疫的元凶。1891 年,英国医学史专家查尔斯·克雷顿(Charles Creighton)将鼠疫归为一种“土壤

① (1822—1895),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② (1843—1910), 德国微生物学家,发现了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1905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中的斑疹伤寒”，由于“地下易腐败的动物组织的发酵”而比其他类型的伤寒更加危险，“这种发酵剂进入地下后，通过极化土壤中相邻的分子四处传播”。^[1]三年后，当香港、中国东部和越南爆发腺鼠疫时，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很快开始纠正自己的观点。巴斯德的学生，出生在瑞士的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见人物传略）和科赫最好的日本学生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在香港各自独立地分离出鼠疫病菌，后来被命名为鼠疫巴斯德氏杆菌（*Pasteurella pestis*）。1971年，为了纪念耶尔森，科学界将其改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简称耶氏鼠疫（*Y. pestis*）。耶尔森等人很快研制出有效的抗毒血清。1896年到1905年间，绪方正规（Masanori Ogata）和保罗·西蒙德（Paul Simond）分别在台湾和印度孟买发现了鼠疫菌同大家鼠属的黑家鼠（*Rattus rattus*）以及它们身上的印度客蚤（*Xenopsylla cheopis*）间的联系。1898年，西蒙德发现跳蚤是病菌进入人体的“注射器”。1908年，英属印度的实验证实了家鼠的角色，1914年，巴克特（A. W. Bacot）和马丁（C. J. Martin）发表的研究描述了跳蚤是如何感染细菌并把它传播给人的。^[2]尽管有了新发现和抗病血清，第三次大流行仍然在1910年到1911年间夺去了满洲里五万人的生命，1098年到1948年间印度的死亡数字超过1200万。^[3]

1925年左右，里卡多·豪尔赫（Ricardo Jorge）提出，野生条件下的老鼠或者啮齿动物种群能够作为跳蚤和细菌的地方性宿主（enzootic），三者相对和平地共处，不受人类打扰。^[4]在这类永久的“病源地”或者“病源点”内，可能是老鼠获得了天然的免疫力，对细菌拥有强大的抵抗能力，也可能是微生物对宿主无法构成足够的伤害。这类病源点在美国西南地区等地仍然存在，宿主

通常包括草原土拨鼠和松鼠。1947 年到 1996 年间,美国报告了 390 例腺鼠疫。^[5]

通常认为,印度客蚤的主要宿主,即黑家鼠或家鼠是第二次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它们特别喜欢与人共处,在房椽(尤其是茅草屋顶)等高处,或墙内和其他隐蔽地点筑窝。它们全年都能繁殖,雌性每年可生育 20 到 30 只幼鼠。这些老鼠是与人共生(*commensal*)而不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同人类“在一张桌上吃饭”。它们有领土意识,不喜欢离家很远。1951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家鼠不会离开巢穴超过 50 码(约 46 米)。^[6]所以只有当无意中被人带走时,它们才会去到远处。因为它们主要的食物是粮食,所以中世纪鼠疫通常随着运粮的船只、手推车甚至马鞍袋中的老鼠被传播。那么与人共生的家鼠怎么会感染上野生啮齿动物的疾病呢?我们只能猜测,人类和家鼠可能进入了野外的鼠疫病源地,野生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借机跑到家鼠身上。也可能是患病野鼠来到人类聚居地附近,和本地的啮齿动物群混在了一起。

携带病菌的跳蚤从家鼠身上吸血时把疾病传播给后者。没有天然免疫力和抵抗力的家鼠发病死亡后,跳蚤离开它们冷却的尸体,寻找活的新宿主。健康家鼠的身上大约有 7 只跳蚤,但当它患病变得虚弱而无力梳理毛发时,跳蚤数量可能上升到 50 至 100 只。^[7]科学家发现了约 30 种可能携带病菌的跳蚤,感染能力最强的是印度客蚤,这种无翅寄生虫体长在 1.5 毫米到 4 毫米之间,寿命不超过一年。当天气转冷,印度客蚤会进入冬眠。它们只在温暖的季节繁殖,跳蚤的卵落到鼠窝底部或者地上,幼年跳蚤以有机碎屑为食。成年跳蚤在没有吸血的情况下也能够存活长达 80 天,以谷物碎屑等有机物质为食。^[8]也有学者认为寄生

在人身上的致痒蚤(*Pulex irritans*)才是罪魁祸首,这样就不需要通过老鼠,也不要求疾病首先在鼠群里爆发了。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跳蚤并不擅长传播病菌。医学研究者托马斯·巴特勒(Thomas Butler)写道:“致痒蚤不是有效的带菌者,极少把鼠疫从某人传染给其他人。^[9]”

印度客蚤的重要特征是“菌栓”(blocking)。同其他感染鼠类的跳蚤或者致痒蚤不同,印度客蚤有个前胃^①(fore-stomach)。病鼠血液中的细菌会在这里聚集繁殖,堵塞了跳蚤的消化道,使食物无法进入胃里。这类吸食了带菌血液的跳蚤中有大约12%变得饥饿难耐,会在宿主身上叮咬多次,或者寻找新的宿主以求能够进食。一些血液会进入跳蚤的食管,同前胃中被感染的血液混合。这种含有11 000到24 000个细菌的混合物随后被吐回宿主体内,造成感染。^[10]出现菌栓的跳蚤可以存活达6个星期,但平均只在2个星期内有传染性。^[11]虽然首选是鼠类,但如果动物宿主死亡过多,它们也会寄生到人类身上。即使没有出现菌栓,受感染跳蚤的粪便也带有病菌。留在皮肤上的病菌可以通过搔破的伤口进入人体。病菌在粪便中可以存活达5个星期。一般认为,腺鼠疫在动物种群(比如老鼠)中的急性发作是它在人群中大规模爆发的必要条件。

鼠疫耶尔森氏杆菌呈卵形,自身不具备运动能力(非游动的)。它的三种生物型(biovars)是非洲发现的古代型(*antiqua*)、中亚发现的中世纪型(*mediaevalia*)以及东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东方型(*orientalis*)。它的最适生长温度是20℃到25℃间,也就是印度客蚤的体内温度,不过在更高温度下,比如老鼠和人体器

① 某些鸟类或昆虫的器官,可分泌消化酶,食物在进入胃前储存在这里。——译者注

官内,它会变得更加活跃,毒性也更强。它通过皮肤破口或者眼睛、嘴和鼻部等的黏膜进入动物或人体内。该病菌可以在宿主体内甚至适宜的土壤中存活多年,这主要是因为它能够用凝胶状外壳将自己包围起来,免受包括噬菌体等人体常规免疫武器或其他环境威胁的伤害。它在人体内活动,但并不像其他细菌或病毒那样侵入细胞,而是以每两小时数量翻番的速度繁殖。所以人类面临的是和跳蚤一样的问题,即细菌惊人的数量。“杀死宿主的完全是细菌的数量,它引起了毒性休克综合征。”^[12]

被叮咬的地方细胞死亡(necrosis),皮肤变黑,出现小肿块或脓疱。由于身体无法有效杀死入侵病菌,淋巴系统会把它们和其他废物一起带到最近的淋巴结,通常那里会产生抗体来消灭入侵者。但是,鼠疫菌通过不受限制的繁殖战胜了淋巴结。被“吞掉”的带外壳的病菌实际上利用噬菌体的有机物质复制自身,造成其大量死亡。耶尔森发现,细菌团和坏死的细胞物质在淋巴结堆积,在腹股沟、腋下和耳后形成肿块。它们在感染后的第4到第6天出现,由于周围组织变得非常脆弱,这些硬块会让人非常难受。如果淋巴系统将病菌及其他物质带到身体内部的淋巴结,可能就不会出现肿块。如果病菌在血液中快速繁殖造成败血型鼠疫的话,体表也不会有明显的肿块。它会引起循环系统崩溃、大量出血,直接损害心、肺和肾。这种病例只占几个百分点,但几乎总是致命的。

在5%—15%的现代鼠疫病例中,感染发生在肺部,即所谓的肺鼠疫。由于死亡很快,肿块还来不及形成。肺鼠疫的感染途径有两种:一是被跳蚤叮咬后病菌很快到达肺部;二是直接从空气中吸入病菌。第一种情况称为继发性肺鼠疫,需要跳蚤(或者还需老鼠)的参与。第二种情况叫作原发性肺鼠疫,病菌随着患

者的飞沫被喷溅到周围空气中,可以直接在人际传播。通常说话喷出的飞沫可达约 2 码远,打喷嚏和咳嗽可达 3 到 4 码。飞沫不会无限期停留在空气中,如果气温足够低,它们会被冻结和保存起来。新的患者可能会吸入带菌飞沫,或者飞沫落到黏膜上进入体内。耶氏鼠疫菌聚集在肺泡中,肺泡破裂后向周围释放病菌,引起肺部积血,造成新的伤口和感染点。感染物质引发咳嗽并被患者用力咳出。由于肺部无法吸入足够氧气,会出现高烧、谵妄和昏厥,同时病菌可能向身体其他部位转移。被感染后,患者大约只能活 5 天。出现明显症状后,可能只能活 1—2 天。^[13]生物学家切斯特·雷尔(Chester Rail)表示,肺鼠疫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细菌疾病”,现代病例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14]不过,对现代肺鼠疫的研究表明它的传染性并不强,即使和患者同乘一节有轨机车也不会感染。此外,已知肺鼠疫的爆发影响范围很小,可能是由于患者很快卧床不起使得病菌无法传播到远处。^[15]

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腺鼠疫? 虽然有所保留,现代学生一般还是认为“如果他们受感染机会相等的话……真正的腺鼠疫对人群中所有成员具有相同影响”。不过,玛丽·马托西安(Mary Matossian)认为,大多数种类的谷物上(尤其在高湿度的条件下)生长着有毒微真菌(mycotoxins),它们分泌的毒素很可能被西方广大地区的老鼠或人摄入。这类毒素会抑制免疫系统,很可能使人更易患上腺鼠疫,造成更多的人死亡。^[16]

第二次大流行是腺鼠疫吗?

如果黑死病真是腺鼠疫,那么两次爆发的主要流行病特征应该非常相似,除非耶氏鼠疫菌在第二和第三次大流行之间发生了

强变异。与第三次大流行的研究成果相比,现存的关于中世纪大瘟疫的信息在数量和内容上都远远不如。除了一些考古学证据,现存的都是对瘟疫和它后果的书面描述,以及一些症状的刻画,从中可以了解人们目睹了哪些症状,疫情是否在某地爆发以及如何传播,等等。而日记、编年史和官方记录则描绘了疫情扩散的速度和在某地持续的时间。从现代记录与下面的描述的相似之处来看,我们可以自信地为中世纪的瘟疫打上腺鼠疫的标签。但从两者的差异来看,两者不是同一种疾病(至少那是差异很大的另一种鼠疫):

访问阿维尼翁的教士路易·海利根(Louis Heyligen):“据说这种病有三种形式。第一种病人出现肺部感染并呼吸困难。无论是谁,不管程度如何,只要感染了就活不过两天……另一种形式除了上述症状,病人的腋下会突然出现水泡,不用多久就会死亡。第三种形式除了前面两种症状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病人无论男女都在腹股沟出现症状,然后突然死亡。”(1348年)

皮亚琴察公证人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他们感到刺痛,就像被箭头刺到那样。接下去的可怕症状是极为坚硬的水泡。有人出现在腋下,有人出现在阴囊和身体之间的腹股沟。它们越来越硬,其炎热使得病人产生急性高烧,伴有严重头痛。有时会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有时会引起吐血,恶液上升之处出现肿块……大多数人在3到5天内(死亡)。”(1348年)

巴黎加尔默罗会(Carmelite)修士让·德·维奈特(Jean de Venette):“大多数患者很少活过2到3天。他们死得很突然,昨天还看似健康的人第二天就去世下葬了。他们的腋下和腹股沟会突然出现肿块,这些东西宣告了死神的来临。”(约1360年)

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时,病人一下子觉得透不

过气，然后出现肿块或者吐血并伴有寒战，全身关节仿佛火烧。随后病人卧床不起，许多人就此丧命。”（1417年）

冰岛《洛曼编年史》（*Lævman's Annal*）^①：“病人在剧痛中活不过一两天，然后开始吐血，接着死亡。”（15世纪早期）

苏格兰阿伯丁僧侣，富尔顿的约翰（John of Fordun）：“然后，新的恐怖的死亡方式在上帝的授意下开始了。身上出现可怕肿块的病人活不过两天。”（1350—1383年间）

君士坦丁堡编年史学家克里托布洛斯（Critobulus）：“开始时，发病部位在腹股沟，症状或多或少是可见的。”（1467年）^[17]

14世纪60年代，雷丁的约翰（John of Reading）^②写道：“腹股沟和腋下爆发溃疡，垂死者为此被折磨三天。”法兰克福的迈斯特·伯恩哈特（Meister Bernhard of Frankfurt）和托纳米拉的约翰（Johannes of Tornamira）等医生都提到，瘟疫同其他发热的区别是淋巴结肿块。^[18]米尔科·格尔梅克（Mirko Grmek）引用达尔马提亚（Dalmatia，克罗地亚沿海）的编年史学家们对瘟疫的描述，指出其特点是发病快、持续高烧、淋巴结肿块、严重头痛、谵妄、吐血、死亡快和死亡率高。他还提到史学家们懂得区分腺鼠疫和肺鼠疫。^[19]

大多数作者不是医生，而是僧侣、教士和律师。他们的描述并非临床记录，而是叙述的一部分。即使这样，他们所描述的疾病的大多数症状同腺鼠疫是吻合的。的确，有的描述提到了明显的不同点，比如疮痂、小脓疱、皮疹、水泡、疹斑或痛，但这些可能

^① 即《洛格曼编年史》（*Lögmannsannál*），作者是冰岛教士埃纳尔·哈弗利达松（Einar Hafliðason）。——译者注

^② 英国圣方济各会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追随邓斯·司各脱，是奥卡姆的威廉早期的反对者。——译者注

原来就存在于病人身上,或者是由于跳蚤叮咬处的皮肤死亡、搔伤或感染引起的。从史学家们列举的黑死病症状来看,第二次大流行是腺鼠疫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历史人口学界奥雷·本内迪克托(Ole Benedictow)写道:“对于大瘟疫的临床和人口描述与现代医学对鼠疫的描述十分吻合。”^[20]支持者还指出,大瘟疫的死者常常被描绘为双臂双脚伸开,那样做可能是为了减轻腹股沟和腋下的肿胀感。

在 2002 年和 2003 年的几期英国《柳叶刀》(*Lancet*)杂志的传染病专刊中,科学家们对黑死病是否腺鼠疫展开了争论。其实这场争论在 20 多年前已经开始了。认为它不是腺鼠疫的包括历史学家康拉德·布鲁克斯(Koenraad Bleukx)和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和科学家格雷厄姆·特威格(Graham Twigg)、苏珊·司各特(Susan Scott)和克里斯托弗·邓肯(Christopher Duncan)。布鲁克斯、特威格、司各特和邓肯的结论只针对英国,科恩和伍德的范围则更广。布鲁克斯认为黑死病的“临床病理学和历史证据都不符合(腺)鼠疫的特征。”司各特和邓肯则认为“从生物学角度看,腺鼠疫在那场大瘟疫中不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列举了 20 处明显的区别。科恩说:“它可能是任何疾病,但家鼠携带的腺鼠疫除外。”^[21]从上述及其他学者的观点中可以归纳出 7 条批评主线:

首先,批评者认为中世纪的症状描述无法证明那是腺鼠疫。布鲁克斯表示斑疹伤寒(typhus)^①、霍乱、天花和炭疽也都符合描述的基本特征。科恩认为恙虫病(scrub typhus)^②、丝虫性瞿

^① 由立克次氏体造成的传染性疾病,特征为剧烈头痛、长时间高烧、抑郁、谵妄以及皮肤上红斑暴发。——译者注

^② 由恙螨病立克次氏体引起,症状为急性头痛和淋巴结带疼痛性肿胀。——译者注

丸炎(filarial orchitis)、回归热(relapsing fever)^①、疟疾、伤寒和腺热(glandular fever)^②都能引起淋巴结肿大。医学研究者史蒂芬·艾尔(Stephen Ell)列出了18种他认为与腺鼠疫症状相似的疾病,他提醒读者,只有详细的临床描述才是正确诊断的基础。另一位研究者托马斯·巴特勒提到兔热病(tularemia)^③的特征也是发热和淋巴结肿大,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脓链球菌(streptococcus pyogenes)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和某些性病也会引起急性淋巴结肿大。^[22]生物学家特威格发现炭疽也很符合特征。拥有医学和历史学双博士学位的安·卡迈克尔(Ann Carmichael)则表示反对,她认为“(除了腺鼠疫)没有哪种疾病的特征是腹股沟、腋下、颈部和耳后出现急性淋巴结增大”。不过,10年前她曾说过:“最好还是考虑各种可能的传染病,而不是用回顾性的诊断结果来解释瘟疫。”^[23]

其次,黑死病的传染性似乎比第三次大流行中的腺鼠疫强得多。即使在爆发高峰时,现代腺鼠疫的局部感染率也要远远低于黑死病时代的数字。特威格指出,中世纪的死亡率估计在20%—50%,而现代的“总体死亡率不到1%”。^[24]即使考虑到中世纪记录中夸张的成分,批评者仍认为两者差距太大了。

第三,中世纪瘟疫的地区间传播速度似乎太快了。人类学家伍德总结说:“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似乎太快了,腺鼠疫必须

① 由回归热螺旋体经虫媒传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临床特点为周期性高热伴全身疼痛、肝脾肿大和出血倾向。——译者注

② 又称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由EB病毒引起。——译者注

③ 由免热弗朗西斯病菌引起,通过蚊虫叮咬或接触受动物感染,特征是间歇热及淋巴结肿大。——译者注

首先在野生啮齿动物种群中传播”，而“它显然是直接人际传播的”。施鲁斯伯里(J. F. Shrewsbury)虽然认同黑死病就是腺鼠疫，但认为英格兰老鼠和人的密度太低，疾病不可能像描述中传播得那么快和广，人的感染率也不可能像报道的那么高。^[25]很少有学者相信老鼠或其他啮齿动物在乡间的活动速度能够解释疾病传播的速度。那么，患者是否可能在症状还未出现前带着身上的跳蚤去到另一个城镇呢？是否有足够多带菌的老鼠和跳蚤被带到欧洲、北非和近东各地，从而解释这种速度呢？批评者表示怀疑。

第四，是否各地都有足够多的家鼠作为必要的地方性宿主(epizootic)呢？批评者指出，无论腺鼠疫、败血型鼠疫还是继发性的肺鼠疫都需要老鼠和跳蚤的参与。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高纬度北欧地区存在大型老鼠种群，同样也没有西方世界出现大规模老鼠死亡的书面和考古学证据。鼠类专家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s)指出，一直以来老鼠被认为在大瘟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那仍然只是假设。他还指出，在现代印度，只有20%的局部爆发伴有大量的黑家鼠死亡。^[26]

第五，中世纪资料显示疫情全年都会发生，而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在温度下降时会进入冬眠。冬季欧洲大部分地区应该是没有疫情的，只有到春末和夏季才会重新出现肺鼠疫的病例。然而冬季爆发也很常见。戴维斯断言：“黑死病的大部分案例是传播迅速的肺鼠疫。”他还宣称淋巴结肿大同样会出现在肺鼠疫病人身上，而肺鼠疫的传播不需要老鼠参与。不过，很少有人表示赞同。施鲁斯伯里指出，肺鼠疫流行需要老鼠的维持。特威格则指出肺鼠疫在体内传播速度过快，通常来不及产生淋巴结肿大。本内迪克托引用现代数据证明，真正死于肺鼠疫的人并不

多,1910—1911年满洲里疫区只有0.4%的人口死于这种疾病。^[27]但是冬季的鼠疫一定是“肺”鼠疫吗?人或老鼠的体温是否足以保持跳蚤的活跃?炉火、羊毛和皮革衣物以及床上用品是否足以抵御寒冷?天气寒冷时人们降低了换洗衣物的频率,这可能减少了对跳蚤的干扰,帮助维持了疫情。

第六,现代腺鼠疫会在局部持续活动若干年,成为地方性疾病,而黑死病则以快得多的速度席卷不同地区,通常在4—9个月后消失,几年内不再有新的病例。

第七,批评者指出,中世纪瘟疫的致死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现代对腺鼠疫的了解无法解释这一点。中世纪对腺鼠疫没有现代医学的有效防治方法。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过去的爆发中幸存下来的人获得了免疫力或抵抗力,体内产生了对抗病菌的抗体。艾尔认为“瘟疫的幸存者获得了强大的免疫力”,但比拉邦、卡迈克尔和本内迪克托持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免疫有效期不长,因人而异,“从几个月到几年”。科恩直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他认为“现代人类宿主并没有天然或后天的免疫力”。^[28]艾尔则宣称斑疹伤寒和至少一种类型的麻风病,以及几种“很可能广泛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沙门氏菌(会引起食物中毒)让人体对腺鼠疫免疫。1348年米兰爆发的斑疹伤寒可能使人们获得了免疫力,后来这里并没有受到瘟疫的很大影响。^[29]“黑死病即腺鼠疫说”的反对者否认任何大规模的免疫,他们也一直不相信腺鼠疫病菌会发生大规模变异而导致致死性和毒性降低。不过,情况正在改变。

2001年,对耶氏鼠疫菌的全面研究和基因组序列绘制显示,病菌的基因非常活跃而且容易发生变异。司各特和邓肯宣称,鼠疫菌的高毒性和通过堵塞跳蚤前胃造成的潜在传染性都可能是

一个微小的基因变异引起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微生物学家理查德·兰斯基(Richard Lenski)，他指出，高毒性会杀死宿主从而隔绝这种变异。所以，病菌毒性会随着潜在宿主减少而降低。自然选择了那些毒性较低的种类，因为它们不会像高毒性种类那样杀死所有宿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新疫情的致死率比第一次爆发时低。司各特和邓肯不相信英格兰流行过鼠疫，认为它只发生在欧洲大陆。2000年12月，迪迪埃·拉乌尔(Didier Raoult)及其法国微生物学家团队发表了对法国蒙彼利埃一座大瘟疫公墓的研究成果。在一颗儿童牙齿和3名成人的19颗牙齿的牙髓中都发现了耶氏鼠疫菌。许多人认为该证据是决定性的，但詹姆斯·伍德表示，除非其他研究者重复此类研究，否则它的价值十分有限。^[30]

历史学家塞缪尔·科恩认为，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黑死病不是腺鼠疫，那种观点“已被推翻”。总的来说，批判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点：中世纪人描述的疾病可能不是腺鼠疫；黑死病的局部和地区间传播都要比现代腺鼠疫快得多；很少有证据表明中世纪欧洲存在足够的鼠群或者出现地方性宿主的大量死亡；冬季疫情表明存在腺鼠疫之外的其他疾病；中世纪疫情在地区间的传播速度大大超过鼠媒的腺鼠疫；已知腺鼠疫菌的特征无法解释大瘟疫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毒性降低的现象。

黑死病不仅仅是鼠疫……？

1922年，英国医学研究者里斯(W. Rees)写道：“通常认为，1348年的瘟疫……是一种毒性特别强的腺鼠疫，但这很难解释目击者描述的所有症状。”他还提示“可能同时肆虐着多种疾病”。

2001年,司各特和邓肯在谈到英国疫情时提出异议:“没有证据表明黑死病期间存在多种致命疾病。”^[31]不过,许多现代学者赞同黑死病的致死性来自腺鼠疫、肺鼠疫和其他疾病的组合,同时他们告诫不要把历史上的所有“鼠疫”都看成肺鼠疫。施鲁斯伯里认为,夏季的死亡是腺鼠疫造成的,但冬季则是斑疹伤寒、天花或者呼吸道感染。特威格则表示,夏季的死亡也仅仅是腺鼠疫造成的,还可能是其他虫媒或肠道疾病。在对15世纪疫情的研究中,安·卡迈克尔(Ann Camichael)宣称,除腺鼠疫之外,显然还有寄生虫、天花、发热和疟疾。^[32]这些“鼠疫派”和“非鼠疫派”之间的中间派虽然无法回答批评者所有的问题,但其多样性观点的确为黑死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基础。

不过,司各特和邓肯仍然坚称中世纪的英格兰没有腺鼠疫流行。他们承认同一时代在地中海或其他地方发生过流行,但英格兰的黑死病却是由一种至今未知的病毒(而不是细菌)引起的出血热,类似埃博拉病毒。它可能是人际传播的,病毒携带者有传染性但长时间不出现症状。不需要老鼠、跳蚤,无关季节,而且症状至少在理论上是相符的。实际上,中世纪英国的资料在具体症状上相当模糊。

与这种“病毒”接触后,人体可能获得了免疫力。黑死病致死率的下降可能是因为人体细胞的CCR5受体发生变异,这类受体是外部微生物进入细胞的门户,病毒侵入后利用细胞物质复制自身。变异后这些“大门”被关闭,阻止了病毒进入细胞内部,使其无法获得复制自身的物质。

这些科学家甚至宣称1348—1666年英格兰所有的疫情爆发都是由同一种“病毒”引起的。^[33]该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某些人对艾滋病毒有免疫力这一新发现。分子生物学家史蒂芬·奥布莱

恩(Stephen O'Brien)认为“历史强选择事件”(historic strong selective event)造成了细胞变异,约15%的现代白人因此受益。在他们后裔的细胞上,CCR5受体不允许艾滋病毒进入和复制。奥布莱恩的团队认为,这一变异发生在约“700年前”,很可能就是黑死病反复发作的时期。^[34]

现代医学和史学界都在认真重新考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自然灾害的起因和本质。从僧侣的记录到某个基因的变异都在被仔细研究,但是研究腺鼠疫和黑死病的学生们仍然远未达成共识。研究和讨论还将进行下去。

注释:

- [1] Charles Creighton,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 (London: Cass, 1965), 1: pp. 171—75.
- [2] L. F. Hirst, *The Conquest of Pla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08, 173, 185.
- [3] Henri H. Mollaret, “Introduzione,” in *Venezia e la peste, 1348/1797* (Venice: Marsilio Editori, 1979), p. 12.
- [4]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eens et mediteraneens*, Vol. 1 (Paris: Mouton, 1975), p. 16.
- [5] Susan Scott and Christopher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0.
- [6] David Davis, “Characteristics of Rat Populations,”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28(1953): pp. 380, 391.
- [7] Ole Benedictow, *Plague in the Late Medieval Nordic Countrie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slo: Middelalderforlaget, 1992), p. 181.
- [8] Graham Twigg, *The Black Death: A Biological Reappraisa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p. 21;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 113;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 Hirst, *Conquest*, pp. 307—16.

- [9] Thomas C. Butler, *Plague and Other Yersinia Infections* (New York: Plenum Medical Book Co., 1983), p. 51.
- [10]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57—58; Chester David Rail, *Plague Eco-toxicology* (London: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ing, Ltd., 1985), pp. 105—6.
- [11] Twigg, *Black Death*, p. 60.
- [12]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51—53; Butler, *Plague*, pp. 48, 112; quote from Christopher Wills, *Plagues: Their Origin, History, and Futur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pp. 85—86.
- [13]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 66; Jean-Noël Biraben, “Current Med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Views on Plague,” in *Plague Reconsidered* (Matlock, Derbyshire, England: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1977), p. 28.
- [14] Rail, *Plague Eco-toxicology*, p. xv.
- [15] Samuel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3; Benedictow, *Nordic Countries*, p. 26.
- [16] Ann G.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1; M. K. Matossian, “Did mycotoxins play a role in bubonic plague epidemics?” *Perspectives on Biological Medicine* 29(1986):pp. 244—56.
- [17] Horrox, *Black Death*, pp. 24—25, 42—43, 55, 84; quoted in John T. Alexander, *Bubonic Plague in Early Modern Russ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5; Benedictow, *Nordic Countries*, p. 71; Pierre Villard, “Constantinople et la peste (1467) (Critoboulos, V, 17),” in *Histoire et societe: Melanges offerts a Georges Duby* (Aix-en-Prove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e de Provence, 1992), 4:p. 144.
- [18] Horrox, *Black Death*, p. 74; quoted in Stephen R. Ell, “The Interhuman Transmission of Medieval Plagu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4(1980):p. 504.
- [19] Mirko Grmek, “Les debuts de la quarantaine maritime,” in *L’Homme, la santé et la mer*, ed. Christian Buchet (Paris: Honore Champion, 1997), p. 47.
- [20] Benedictow, *Nordic Countries*, p. 125.
- [21] Koenraad Bleukx, “Was the Black Death(1348—49) a Real Plague Epidemic? England as a Case-study,” in *Serta devota in memoriam Gulielmi Lourdaux, II: Cultura mediaevalis*, ed. Werner Verbeke et al.

-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6;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101, 356—62; Cohn, *Black Death*, p. 1.
- [22] Bleukx, “Real Plague,” p. 66; Cohn, *Black Death*, p. 58; Stephen R. Ell, “Immunity as a Factor in the Epidemiology of Medieval Plague,” *Review of Infectious Diseases* 6 (1984): p. 870; Butler, *Plague*, p. 91.
- [23] Ann Carmichael, “Bubonic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Plague, Pox and Pestilence: Disease in History*, ed. Kenneth Kiple et al. (New York: Marboro Books, 1997), p. 61; and “Plague Legisla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7 (1983): p. 517.
- [24] Graham Twigg, “The Black Death and DNA,” *Lancet: I. D.* 3(2003): p. 11.
- [25] Wood quoted in online *BBC Health News*, April 12, 2002, and in “Yersinia seeks pardon for Black Death,” *Lancet: I. D.* 2(2002): p. 323; J. F. Shrewsbury,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e. g., p. 24.
- [26] David Davis, “The Scarcity of Rats and the Black Death: An Ecological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 (1986): pp. 455—56, 467.
- [27] Davis, “Scarcity,” p. 461; Shrewsbury, *History*, p. 2; Graham Twigg,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An Epidemiological Dilemma,” in *Maladies et societe, (XIIe-XVIIIe sie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Bielefeld, novembre 1986*, ed. Neithard Bulst and Robert Delort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89), p. 97; Benedictow, *Nordic Countries*, pp. 26—27.
- [28] Ell, “Immunity,” p. 875;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p. 94; Benedictow, *Nordic Countries*, pp. 130—31; quote from Biraben, “Current Medical,” p. 29; Cohn, *Black Death*, p. 238.
- [29] Ell, “Immunity,” pp. 875—76; “Interhuman Transmission,” p. 500.
- [30]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63—65; R. E. Lenski, “Evolution of Plague Virulence,” *Nature* 334 (11 August 1988): pp. 473—74; Didier Raoult et al.,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Suicide PCR’ of *yersinia pestis* as the Agent of the Black Dea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97:23(Nov. 7, 2000): 12, p. 800; James Wood, “Was the Black Death yersinial plague?” *Lancet: I. D.* 3(2003): p. 327.
- [31] W. Rees,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and Wales,” *Proceedings of*

-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History of Medicine Section) 16 (1922—23): p. 33;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 101.
- [32] Leslie Bradley, “Some Medical Aspects of Plague,” in *Plague Reconsidered* (Matlock, Derbyshire, England: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1977), pp.18—19; Shrewsbury, *History*, p. 50; Twigg, “Dilemma,” p. 95; Carmichael, “Plague Legislation,” pp. 515—16.
- [33]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107—8, 355, 384—86, 389.
- [34] Scott and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pp. 352—54; Norman Cantor, *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World It Made* (New York: Harper, 2000), pp. 20—21.

第三章

黑死病与中世纪医学

当 14 世纪中叶大瘟疫袭击西方时,没人知道该如何防治。许多人以为自己找到了办法,但无论节食、放血、祈祷还是配制方剂都没有用。当时的疾病观念存在严重缺陷,基于它们所做的猜测自然也是有问题的。从 1348—1500 年,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科学家都写了关于大瘟疫的论文,有一些保存至今。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观念的缺陷和由此产生的几乎无用的建议。中世纪医学的失败源于其固执地迷信古代权威,不愿改变他们关于人体生理学和疾病的模型。直到 100 多年后,新的发现和发明才促成了改变。1700 年左右,虽然显微镜和望远镜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学者和医生们仍然用占星学解释大瘟疫,继续无视人眼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见的小生物。一个世纪后他们仍然认为,地震“释放”的毒气污染了空气并引发了大瘟疫。腺鼠疫的精确模型和有效疗法的发现至今只有一个世纪,而黑死病已经有 550 年的历史了。

中世纪的医生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14世纪的医生都不足以对付黑死病。当时的理论和实践主要建立在对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医生盖伦(见人物传略)的一知半解之上。他们使人类对疾病的理解从“由神引起”的神话观进步到结构合理但不乏错误的一系列纯自然解释。这些人的重要作品和拜占庭人对他们的评述被9世纪的穆斯林医学家胡纳因·本·伊沙克·阿尔-伊巴迪(Hunayn bin Ishaq al-Ibadi)和他巴格达的同事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世的穆斯林医生和作者,如10世纪的波斯人阿布·巴克尔·阿尔-拉齐(Abu Bakr ar-Razi)和阿维森纳(Avicenna)以及12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文索阿(Avenzoar)和阿威罗伊(Averroes)通过研究和治疗经验发展了这些理论。他们将占星学的理论和实践同医学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现代医学重视基因的影响,而中世纪医生们则非常重视日月星辰的影响。穆斯林医生用希腊人所说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来解释这些天体的影响。体液的平衡,即人体平衡是健康的关键,而天体则能够维持和打破这种平衡。希腊人认为其他因素,如饮食、环境甚至情绪对此同样有影响。这种观点被穆斯林采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比星星和个人星运更具可操作性。所以,伊斯兰医学融合了希腊人的错误观点和理性主义、近东的占星学和受此影响总结出的个人经验。

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所医学院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Salerno)。11—12世纪,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从非洲人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the African)和西班牙托莱多的犹太学者的翻译中吸收了穆斯林新的医学理论。1180 年,蒙彼利埃伯爵威廉七世(Count William VII of Montpellier)为法国蒙彼利埃的医学院颁发许可。1253 年和 1303 年巴黎和阿维尼翁也分别建立医学院。天主教大学的教育重哲学而轻实践,天主教本身对人体特性也不感兴趣,因此穆斯林和希腊异教徒医学并未受到多少质疑,虽然它们存在各种缺陷。西方医学的基础是组成自然万物的四种元素间的关系,比如组成身体的地水火风、它们的四种性质(冷热干湿)、四种体液以及行星和黄道对地球和个人的影响。天文学是大学的基本课程,它和占星学在许多方面没有区别,所以医科生能很方便地找到星象专家。博洛尼亚大学医科专业的正式名称是“医学和占星学”,从 1405 年起学生要修完所有数学和占星学课程。在埃尔福特(Erfurt)、维也纳、克拉科夫和莱比锡等中东欧城市的大学里同样如此。直到 1537 年,巴黎的医学和占星学才分道扬镳。^[1]

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医生们仍然相信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荒谬观点,罗马人盖伦的描述以及医学教科书中幼稚而错误的例子。学生时代他们很少看到解剖。教会首脑限制和阻挠常规尸检,因为它违反了不得故意破坏人体的禁令,即使是尸体。拉丁世界首次公开解剖发生在 1281 年的博洛尼亚,但学生们直到 30 年后才第一次解剖女尸。1316 年,蒙第诺·德鲁齐(Mondino de'Luzzi)出版了最早的《解剖传单》(*Anathomia*),但销路不佳,因为黑死病爆发前唯一开展常规解剖的医学院是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2]而许多穆斯林则相信阿威罗伊的说法,“完全了解了人体的解剖和生理,就会增加对真主的信仰”。^[3]黑死病时代的阿比·贾法尔·艾哈

迈德·伊本·哈提玛(Abi Gafar Ahmed ibn Khatimah)将医学定义为“通过研究和实验维持和恢复自然平衡”。^[4]然而,尽管拥有先进理念,穆斯林医生对大瘟疫同样束手无策。和有的学者认为的不一样,中世纪医学的无知和无能不只是天主教会的专利。

欧洲基督教世界医疗条件最好的地区是意大利,那里的城市和乡村都有医生。^[5]大瘟疫爆发时法国有约1700名医生,其中100名在巴黎,这已经是前一个世纪的大约3倍了。^[6]但许多法国医生只为贵族家庭而不是公众服务,而意大利城市中的医生则组成行业公会,热心公众生活并为所有人服务。许多英国医生都有在帕多瓦或巴黎学习的经历,他们更类似法国同行,只在15世纪20年代有过短暂的组织。^[7]行业公会监督成员表现并处理行医违规的投诉。在意大利等地,医生公会保证了职业团结和行医规范。大多数国家既有大学培养的医生,也有学徒出身的“理发师外科大夫”,他们提供从接骨到小手术的大多数医疗服务。无论哪种行医者都离不开药剂师,他们准备和提供医生开出的各种草药、矿物、药丸和方剂。尽管没上过大学,药剂师还是受尊敬和有影响的职业,医生的成功离不开他们。在大多数地方,人们还可以找到巫医、接生婆和其他非职业医疗服务提供者,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医生,后者只是因为受过教育才享受那么高地位的。

中世纪的瘟疫传单或须知

医学须知(consilium)是医生向索要者派发的正式书面通告,内容一般是解释和建议。有的简短,也有的是复杂的长篇大论,目的是向特定的非学术受众宣讲某个医疗问题。黑死病期间的

大量须知是了解中世纪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窗口。

1910—1925 年间,德意志医学史专家卡尔·苏德霍夫(Karl Sudhoff)收集和出版了 200 多种中世纪晚期医生所写的瘟疫防治须知。他提到和刊出的共有 288 种,但根据历史学家塞缪尔·科恩的最新推测,1348—1500 年间可能有多达 1 000 种此类须知。^[8]显然,这在当年是重要的书面材料,至今仍然如此。许多拉丁文须知被译成了各种方言,1454 年后,印刷术让它们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18 份已知确切日期的须知写于疫情爆发初期,而当巴黎大学医学系和兰斯(Reims)的医生皮埃尔·德·达姆齐(Pierre de Damouzy)的须知发布时,其作者甚至还没有亲眼目睹过任何病例。

达姆齐题为《论流行病》(*Treatise on epidemic*)的须知列出了他治疗其他疾病的方法,作者大胆宣称:“瘟疫时可以用它(该疗法)保住性命。”^[9]实际上,该疗法来自波斯人阿尔-拉齐(ar-Razi)。达姆齐的须知中随处可见对亚里士多德、盖伦、阿维森纳和阿拉伯的阿里·阿巴斯(Ali Abbas)等人作品的引用,但只有盖伦曾目睹过瘟疫(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时期的那次)。黑死病肆虐法国南方时,腓力六世要求巴黎大学医学系发布疾病须知《流行病概要》(*Compendium de epidemia*),这是该学院最早的重要学术作品。1348 年 10 月瘟疫肆虐巴黎时,撰写委员会发布了《概要》。同达姆齐的须知一样,它也大量引用了希腊和穆斯林医学权威的观点。它在法国极受欢迎,很快被翻译和节录,甚至在 1425 年被奥利维耶·德·拉耶(Olivier de la Haye)改编成诗体。

《概要》文稿还影响了西班牙、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波兰的作者,直到 17 世纪还有人传抄。以巴黎的《概要》为基础,布

拉格的皇家医生加鲁斯大师(Master Gallus)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 见人物传略)写了须知, 并为摩拉维亚(Moravia)^①侯爵写了简化版的“疾病防治措施”^[10]。1349年5月19日, 蒙彼利埃一位匿名“行医者”批评了巴黎大学的须知, 他可能来自敌对的大学。由于瘟疫袭击蒙彼利埃时他正在那里, 目睹了医学系全部成员的死亡, 所以他的分析和建议出于经验, 应该要胜过巴黎人纯粹的猜测。不过, 尽管他引用更多的并非医学权威, 而是亚里士多德、占星家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得和教皇格雷戈里一世, 他仍然和别人一样迷信医学传统和古代权威。为了“惠及众生”和“被爱和众人的赞美所感动, 要保护这所大学和向它致敬”, 佩鲁贾大学的佛里尼奥的詹蒂莱(Gentile of Foligno, 见人物传略)写了意大利最早的须知。^[11]阿方索·德·科尔多瓦(Alfonso de Cordoba)、勒里达的哈克梅·达格拉蒙特(Jacme d'Agramont of Lérida)和塞维利亚的胡安·德·阿维尼翁(Juan de Aviñón of Seville)等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医生则以古代权威和詹蒂莱、伊本·哈提玛这些同时代医生为基础, 用方言为同胞撰写了须知。

瘟疫成因的解释

由于瘟疫须知的流行和对希腊及穆斯林医学思想的继承, 基督教和穆斯林医生对瘟疫成因及防治手段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科学, 即“自然哲学”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四因说。比如, 椅子的存在必须有四种“原因”: 制造者、形状的规划

^① 欧洲古代王国, 位于今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译者注

或图纸、材料和制造的目的。除了上帝,一切都能用且必须用四因解释。大多数须知一开始就讨论了瘟疫的成因并隐含了类似的归因方式。最终的“制造者”是上帝,但也有人不愿承认这点,转而归咎于撒旦或敌基督。瘟疫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惩罚基督徒的罪。至于形式因和质料因则由医生而不是神学家来解释。在医生们看来,在自然原因之外再接受形而上学的原因不仅事关宗教信仰和忠诚,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了维系着整个西方知识体系的哲学框架。^[12]多因说被普遍接受,人们并不像现代学者那样把它看作大杂烩。

认为上帝会用瘟疫惩罚恶人和敌人的观点牢牢植根于《圣经》中。《出埃及记》中,法老拒绝把摩西和希伯来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结果导致埃及遭受了七次“灾疫”。《撒母耳记下》中,大卫违反上帝禁令,清点了希伯来百姓的人数,他选择三日瘟疫作为惩罚。《撒母耳记上》中,偷了希伯来约柜的人患上了痛苦的“痔疮”,很像是淋巴结肿大。“罪”会在今生或来世受到惩罚,肉体上的痛苦对精神是有益的。在法国维埃纳(Vienne),后来成为瘟疫受难者文化写照的“不洁”的麻风病人在被与健康人隔离开之前要参加一种宗教仪式,仪式上会说“上帝想要惩罚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因此赐给你这巨大恩典。所以,对你的病要有耐心”。^[13]今生受到的惩罚会减轻死后的惩罚,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麻风病被看作神的恩典。虔诚的穆斯林把死于瘟疫的正直和神圣的人看作殉道者,死亡把他们直接带上天堂。但多数人还是相信,上帝主要的目标是恶人,就像诺亚时代的洪水一样。就像圣经《诗篇》(7:11—13)中写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箭支成为疾病

的主要隐喻并非偶然。

基督教神学宣称人都有罪，所以受苦是应该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拯救他们。教士们常常强调这点。1349年夏天，约克大主教祖施(Zouche)在给教区居民的公开信中写道：“众所周知，现在死亡、瘟疫和空气腐败正威胁着世界各地，特别是英格兰。这显然是由人类的罪引起的，他们生活无忧时就忘记了那原本是至高无上者的恩典。”那么如何解释许多孩子也遭了殃呢？一篇布道如此回答：“上帝每天杀死孩子，可能是惩罚他们对父母的不敬。因为古代(希伯来)法典规定，孩子反抗和不顺从父母要被处死。”这样的想法来自主教或布道者不足为奇，但世俗基督徒同样深信不疑。皮亚琴察的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Gabriele de' Mussis of Piacenza)在《疾病史》(*Historia de morbo*)中写道，上天的法官看见“整个人类都在各种罪的泥沼中翻滚，陷入犯罪，追逐数不尽的邪恶，因为恶的无穷力量而沉没于堕落之海，丧失所有的善，不再害怕上帝的审判，不论罪恶多么可憎可恶，他们都追随着它”。上帝发出了正义的雷霆之怒：“我宣判，你们的欢乐会化作哀恸，好运变成逆境，你们的生命之旅将永远处在恐怖中。看着死神的样子！看着我打开炼狱的大门！”^[14]伟大的法学家，萨索菲拉托的巴托鲁斯(Bartolus of Sassoferato)也认为瘟疫是神的报应，甚至瑞典国王玛格努斯二世(Magnus II)也写道：“因为人的罪，上帝用这种猝死作为惩罚，杀死了我们大多数的同胞。”^[15]

医生们同样认为上帝参与了瘟疫。巴黎的《概要》虽然也承认这一点，但它还认为上帝会赐予人们治病的药品和医生。为此，有的医生要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医治恶人是否违背上帝的意志，或者药品是否对坏人无效呢？意大利修士和医生乔瓦尼·

达·鲁佩西萨(Giovanni da Rupescissa)认为,瘟疫这种惩罚工具有欠准头,虽然坏人无论如何也是治不好的,但好人会“连带受害”,所以防治对后者来说是必需的。由于医生无法区别两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得到治疗。^[16]无论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都相信上帝会自行决定杀死哪些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能康复而有人根本不生病。1411年,德意志医生海因里希·拉姆(Heinrich Lamme)写道:“最好认为瘟疫来自上帝,而不是附和道听途说的各种观点。”不过,他仍对上帝和魔鬼哪个才是真正凶手存疑。1528年,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医学作家昂布鲁瓦斯·帕雷(Ambroise Paré)表示,“瘟疫是来自上帝的疾病,它是人类和许多动植物的疯狂、凶猛、迅速、恐怖、传染性强、凶恶、狡猾而致命的敌人”。直到1668年,法国鲁昂(Rouen)的医生们仍然宣称上帝的愤怒是大瘟疫的根源。^[17]如此致命并带来审判日般痛苦的东西不可能是凡间的。

但不是凡间的也可能来自天上,而不是天堂,也就是与星星有关。占星学在中世纪医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人们迫切地仰望着星空。但罗切斯特大主教托马斯·布林顿(Thomas Brinton)这样的教会人士认为,忽视造物主的愤怒和人类的责任是错误的:

今天的纵欲和恶念要超过诺亚时代,现在的千种罪行那时还没有,索多玛的罪泛滥无边,今天君主的罪尤甚大卫之时。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之鞭归咎于行星和元素,而是要归于我们的罪,就像《创世记》说的:“我们的痛苦是应得的,因为我们犯了罪。”^[18]

这是写给那些忽视了更基本的神学原因的人的,而不是对占星学本身的驳斥。出于两个原因,西班牙穆斯林的伟大医生们却

回避讨论占星学,利萨德-阿德·丁·伊本·阿尔-哈提卜(Lisad-ad Din ibn al-Khatib,见人物传略)常常反对占星学,他认为星星不属于医学范畴。而伊本·哈提玛(Ibn Khatimah)则认为不论星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对其了解都太少了。许多基督徒医生喜欢从天体原因着手,也许因为那属于自然而不是超自然层面,他们因此可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9世纪的阿拉伯人阿尔布马萨(Albumasar)为这类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大会合(Great Conjunction),即大行星在某个黄道星座的方位与地球连成一线,会在地球上引发极端的自然和政治事件。13世纪巴黎大学的自然哲学家,“伟大的”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赞同此观点,他在《论原因和元素属性》中写道:“火星和木星的会合引起瘴气,特别是处在黄道上的暖湿星座时。”木星是“潮湿的”行星,它把地球上的水蒸气引向天空。火星的性质是“温暖而干燥的”,它“点燃升起的蒸汽,引起闪电、火花、有毒的蒸汽和火”。^[19]这个机械物理的解释将天体力量同大气现象清楚地联系了起来。包括受命撰写须知在内的巴黎专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这种解释。1350年,列日的神父西蒙·古万(Simon Couvin)^①在一首叫《土星宴席上对太阳的审判》的寓言诗中把人类放上了审判席。土星(农神)指控人类违反自然道德,木星(朱庇特)则为他们辩护。作为上帝的代理,太阳判人类有罪并用瘟疫作为惩罚。朱庇特的妻子朱诺试图干预,但她和善意的医生们一样失败了,人类遭受了灾难。^[20]除了大会合(比如巴黎专家记录的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那次),其他天文现象如日月

① 也作 Simon de Covinus 或 Simon de Covino,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西蒙·德·科维努斯。——译者注

食、彗星和流星雨也被认为能造成影响，至少也是灾难来临的征兆。

占星学理论（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2）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被看作科学而不是神话或宗教。其信徒包括路德宗的先驱梅兰希通（Melanchthon）和奥地利大公查理二世之女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Austria）的私人医生。1629 年，法国御医把前一年的瘟疫爆发归咎于“星座不吉，天体会合和月食”。1679 年奥地利御医索尔拜（Dr. Sorbait）将爆发归咎于土星和火星的会合，而直到 1785 年还有法国科学家把矛头指向月亮。^[21]

此类理论也不乏批评者。有人指出，会合在过去也曾出现，但并未带来类似的恐怖结果。德意志的康拉德·冯·梅根伯格（Konrad von Megenberg）^①抨击这种理论时表示，会合只持续一两年，但瘟疫却持续了 5 年。他还指出星星遵循严格的轨道，而瘟疫则漫无目的地在各地肆虐。反讽的是，在另一部作品《自然之书》中他却承认火星、木星和土星的会合引起了地下沼气积聚，释放到空气中后造成瘟疫的生灵涂炭。^[22]

无论人类与上帝或天体的关系如何，大多数医学家都赞同瘟疫的直接原因是有毒的空气或者瘴气。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认为瘟疫是由有毒空气引起的，或者更准确的说，瘟疫就是有毒空气。盖伦把瘴气同人的疾病直接联系起来，认为空气影响了体液平衡。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接受了希腊人的观点，这也是中世纪西方医生的正统模型（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3）。围绕着瘴气的成因有多种解释，但彼此并不矛盾。有人赞同“伟大的”阿尔伯特，将其归咎于“被点燃的”空气；有人和康拉德一样，认为那是沼气。

① 1309—1374，德意志天主教学者，作家。——译者注

包括巴黎的专家们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地下有毒气体被释放出来。编年史学家常常把欧亚地震同瘟疫起源联系起来，现代历史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指出 1410 年、1413 年和 1448 年在巴塞罗那以及 1485 年在昂热（Angers，法国西部城市，曾是安茹帝国的首都），瘟疫爆发前的确发生过地震。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地震可能干扰了病源地的啮齿动物，导致它们把疾病传播到人身上。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警告说南风是不健康的，同样的还有沼泽、腐败植物、粪堆、化粪池、下水道和动物腐尸“散发”的气体。黑死病之前整整一个世纪，法国贵族让·德·儒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就注意到战争后大量尸体的腐烂会产生有毒气体。14 世纪中期的西方战争很常见，而谁又知道会有什么战役在亚洲广阔的平原上留下大堆蒙古人、中国人或是印度人的尸体呢？佛里尼奥的詹蒂莱（Gentile of Foligno）认为瘴气可能是南风带来的，但也可能是打开了本地长期封闭的洞穴、水井甚至房间或屋子。当我们周围的洁净空气被“点燃”或是被任何毒气污染时，它会变得致命。

瘟疫和人体

阿维森纳在《医典》第四卷中详细地描述了瘴气如何影响人体：“腐败气体到达心脏后会侵蚀它灵魂的成分，包围并腐蚀它。然后不自然的暖意散布全身，引起瘟热。可以传染给任何易感的人。”^[23]詹蒂莱认为瘴气通过肺和毛孔进入人体。通过影响体液，它在心肺周围产生有毒物质。心脏周围的毒素可以致命，而如果毒素进入肺，它可以被呼出从而感染其他人。医生们把淋巴

结肿块看成毒物的积聚点。伊本·哈提玛提到肿块出现在颈部、腋下和(或)腹股沟。他解释说被感染血液的黏稠度决定了它会在哪里积聚,最轻的在耳朵附近,最重的“被沉到腹股沟”。阿尔-哈提卜表示赞同,他将这三个区域同盖伦的三种“排泄器官”联系起来,它们是人类三种灵魂的居所,能将类似毒气的“轻物质”(与之相对的是汗、尿和粪便等重物质)排出体外。脑(颈部)、心(腋下)和肝(腹股沟)三种排泄器官试图排毒时就形成了肿块,如果它们不变硬,毒气就可以自然地或通过穿刺排出,病人就能得救了。

瘴气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人患病后会康复而有人却死了,还有些人则根本不患病。盖伦提供的答案或者思路是,患病与否取决于个人的身体情况,也就是体液平衡。由于大会合和腐败空气的蒸汽都是“潮湿”的,所以同类体质的人特别容易患病。当湿毒碰到潮湿体质的人时,他的“生命要素”会严重受损,很可能因此死亡。这意味着被认为“潮湿”体质的妇女和儿童(巴黎的专家们认为他们“体液充盈”)极为危险。而通常情况下“干燥”的人抵抗力更强。温暖和潮湿的组合最为危险,也就是说年轻丰满的“多情”女子最易感染。但人的体液平衡也受到行为和感情状态的影响,如饮食习惯、战场搏斗、锻炼、居住环境、情绪甚至性行为都会影响人的“冷热程度”和“湿度”。

然而,疾病的人际传播方式与瘴气论是矛盾的。瘟疫爆发后,人们发现,是否易受有毒空气感染同体液平衡关系不大。患者似乎是从别人身上甚至物品上感染疾病的。这些现象特别困扰着穆斯林医生。按照《古兰经》的教义,穆斯林宗教权威认为疾病的传播是真主的意志。因此,伊本·哈提玛等人否认传染的可能性。阿尔-哈提卜是穆斯林医生中唯一从观察和经验出发的,

他认为无论《古兰经》上怎么说，瘟疫都是可传染的。他远在勒里达的基督教同行哈克梅·达格拉蒙特(Jacme d'Agramont)列出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疾病：麻风病、结核病、结膜炎、流行性发热、天花、麻疹和皮肤病，“还有各种来自腐败空气的疾病”。^[24]和所有基督徒一样，他认为这里并无矛盾。佛罗伦萨的马里亚诺·迪·赛尔·雅各伯(Mariano di Ser Jacopo)写道：“经常有人在健康空气中被传染上瘟疫而死亡。”佛里尼奥的詹蒂莱认为人际传染的途径是“连续的”，患者通过呼吸或毛孔传播毒气，“同被感染的人交谈是疾病主要的传播方式”。^[25]死于黑死病的爱尔兰修士约翰·克林(John Clynn)注意到疾病传染性很强，接触过死者的人自己也会死亡。佛罗伦萨历史学家马特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写道：“似乎只要看一眼或碰一下就会感染瘟疫。”^[26]著名的教皇医生吉·德·绍利亚克(Guy de Chauliac)同样相信通过视觉传染，蒙彼利埃那位匿名的从医者也写道：“不过，气态灵魂从患者眼中射出时是疾病最危险的时候，它可以立即致命。特别是，如果患者临死时的目光接触到他身旁健康人的眼睛，(眼中的)毒素就会传到那个人身上并杀死他。”^[27]当人们发现接触死者或来自瘟疫地区的物品也会感染瘟疫时，现实真正和理论产生了对立。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因此改变对疾病的最基本认识。

须知中的防治方法

虽然采用了不准确的模型，但 14 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医生都是理性的，他们试图将疾病防治同它的成因和性质联系起来。他们深信自己的分析是准确的，所以发现失败后会极度地不

知所措。不论多么古怪，大多数防治方法都以这类分析为依据，虽然也有些得自经验，背离权威的做法非常有限。

狄奥尼修斯·科莱(Dionysius Colle)说：“奇迹啊！为了健康什么都尝试。”勒里达的哈克梅·达格拉蒙特认识到对症下药必须了解瘟疫的起源：我们必须搞清楚(空气的)污染和腐败是上帝对我们罪的惩罚，是空气或水等物质的污染，还是行星会合或连珠等天体现象的影响。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罪，医药将没有用。^[28]

所有基督教医学须知首先推荐的防治方法结合了虔敬的祈祷、悔罪、参加圣礼和虔诚的行为。^[29]许多人希望上帝能开恩接受自己的祈祷，比如1350年左右德意志维尔茨堡(Würzburg)的米夏尔·德·莱昂(Michael de Leone)的《家庭手册》(Hausbuch)中就写道：永恒万能的神，因您最荣耀的殉道者圣塞巴斯蒂安的祈祷，曾停止肆虐世界的致命瘟疫。现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四处祈祷，寻求您的庇护，相信这场类似的瘟疫也会停止。求您救他们脱离瘟疫或疾病，脱离各种危险和苦难。^[30]

哈克梅首先推荐“用内心和口头的忏悔，用行为和事迹承认我们的罪行和堕落，(因为)这样才是令上帝满意的真心悔罪”。^[31]为避免天体的影响，他建议躲避日光和星光，甚至在必要时躲到地下。关于上帝和天体的部分结束后，医生们开始提及瘴气、毒素本身和体液失衡。

哈克梅等人认为瘴气是局部的，它在某地停留一段时间就会离开。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最有效和常见的建议是逃离疫区。须知常常建议避开沼泽或者有自然臭味的地方，伊本·哈提玛推荐搬到山里。达姆齐等人则倾向于把瘴气拒之门外，他建议密封门窗。从希波克拉底时代起，南风就被看作危险而需要防范的，可

能是因为它们带来潮湿的海上空气，或者在热带地区被过度加热。许多人建议通风窗要朝北。在病人身边要屏住呼吸或者用布盖住口鼻。焚烧梣树、松树或刺柏等芳香木料能够熏香周围空气，被认为能除秽辟邪，净化被污染的区域。热量会烘干“湿气”，香味能中和“腐败的”空气。詹蒂莱建议焚烧沉香木、马郁兰、薄荷、香薄荷、琥珀和麝香，达姆齐(Damouzy)建议将龙涎香和樟脑或沉香木一起焚烧。阿方索·德·科尔多瓦(Alfonso de Cordoba)研制出一种成分复杂，气味刺鼻的粉末用于焚烧或置于室外净化空气，它包括红玫瑰、甘松、乳香、檀香、岩蔷薇、藏红花、药西瓜(“苦苹果”)皮、液态苏合香、胡椒、小豆蔻、樟脑和大麦。无论是否有效，它们至少是温和的刺激剂，能让人感觉好受些。^[32]

有人把类似的配料包起来做成所谓的“琥珀苹果”，可以随身佩戴或者放在口鼻旁。现存的 13 种配方大多包括龙涎香或琥珀、樟脑、芦荟、麝香和玫瑰水。詹蒂莱为穷人准备了较简单的配方。欧洲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 原意是来自科隆的水)和香水源于黑死病时代的个人香薰剂，但有的医生偏好臭味的效果，比如对着人的排泄物深呼吸。(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4)

黄金常被做成饮料形式用来直接对抗毒素。《严肃医学》(Solemnis Medicus)的作者认为黄金包含不朽的太阳的力量，能净化任何毒素的污染。詹蒂莱建议用玫瑰水(穷人用大麦水)浸泡黄金，或者把它和珍珠磨成粉加入甘露酒。僧侣乔瓦尼·达·鲁佩西萨(Giovanni da Rupescissa)建议用烈性蒸馏酒浸泡黄金。宝石也被认为能够对抗瘟毒，可以把它们磨成粉制成方剂吞服，或者随身佩戴，特别是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因为那里离心脏最近。

体液医学的逻辑要求避免让身体“受潮”和“受热”。热水浴能打开毛孔排毒，但也会使瘴气进入体内，两者权衡之下还是应

该避免洗澡。过度运动会吸入过多瘴气并使人体过热。性行为导致体温过高也应避免。情绪被称为“灵魂的起伏”，它和“体液平衡”关系密切，负面情绪会对平衡和人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德意志医生，茨维考(Zwickau)的约布斯·林克留斯(Jobus Linckelius)写道：“要避免一切体育运动和情绪波动，比如跑跳、嫉妒、愤怒、仇恨、悲伤、恐惧、放荡行为。那些蒙上帝恩典有条件的人可以用讲故事和听音乐来愉悦心情，因为音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33]这些娱乐活动能增强心脏的抗毒能力。有人提出心理暗示也是瘟疫的成因之一，哈克梅认为“想象本身就能引起各种疾病……所以瘟疫期间想象和害怕死亡是十分危险的”。^[34]

饮食方面，医生一般建议要清淡，避免鱼和牛奶这些“潮湿”食物和“热性的”重辣食物。食物要易于消化，不能在体内过多发酵。可接受的食物应该味道酸苦、少油脂、烤制而非煎或煮。不同作者的建议差别很大，特别是关于蔬果，它们虽然被认为是温湿的，但也是很好的排毒剂。酒会使身体发热，但如果度数低或者加大量水稀释后也是可以接受的。医生们还推荐各种药剂，比如蒸馏水和用芦荟、没药和藏红花做成的药丸。民间也有这类建议流传，比如15世纪约翰·里德盖特(John Lydgate)的《瘟疫期间的饮食和注意事项》。(A Diet and Doctrine for the Pestilence, 见附录原始文献5)

排出多余体液既可以通过正常的排汗和排泄功能，也可以使用泻药、利尿剂、栓剂甚至灌肠等特殊手段。据说放血(静脉切放血术)救了患瘟疫的盖伦的命，14和15世纪此法十分流行。血液是最容易处理的体液。占星学认为一年中最好的放血时间是春天月亮渐亏时，并且黄道上的星座对患者有利。哈克梅的建议是北半球下弦月，同时避免狮子、双子、处女和摩羯等不利星

座。^[35]不同的医生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阿维森纳建议只为病人放血,狄奥尼修斯·科莱写道:“我拒绝为年轻人放血,因为血液充盈的人如果用了此法会死亡,他们的血会变得焦黑,有的黏稠而略微发绿,有的稀薄略显蜡黄。”^[36]

1347—1352年第一次大爆发后,对瘟疫的准确诊断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误诊不仅可能在当地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还会延误防治。瘟疫的症状很多而且众说纷纭(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6)。最常提到的是发热和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结肿块,两者如同时出现似乎就能确诊了。但许多须知还提到皮肤症状,比如斑点、脓疱和痛。常见症状还有脉搏紊乱、痉挛和发烧寒战交替,较少见的有舌头发黑。大多数须知都提到可以从排泄物和血液检测出体液的变化,就像狄奥尼修斯·科莱前面说的那样。精神或灵魂的变化,比如嗜睡、兴奋、幻听或谵妄也被和瘟疫联系起来。内出血和吐血等现代学者眼中的肺鼠疫症状,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致命的。有的医生,甚至普通人都注意到存在两种类型的疾病。教皇医生吉·德·绍利亚克认为1348年1月的瘟疫较少出现淋巴结肿块但吐血更多,比那年春天的致死更快,而后者肿块更明显,病人存活时间更长且死亡率较低。1382年,另一位教皇医生雷蒙德·查尔梅里·德·维瓦里奥在《瘟疫三书》(*Three Books on the Plague*)中讨论了不同类型瘟疫的致死率,类似现代的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1402年前夕,雅科伯·迪·克鲁奇诺·达·卢卡(Jacopo di Coluccino da Lucca)在日记中记录了对一位妇女的治疗,她“死于传染性最强和最致命的那种瘟疫,有吐血”。^[37]无论其理论模型多么糟糕,这些医生还是把各种观察记录下来,这是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他为医学进步做了重要榜样。

1411年一份匿名的传单推荐医生用五步法处理瘟疫病例：根据症状确定是不是瘟疫；让病人祈求上帝的原谅；检查脉搏和排泄物来跟踪病情发展，注意是否到了危象期，它通常意味着无药可救，但也可能好转；如果无药可救，让病人听天由命，如果有希望就开始治疗。^[38]治疗过程和预防措施在形式和逻辑上如出一辙。除了祈祷康复，病人还要祈求死后上帝的恩典。有人建议要蒸熏，而“干燥阴冷”的食物和维持心灵平静比以往都要重要。淋巴结肿块被认为包含毒素，所以要对它们放血和手术。有人建议直接穿刺，但詹蒂莱建议用间接方法，“如果肿块位于头颈部就连续割开两根大拇指上的头静脉。如果在腋下或右手就割开肺静脉，它位于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另一种吸出毒素的方法是“拔火罐”，即用杯子盖住肿块，加热后产生吸力。哈克梅提到“有人把公鸡或母鸡的屁股置于患处来吸出毒素”。现存还有很多膏或“糊”的配方，把它们抹在患处据说也能拔毒。15世纪英国一部大众医学传单推荐的药膏配方是蜂蜜、鸭油、松香、煤灰、糖蜜、蛋黄和蝎子油。^[39]

用黄金泡制的方剂可以驱毒，也有人把蛇剥碎加上多达60种其他配料制成解毒剂。在大多数药剂师那里这都是“非处方药”。解毒剂五花八门，可能包括动物的角、蹄、肉、脑、肺、肝或排泄物。葡萄牙的迪奥戈·阿方索医生(Diogo Afonso)为国王配制了“最有效”的抗瘟药“獾粉”。把黄金、仔珠和珊瑚磨成粉调入酒中，用它将獾灌醉。割下獾的头放血，将血液同一种用许多香料制成的粉末混合后加热。加入用獾的心、肝、皮和(或)牙齿制成的糊状物。加入酒或醋使其“发酵”。必须在一年内使用。迪奥戈的妻子不小心吃了些6年前的，结果她死了。^[40]

中世纪的医生与瘟疫

黑死病重创了中世纪的医生行业。有的可能因为劳累倒在了岗位上,比如詹蒂莱,而更多则因自私做了逃兵而被谴责。人们批评医生胆小贪婪,当然还有对瘟疫防治的束手无策。1348年,佛罗伦萨人马乔内·迪·科波·斯特法尼(Marchionne di Coppo Stefani)这样评价医生:“剩下的那些索要高价,钱入手后才肯出诊,他们把脉时把头转向一边,检查尿液时离得远远的,还用气味浓烈的东西掩住鼻子。”而1373年,约翰·雅可比(Johannes Jacobi)医生则说:“因为穷,我不得不一家家去给人看病,接触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在手里放了块面包或海绵,或是浸过醋的布用来盖住口鼻以避免患病,尽管朋友们都不相信我能幸免。”^[41]医生的死亡率证明他们和病人接触要承担巨大风险,安·坎贝尔(Ann Campbell)发现12名教皇医生中有5人死亡,而穆斯林格林纳达则失去了3成医生。^[42]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瘟疫防治上没有大的突破,但须知和医疗服务仍广受欢迎,这说明人们对医生是十分信任和有信心的。但庸医、骗子和资质存疑的新手损害了这种信任。佛罗伦萨医生公会抱怨说甚至“从前是铁匠或其他劳动的人也开始行医了”。^[43]

诗人彼特拉克等人却把整个行业贬得一无是处。他把医生看作“与上帝作战”的“疯子”,“我们怀着谦卑的信仰接受了自然和上帝最深处的秘密,而他们却想一探究竟”。他认为上帝赐给一些人健康,又用疾病考验另一些人,所以医学本质上是对上帝的挑战。彼特拉克认为会合、热风和腐败空气这些原因都是“胡说八道”,包括逃亡在内的防治方法同样如此,除非那是上帝的意

志。总之，“医术只能医治小病暂保无虞，但当面对重病时它就一文不值了”。^[44]

研究黑死病的现代学生认为中世纪医生无甚可取。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是否有人脱离了对古代权威的盲目依赖而转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毕竟，这是后世科学革命的核心。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埃尔·雅卡尔(Danielle Jacquot)研究了15世纪的3位医生，他们分别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其中一人是萨瓦(Savoy)公爵服务，另一人任职于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的(Este)宫廷，3人都在帕多瓦或巴黎接受教育。她认为这3位杰出的医生和老师并未摆脱1348年的医学世界。但还是有人看到了进步。在研究了1348年到1420年的25份关于瘟疫的论文和残稿后，梅丽莎·切斯(Melissa Chase)得出的结论是，医生们越来越乐于和有能力将瘟疫同其他疾病区分开来，并最终开始区分不同类型的瘟疫。她认为，虽然仍存在错误，但自身的经验和老师的身份促使他们去寻求更加深刻的理解。塞缪尔·科恩表示赞同，在读过几十份须知后他发现，在14世纪60年代初的那次瘟疫中，人们显得更加乐观和自信。他表示，人们相信自己的疗法，为自己的经验叫好，把其他权威抛诸脑后。“在中世纪晚期的现代人眼中，医学是他们第一次在世俗领域超越古人。”^[45]但即使切丝和科恩是对的，那些信心仍然缺乏依据，要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功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R. Lemay, “The Teaching of Astronomy at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of Paris,” *Manuscripta* 20(1976):pp. 198—99.

- [2] Arturo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 trans. E. B. Krumbhaar (New York: Knopf, 1958), pp. 340, 342.
- [3] Sami K. Hamarneh,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Genius of Arab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 M. I. T. Press, 1983), p. 183.
- [4] Anna M.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78 n. 44.
- [5] R. Palmer, "The Church, Leprosy and Plague," in *The Church and Healing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19(1982): p. 79.
- [6] Jean-Noël Biraben, "L'hygeine, la maladie, la mort," in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 ed. Jacques Dupaqui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8), 1: p. 433.
- [7] Robert S. Gottfried, "Plague, Public Health and Medicin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Maladies et societe (XIIe - XVIIIe siecles)*, ed. Neithard Bulst and Robert Delort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89), p. 360.
- [8] Samuel Cohn,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6.
- [9] Alfred Coville, "Ecrits contemporaines sur la peste de 1348 à 1350," in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8), 37: p. 329.
- [10] William C. McDonald, "Death in the Stars: Heinrich von Mügeln on the Black Plague," *Mediaevalia* 5(1979): p. 92.
- [11] Jon Arrizabalaga, "Facing the Black Death: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of University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ed. Luis García-Balles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9.
- [12] Roger French, *Canonical Medicine : Gentile da Foligno and Scholasticism* (Boston: Brill, 2001), p. 30.
- [13] Palmer, "Church," p. 84.
- [14]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 111, 134.
- [15] Piero Morpurgo, "La peste: dinamiche di interpretazione storiografica," in *The Regulation of Evil*, ed. Agostino Paravicini Bagliani and Francesco Santi (Florence: Sismel, 1998), p. 41; Magnus quoted in William Naphy and Andrew Spic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History of Plagues, 1345—1730*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p. 32.

- [16] Chiara Crisciani, "Black Death and Golden Remedies," in *The Regulation of Evil*, op. cit., p. 14.
- [17] Seraphine Guerchberg,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lleged Sowers of the Black Death in the Contemporary Treatises on Plague," in *Change in Medieval Society: Europe North of the Alps, 1050—1500*, ed. Sylvia Thrup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5), p. 213; Pare quoted in Raymonde Elise Doise, *La Peste en Bretagne*, (La Poire-sur-Vie: Sol'air, 1998), pp. 31—32;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Paris: Mouton, 1975), 2:p. 8.
- [18] Horrox, *Black Death*, p. 146.
- [19] Arrizabalaga, "Facing the Black Death," p. 253.
- [20] Horrox 翻译了这首诗用散体写成的前言,它概括了该诗的主要内容。*Black Death*, pp. 163—67.
- [21] Biraben, *Les hommes*, 2: pp. 10—11; Doise, *Peste en Bretagne*, pp. 32—33.
- [22] Guerchberg, "Controversy," p. 211.
- [23] Arrizabalaga, "Facing the Black Death," p. 251.
- [24] M. L. Duran-Reynals and C.-E. A.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Regiment de preservacio a epidemia o pestilencia e mortaldats,'"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3(1949): p. 69.
- [25] John Henderson, "The Black Death in Florence: Medical and Communal Responses," in *Death in Towns*, ed. Steven Bassett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0.
- [26] Clynn quoted in Maria Kelly, *A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 in Ireland*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p. 22; Villani in Henderson, "Black Death in Florence," p. 141.
- [27] Arrizabalaga, "Facing the Black Death," p. 263.
- [28] Duran-Reynal and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p. 78.
- [29] Biraben, *Les hommes*, 2:p. 83; see Chapter 5 of this book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religious responses to the Plague.
- [30] Stuart Jenks, "The Black Death and Würzburg: Michael de Leone's Reaction in Context"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7), p. 215.
- [31] Duran-Reynal and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pp. 78—79.
- [32] Dominick Palazzotto, "The Black Death and Medicine: A Report and Analysis of the Tractates Written between 1348 and 135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4), pp. 180—81.

- [33] Quoted in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trans. C. H. Clark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0), p. 91.
- [34] Duran-Reynal and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p. 84.
- [35] Ibid, p. 85.
- [36] Palazzotto, "Black Death and Medicine," p. 218.
- [37] Carlo Cipolla, *Public Health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4.
- [38] D. W. Amundsen, "Medical Deontology and Pestilential Diseas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3(1977): pp. 416—17.
- [39] Palazzotto, "Black Death and Medicine," p. 221; Jacme quoted in Duran-Reynal and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p. 82; on the Leechbook see Robert S. Gottfried, *Epidemic Disease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Medical Response and t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4.
- [40] 解毒剂配方见 Palazzotto, p. 203; 罂粟见 A. H. Oliveira Marques, *Daily Life in Portug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rans. S. S. Wyat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pp. 143—44.
- [41] Marchionne quoted in Katherine Park, *Doctors and Medicine in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5; Johannes in Amundsen, "Medical Deontology," pp. 411—12.
- [42] Campbell, *Black Death*, p. 94.
- [43] Park, *Doctors and Medicine*, p. 36.
- [44] Francesco Gianni, "Per una storia letteraria della pesta," in *The Regulation of Evil*, op. cit., pp. 67—71.
- [45] 关于雅卡尔和切斯见参考书目; Cohn, *Black Death*, p. 240.

第四章

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多次爆发的黑死病虽未击垮中世纪西方社会,但还是严重动摇了它。最显著的影响是人口的急剧减少。它不仅影响了家庭和亲友,还动摇了欧洲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的经济社会格局。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平衡被打破,需要几十年时间重新调整。这既反映在工资和价格的波动上,也体现在地主和农业劳动者关系的快速变化中。分益制在意大利北部愈加普遍,而许多人认为地主对自愿劳动者的迫切需求导致英国封建主义走向末日。由于继承和新经济机会对财富的再分配,富人更富,一些穷人也有钱了。

政府不得不调整税赋方式,有时还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法维持有产者和无产者间传统的平衡。在瘟疫中,神父和郊区居民一样无法幸免,教会为人类寻求上帝恩典的职能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得到庇护、锻炼和教化而参加宗教活动,批评者对此非常失望。可以说,新教的种子正是在黑死病之后被播下的。欧洲文化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方言读写和文学开始与政府和教会的拉丁语分庭抗礼。不仅是农民、工

匠和神父需求和新机会激增,还有受过教育的律师、公证人、医生和老师。新的学校和大学应运而生,那里发生的某些变革为中世纪画上了句号。

对人口的影响

“我们面临着几乎无法想象的灾难。黑死病在世界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1]第一次爆发结束后,教皇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见人物传略)得悉的死亡数字是 28 840 000,约占 7 500 万总人口的 31%。^[2]不过,这三个数字都是臆测。没人知道 1347 年到 1352 年间欧洲的那场瘟疫杀死了多少人,也没人知道 1346 年、1330 年或 1300 年欧洲的人口,所以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死亡率。即使对伦敦、佛罗伦萨和巴黎等档案详尽的城市,或者英格兰这样的封闭社会,学者们仍在人口数上争论不休。很少有现代学者会宣称某个数字是准确的,许多中世纪作者却没有那么谨慎,有位勃艮第编年史学家宣称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幸存,有人则认为一半人口死亡,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①引用圣经《启示录》(9:18),认为三分之一的人死亡,以此作为对幸存者的警告。我们不得不把这些数字看成纯粹臆测,或者相当于“很大的数字”,或者只是象征符号。在瘟疫期间,欧洲甚至没有哪个地方统计过当地的死亡人数。不过随着城市居民对数字愈发敏感,许多编年史学家会用数据满足他们。薄伽丘宣称佛罗伦萨死亡 10 万人,帕多瓦的史学家为威尼斯标上了同样的数字。阿维斯

① 约 1337—约 1405 年,法国编年史学家,记述了 14 世纪英格兰和法国骑士制度的复兴,他的编年史是研究百年战争初期的重要史料。——译者注

伯里的罗伯特(Robert of Avesbury)说伦敦每天死亡 200 多人, 让·维奈特(Jean Venette)则称巴黎每天死亡 500 人, 而在维也纳有人一天内看到 500 场葬礼。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 di Tura)称锡耶纳死亡 52 000 人, 僧侣约翰·克林称都柏林有 14 000 人, 而弗莱芒的一位历史学家提到三个月内阿维尼翁死亡 62 000 人。历史学家塞缪尔·科恩研究的 407 份欧洲编年史中有 97 份对死亡人数作了估计, 但它们都不是可信的准确数字。^[3]

现代历史学家用其他数据来源来统计局部小规模的死亡率, 比如英国的某个采邑、郊区或村庄。但即使在该层面上, 记录仍然很不可靠或存在间断, 它们的准确性也常受质疑。整个 14 世纪的欧洲只有三个郊区保存有瘟疫和正常年份所有的丧葬记录。英格兰的“身后裁判所”(inquisitions post-mortem)提供了死亡地主及其继承人的信息, 但仅限于骑士及以上的阶级。审判采邑案件的法庭有死者的欠租情况, 但只记录户主而非家庭成员。租地继承税(heriot)是农奴交给地主的遗产税, 但该记录不包括没有财产的人。有的学者用主教记录确定神父的死亡率并由此推广到整个人群, 有的从遗嘱或墓地估计死亡人数或死亡率。法国等地政府按照“人头”或“炉灶”征税, 可大致作为人口或家庭(有人居住的房子)数量。炉灶数容易统计得多, 但现代研究者需要确定每个“炉灶”周围住多少人。用作乘数的家庭平均人数非常关键但总有争议。此外, 瘟疫时期离家出走可能意味着多种情况, 可能全家安好只是去避难了, 可能是丈夫死亡后其他成员投奔亲戚家, 也可能是他们都死了。^[4]

有的学者仅仅依靠记录估算死亡率。安·卡迈克尔(Ann Carmichael)估计欧亚大陆西部的 1 亿人口中 20% 死亡, 欧洲局部地区的数字可能高达 40%—50%。纳菲和斯派瑟(Naphy and

Spicer)估计 1290 年西欧人口在 7 500 万到 8 000 万之间,而瘟疫中期的 1430 年只有约 2 000 万到 4 000 万,最多下降了 75%。当然这并非完全由瘟疫造成,饥荒、战争和其他疾病也难辞其咎。如果他们的估计比较准确,那么对人口的影响是惊人的。现代研究对死亡率的估计呈现上升趋势,几十年前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近来则是“三分之一到一半”。历史学家约翰·阿伯斯(John Aberth)称,对局部地区的研究显示英格兰的死亡率在 40% 到 60%。^[5]2002 年,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总结了许多人的观点后说:“合理的估计是,1348 年到 1349 年英国的死亡率约为二分之一。影响是普遍的,记录显示没有村镇或地区幸免。如果总人口是 500 万或 600 万,死亡数字在 250 万到 300 万。”^[6]

遭受世纪中叶那次打击的英格兰和欧洲并没有迅速恢复。某些地方的记录显示 14 世纪 50 年代有缓慢恢复,但新的疫情造成的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使得人口直到 15 世纪中叶仍在低位徘徊并呈现萎缩之势。瘟疫造成育龄妇女大量死亡,而且瘟疫过后许多英国城镇女性加入了工薪劳动力队伍,从而推迟了婚育。人口历史学家约翰·哈彻(John Hatcher)在其经典研究中提到,瘟疫后成年人的经济和物质条件改善,他们可能选择减小家庭规模以便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他也赞同今天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瘟疫的高死亡率是人口处于低位的主因。1370 年后,英国又爆发了 15 次疫情,分别是 1379—1383 年,1389—1393 年,1400 年,1405—1407 年,1413 年,1420 年,1427 年,1433—1434 年,1438—1439 年,1457—1458 年,1463—1464 年,1467 年,1471 年,1479—1480 年和 1485 年。^[7]它们的死亡率要比 1348—1349 年那次低得多,一般可能只有 8% 到 15%,但其累积效应造成英格兰人口长期处于低位,甚至在 15 世纪下半叶出现下滑,虽然那

时该国开始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为都铎王朝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洲其他地方情况类似,14世纪中叶人口急剧下降后有过缓慢恢复,但随后的下滑持续到15世纪,并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法国地方历史学家从按户征税的记录中看到了瘟疫带来的重创。比如,1343年到1357年,阿尔比(Albi)的户数减少一半,人口可能从10 000减至5 000。在附近的米约(Millau),1346—1353年间户数从1 541户减少到918户。但阿尔比数据的间隔为14年,而米约只有7年。所以比起阿尔比,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瘟疫死亡是米约户数减少的主因,其他原因包括别的疾病、饥荒、当地的战事和逃亡。1347年、1348年和1349—1350年,出于征税需要,人们对法蒙梅利安(Montmelian)附近8个郊区的户数作了统计,分别是303、260和142户,两年间减少了53%。因为是连续年份,我们很有信心地认为其主因正是黑死病。^[8]

但主因并非全部原因,我们完全不清楚那些家庭的成员遭遇了什么。许多人的确死了,但也有人只是逃走了,而不同的家庭也可能组合起来。对1343年后阿尔比的深入研究显示,人口流动和死亡都会影响户数。1343年阿尔比维冈区(Vigan)的税单上有638名纳税人(户主)。1357年数字下降到242名。在原先的638人中,74人仍在名单上,68人搬到了当地另一地区(可能条件更好),496人的名字则从当地消失了。在新增纳税人中,124名来自阿尔比,但其中118人(总数的49%)不是来自当地,或至少未在当地纳过税。有人外出避难,农村人进城找工作,孤儿被收养,寡妇回娘家或再嫁,较为贫穷的家族支派接管较富有支派的房屋或继承他们的财产后搬走了,瘟疫不仅造成死亡,还整合了幸存人口。^[9]

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adurie)研究了1345—1355年法国的10个地区,总户数从8 511减少到3 839,接近6成。昂立·杜布瓦(Henri Dubois)对普罗旺斯的埃克斯(Aix-en-Provence)、穆斯蒂埃(Moustiers)和阿特(Apt)的研究得出了类似数据,分别为45%、67%和52%。^[10]这些记录中很少有恢复的迹象,法国人口持续下滑。1361年,14世纪70年代,1382年,1387年,1391年,1397年,1401年,1403—1406年,1410—1414年,1420年,1457年(非常严重),1471年和1493年瘟疫在法国里昂地区复发。每次的死亡率据说都是正常年份的6—7倍。^[11]勒华拉杜里估计1330年的法国人口约1 700万,15世纪中叶下降到约1 000万并在附近徘徊,直到1470年后才开始上升。1700年法国人口达到约1 900万。加泰罗尼亚的情况类似,1365年104 000户,1378年83 000户,1497年61 000户。人口学家奥雷·本内迪克托(Ole Benedictow)认为挪威人口于15世纪后半期达到低点,从1300年的约35万缩水到125 000,下降了约64%。直到1650年挪威才恢复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平。从1350年到1490年,瘟疫大约每5到6年就要袭击一次俄罗斯,瘟疫前人口数直到1500年才刚刚恢复。当然其他事件和趋势的作用使得分析瘟疫的具体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比如蒙古人统治的瓦解、三田轮种的推广(three-field crop rotation)^①、城市生活的发展和新定居点的出现,以及莫斯科大公国对俄罗斯东北和西北的统一。^[12]

① 12、13世纪欧洲开始推行新的轮种方法,在三田制下土地被分成三部分,1/3播种冬季作物如冬小麦,1/3播种春季作物如燕麦、大麦或各种豆类,1/3休耕。第二年再轮着耕种和休耕。与双田轮作制(一半田地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一年)相比,三田制不仅增加了播种面积,而且还节省了畜力和人力。——译者注

黑死病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创造、交易及使用商品和服务。有人需要某些物品或完成某些任务，而另一些人用自己的劳动提供它们并收取报酬。对商品和服务有需求的人愿意支付报酬，当需求或欲望很高或者供给很小时，他们会提高报酬。黑死病既杀死了需求者，也杀死了供给者，但总的来说短期内对某地的物资供给（包括货币）没有影响。不过长期来看，它对供需、价格、劳动力工资，甚至货币数量和能获得的物资都有影响。

瘟疫杀死了需要和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人，导致对它们的需求和短期价格的下降。不过，对棺木、蜡烛、药品、裹尸布、医生、理发师外科大夫、公证人、掘墓人和神父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升。它们的价格或报酬因商品的稀缺或从业者大量死亡而提高。

除了掘墓人，上述从业者的死亡意味着技能和经验的损失，替代他们困难而昂贵。同样的情况还有木匠、石匠、（好的）酿酒师傅、艺术家、教士、鞋匠和铁匠。他们不仅无法继续自己的工作，也无法把手艺交给新一代。幸存者因此可以索要更高的报酬、价格或工资。城市是他们喜欢聚居的地方，那里常用非常优惠的条件吸引有上述技能的幸存者前往，包括快速办理开业许可、对某些类型的商人免税，或提供免费住宿。

但这只是“人力资本”的一种类型。城市中的无技能劳动者也因死亡而变得短缺，因此他们索要比瘟疫前高得多的工资。有些人来自其他城镇，但许多来自周边农村，任由田地庄稼荒芜。这是遍布欧洲，从都柏林到诺夫哥罗德的城乡移民潮的一部分。

当然这伤害了地主，他们的田地和庄稼无人打理。有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力过剩，或者由于死亡率低正好消化了原先的就业不足，那里的工资以及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价格就不会有明显上升。但在大多数地方，劳动力变得稀缺，雇主不得不提高报酬，他们提高工资、减少地租，或取消被土地束缚的农民的传统义务。由于人口和需求减少，谷物和其他食品的价格下降，但随着供给下降（存量被吃完）和成本提高，粮价会再次上升。不过从中受益的并非地主，而是佃户和劳工。

能自由迁移的农业工人（法律上，许多人并不被允许这样做）追随市场的激励。意大利的新老地主都同农民签订了分益合同，提供资本（土地、种子、食宿）以交换他们的劳动。分益制（mezzadria）下佃户能获得固定比例的收成，因此有了努力工作和尽可能多生产的动机。在英格兰，因为土地数目不变而劳动者减少，单个农民需要耕种更多土地。为了让佃户留下，地主不得不提高合同待遇。在教会控制的大型采邑式庄园中，教土地主常会减少或取消传统上对农民额外的工作和税赋要求。有的甚至把私有领地租给佃户，而过去这些地的所有收益都是归地主所有的。总之，只要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劳动者的工资和其他待遇就相对较好。劳动者还从人口下降带来的财富再分配中受益。农村中较穷的人与比自己富有一些的结婚，把家庭、财产甚至土地组合到一起。有的搬进更好的房子，有的通过继承或盗窃获得钱、工具和家具。总体上，1348—1350年瘟疫后，欧洲农业工人在经济和物质上得到了改善。

不过所有的让步都意味着地主的损失。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升反映的是其稀缺性和成本的增加而不是需求的增加，并不会提高地主的利润。地主停止在产量较低的土地上耕种，或者

不再进行粮食生产。在英格兰和西班牙的中部高原，地主们开始养羊。羊不仅提供毛和肉，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远小于农业。牧羊的收益不如大多数农作物，但仍有利可图。到 14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英格兰汉普顿的莫尔顿 (Mardon) 牧羊场的面积较瘟疫前翻番，从 1347—1348 年的 513 英亩和 1353—1354 年的 791 英亩增加到 1376—1377 年的 1 232 英亩。该潮流促进了英国新兴的毛纺业。1350—1362 年，布匹年出口增加 9 倍（从 1 115 匹增加到 10 812 匹）。^[13] 废弃的农舍、房屋甚至整个村庄很快破败没落了。地主只能放弃它们或支付高昂的维修翻新费用。在繁荣发展的城市附近，粮价可能保持高位甚至上升，但如果劳动者和消费者在新一轮的瘟疫中死亡，地主（如果他幸存）就要蒙受损失。在意大利中部，有的乡下地主为穷困所迫沦为强盗或加入雇佣军。^[14]

为了减少影响，英格兰和阿拉贡的王室政府对雇主或地主开出的工资和福利做了限制，并强迫工人接受这样的工资。甚至教会也用这办法控制教士的收入，因为神父的服务收费太高了。1349 年 6 月，瘟疫平息后不久，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颁发了《劳工法令》(Ordinance of Laborers)。“雇工们”要么主动拒绝工作，或只在“不可容忍的工资水平”下工作。王室政府把 1346 年或者“5 到 6 年前”的工资作为合理基准。历史学家帕尔默 (R. C. Palmer) 总结说，这些机制是为了“强迫人们工作，减少竞争和加薪要求”。^[15] 拒绝接受这样工资的人将被投入监狱。法令由地主和雇主执行，但他们做得显然不够好。

两年后的 1351 年颁布了更加正式的《劳工法条》(Statute of Laborers)，它在某些限制上更为严格：雇佣必须公开，不得私下签订协议，“不得索取、给予和接受食物或其他福利”。法条不再由地主，而是由“管事 (steward)、执行官 (bailiff) 和治安官 (con-

stable)”等公共官员执行,他们对治安法庭(court of the Justice of the Peace)负责。商品或服务提供者必须像瘟疫前那样就自己的要价起誓,违誓者被看作“造反”,如果今后再有违法或违誓将被延长刑期。^[16]对某人的指控可以是:“高伊斯特(High Easter)郊区的平民收割人约翰·卢四处寻求超额工资,并诱使别人也这样做。”虽然有人认为法条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被严格执行,但1352年在埃塞克斯县有7556人因违反法条被罚款,其中20%是女性。直到37年后的1389年,埃塞克斯还有791人因此被罚款。^[17]

英国王室政府的这项经济法开了两个先河。首先,它虽非税收,却把国王的意志强加给了英国人的钱包,不论是最穷的劳工还是富有的商人。它干涉了行业公会和自由市场的工资制定。法令和法条真正侵犯的是契约自由,而且是严重侵犯。第二,它体现了王权和政府权力的缓慢增长。国王使用法律直接控制社会,而不仅仅通过快速衰亡的封建体制。这样,国王联合的不是地方贵族而是更低一级的骑士阶级,他们越来越多地担任治安官、执行官和其他对国王负责的地方官员。这个群体成为新的绅士阶级,就像某位历史学家所说的“为了自利而建立良好秩序”。大小地主可以停止内斗而把矛头一致对准劳动者,并且有了压迫后者的法律武器。^[18]它是1381年农民起义的诱因之一,尽管这种说法常有争议。虽然导致了政府角色甚至结构的变化,但国王的行为是极为保守的,目的只是维持社会和经济现状。1363年颁布的禁奢令限制某些行为和服饰,目的是防止下层民众在举止衣着上模仿上层。虽然没有很好地执行,但禁令维持了阶级差异并限制了对昂贵布料的需求(及其价格)。很快甚至乞丐也被限制,1388年的《剑桥法条》试图阻止他们游荡,只有找工作时才被

允许出行。^[19]

这些打压是否表示英国出现了“农奴制复辟”呢？封建制度是否在它们的压力下解体消失的呢？长久以来，英国历史学家一直对黑死病在英国封建制度消亡中扮演的角色争论不休。在这里我们把封建制度定义为 14 世纪采邑中地主和非自由农奴间的关系。作为在地主私有土地和道路上劳动的报酬，农奴获得保护、奖励和一部分收成，但按惯例他们要上缴劳动所得并禁止逃跑。地主既使用农奴也用自由劳力，但从 1348 年前的几个世纪开始，自由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比率就稳步上升。对地方情况的研究显示，黑死病开始前许多地方农奴的非农业负担就已经在减轻。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其他方面类似，多次爆发的黑死病似乎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黑死病是其历史上的一次危机。《劳工法条》改变不了地主的弱势，再加上英国人口无法恢复，这意味着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采用谈判而不是强迫。虽然有限规模的农奴制持续到了 16 世纪，但早在 15 世纪，对农业劳动者的大数要求和限制就已经被取消了。

黑死病对教会和教育的影响

瘟疫对供需关系的影响同样体现在教会和教士身上。由于许多教士死于瘟疫，参加圣礼和宗教仪式的人不得不为这些服务支付更高价格。教士的死亡率至少和其他职业一样高，第一次疫情时佛罗伦萨损失了一半多明我会(Dominicans)修士(150 人中 77 人死亡)，巴塞罗那有 40% 的教士死亡，英格兰的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教区(Lichfield)有约 1/3 的神父死亡，1348—1350 年温彻斯特教区(Winchester)死亡率则约 49%。^[20] 1349 年，由于情

况严重,英国巴斯和威尔斯主教(Bath and Wells)不得不向辖区居民发布教令:“由于瘟疫大面积肆虐,许多教区失去了神父或司铎……由于找不到神父……许多人死时无法行忏悔礼……告诉所有人……临死前他们可以互相忏悔……甚至可以向女人忏悔。”^[21]虽然得到教皇默许,但这完全是绝望的表现。不过,教士从他们的管区消失还有别的原因。

各地的教士都身处等级结构中,瘟疫为那些有晋升野心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神父死亡后,主教会焦头烂额地展开临时人事安排,把较小或较贫穷教区的神父调往较大或较富有的郊区。有的教士干脆抛下自己收入微薄的职位,从需要私人神父的个人或团体手中获得更高报酬。此外,有负罪感的病人会要求为自己的灵魂举行成百上千次的弥撒,他们会在遗嘱中预留开支。1350年5月28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伊思立普(Simon Islip)发布了约束令(*Effrenata*),敕令得名于它的第一个词 *effrenata*,意为“无约束的”,如“人类无约束的贪婪”。他提到,世俗人士抱怨神父们逃避责任,对收入更高的职位和高额报酬“贪得无厌”。敕令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为了遏制这种势头,伊思立普确定了收费标准并要求上议院的其他主教也这样做,动议效果寥寥。面对更多的抱怨,1362年10月新一波瘟疫期间敕令被再次发布,内容没有变化。1378年11月苏德伯里(Sudbury)大主教提高了收费标准。^[22]

苏德伯里在调整薪酬上限时说的话反映了教会首脑们正是对教士的胡作非为的最强烈批评者。他认为教士们“利欲熏心,不满足于合理薪俸而是索取和接受过高的报酬。这些神父贪得无厌以至于财富从他们喉头溢出,他们变得疯狂堕落,有些在满足口腹之欲后还沉湎于邪恶泥潭”。^[23]当社会上有人历数教士

罪行或提出批评时,他们常被贴上反教权的标签。虽然反教权的讽刺和攻击早在 1100 年就有了,但第一次疫情后它们变得更频繁而且来自社会各个角落。^[24]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影响了乔叟、薄伽丘和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①笔下的角色和故事。在对瘟疫期间爱尔兰的研究中,玛利亚·凯利(Maria Kelly)列出了该岛上最常见的指控:偷情、通奸、教士结婚、裙带关系、醉酒、贪吃、虚伪、贪婪、缺乏精神动力和无知。^[25]这些不满部分来自教士的所作所为,部分则是因教会无法取悦上帝和平息瘟疫而产生的失望和沮丧。人们认为,瘟疫是为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支付的代价,对他们来说,从前无足轻重的过错现在变得无法忍受了。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为了填补大量空缺,主教和宗教团体加快了对布道者或神父资格的培训。他们不得不大肆招募并降低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标准。英国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修士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在回顾 40 年前(14 世纪 50 年代)时说:“很快,许多在瘟疫中丧妻的人涌入教团。这些世俗者中的很多是文盲,即使有人识字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26]奈顿虽然没有提及死于瘟疫的那代人,但仍有人为失去那么多神父、布道者和楷模而遗憾。许多人认为善良而虔诚的人已经消失,剩下的是逃兵和罪人,以及尚未准备好的新手。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损失对世俗和宗教教育都造成影响。地方初级学校的老师或者去世,或者另谋高就,很少留在原来的岗位。到 14 世纪 60 年代,基础教育的缺乏在大学凸显,学术水准开始下滑。^[27]

① 14 世纪英国诗人,传说是《耕者皮尔斯》的作者。——译者注

有社会意识的人有时会在遗嘱中要求设立奖学金甚至筹建新的大学。1350年,诺维奇主教威廉·贝特曼(William Bateman)在剑桥成立三一学院,并资助了当年刚刚失去创始人的冈维尔学院。1359年伊丽莎白·德·克莱尔(Elizabeth de Clare)成为大学学院的赞助人。她提到,许多为上帝和国家服务的人都死于十年前的瘟疫。1382年,威克汉姆的威廉(William of Wykeham)成立温彻斯特学院,目的是培养教士以及保证自己和父母的灵魂得到祈祷。圣体学院成立于第一次疫情之后,而牛津的坎特伯雷学院和新学院分别成立于1362年和14世纪70年代。查理四世皇帝不仅于1348年在首都布拉格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还在1355—1369年间又建了5所。上述各所学校的章程都特别提到瘟疫是它们建立的原因之一。^[28]这些举动取得了效果,1350年后,神学院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历史学家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将其归于三个原因:社会对新的受过教育的修士的需求,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厚收入;出现了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附捐歌祷堂(chantry)神父;新兴富人希望儿子从事收入丰厚的教职。

虽然在大学和教会中拉丁语仍然地位稳固,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仍然会使用它,但黑死病之后方言读写和文学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方言祈祷文、诗歌、短篇故事、瘟疫传单,甚至《圣经》的传播都比以往更加广泛。查理四世在他的帝国里鼓励德语和捷克语文学,而古爱尔兰语(盖尔语)文学在瘟疫后取代了爱尔兰英语。在英格兰,法语几乎不再是官方语言,拉丁文本被越来越多地翻译成英语而不是法语。1362—1364年间召开了三次使用英语的议会,而1362年起法庭开始禁用法语。^[29]虽然部分原因是民族主义(英国正进行英法百年战争),但很难否认爱尔

兰的英语人口,英格兰的法语人口,以及各地的拉丁语人口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相对当地居民的比例都呈下降之势。这股潮流意味着同西塞罗的拉丁语和荷马希腊语的复兴一样,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语、蒙田的法语、塞万提斯的西班牙语、路德的德语和莎士比亚的英语也将成为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的标志。

注释:

- [1] Christopher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33.
- [2] William G. Naphy and Andrew Spic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History of Plagues, 1345—1730*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p. 34.
- [3] Yves Renouard, “Consequences et interet demographiques de la peste noire de 1348,” in his *E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Paris: SEVPEN, 1968), p. 158; Samuel K.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6—7.
- [4] Ole J. Benedictow, *Plague in the Late Medieval Nordic Countrie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slo: Middelalderforlaget, 1992), p. 64; S. L. Waugh,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7—88; John Aberth, *From the Brink of the Apocalyps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27; Elisabeth Carpenter and Jean Glenisson, “Bilans et methodes: La demographie Francaise au XIV^e siecle,” *Annales: E. S. C.* 17(1962): p. 128.
- [5] Ann Carmichael, “Bubonic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Plague, Pox and Pestilence: Disease in History*, ed. Kenneth Kiple et al. (New York: Marboro Books, 1997), p. 61; Naphy and Spicer, *Black Death*, p. 41; Aberth, *Brink*, p. 128.
- [6] Dyer, *Making a Living*, p. 233.
- [7] Mark Bailey, “Demographic Declin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9(1996): pp. 4—5; John Hatcher, *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London: Macmil-

- lan, 1977), pp. 55—60.
- [8] Carpentier and Glenisson, “Bilans,” 117—18; Henri Dubois, “La depression: XIV^e et XVe siecles,”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caise*, Vol. 1, ed. Jacques Dupâquier et 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8), p. 322.
- [9] Genevieve Prat, “Albi et la peste noire,” *Annales du Midi* 64(1952) : p. 18.
- [10] Emmanuel Ladurie, “A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14th to 17th centuries),” in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trans. Sian and Ben Reynold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p. 44; Dubois, “Depression,” p. 322.
- [11] Jean Canard, *Les Pestes en Beaujolais—Forez—Jarez—Lyonnais du XIV^e au XVII^e siecle*(Regny: Abbaye de Pradines, 1979), pp. 9—10.
- [12] Paul Freedman, *Origins of Peasant Servitude in Medieval Catalon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3; Benedictow, *Plague*, p. 104; Lawrence Langer, “The Black Death in Russia: Its Effect upon Urban Labor,”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 (1975) : pp. 61—62.
- [13] Colin Platt, *King Death: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Aftermath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43; Tom Beaumont James, *The Black Death in Hampshire* (Winchester, England: Hampshire County Council, 1999), p. 10; R. H. Britnell, “The Black Death in English Towns,” *Urban History* 21 (1994) : p. 209.
- [14] Elisabeth Carpentier, *Une ville devant la peste* (Paris: SEVPEN, 1962), p. 236.
- [15] R. C. Palmer, *English Law in the Age of the Black Death, 1348—1381: 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and Law*(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p. 139.
- [16] Rosemary Horrox, ed.,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40, 312—16(where the statute is printed in translation).
- [17] Quoted in David Aers, “Justice and Wage-labor after the Black Death,” in *The Work of Work: Servitude, Slavery, and Labor in Medieval England*, ed. Allen Frantzen and Douglas Moffat(Glasgow: Cruithne Press, 1994), p. 175; Larry Poos,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0—21.

- [18] Platt, *King Death*, pp. 133—34.
- [19] Dyer, *Making a Living*, pp. 282—83.
- [20] Renouard, “Consequences,” p. 160; Richard Gyug, “The Effects and Extent of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New Evidence for Clerical Mortality in Barcelona,” *Mediaeval Studies* 45(1983): p. 395; R. H. Davies, “The Effect of the Black Death on the Parish Priests of the Medieval Diocese of Coventry and Lichfiel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62(1989): p. 87; James, *Hampshire*, p. 3.
- [21] Naphy and Spicer, *Black Death*, p. 39; 全文翻译见 Horrox, *Black Death*, pp. 271—73.
- [22] Effrenata, 翻译见 Horrox, *Black Death*, pp. 306 —9; William Dohar, *The Black Death and Pastoral Leadership: The Diocese of Herefor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104—5; Bertha Putnam, “Maximum Wage Laws for Priests after the Black Death, 1348—138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1(1915): pp. 19—20.
- [23] Christopher Harper-Bill, “The English Church and English Religion after the Black Death,” in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ed. W. M. Ormrod and P. G. Lindley (Stam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Paul Watkins, 1996), p. 91; full text printed in translation in Horrox, *Black Death*, pp. 311—12.
- [24] Caroline Bynum,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Middle Age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9(1985): p. 99.
- [25] Maria Kelly, *A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 in Ireland*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pp. 125—26.
- [26] Dohar, *Black Death*, p. 118; 全文翻译见 Horrox, *Black Death*, pp. 75—80.
- [27] William Courtenay, “The Effects of the Black Death o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Speculum* 55(1980): pp. 706—7.
- [28] Raymond Williamson, “The Plague in Cambridge,” *Medical History* 1 (1957): pp. 51—52; Anna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49, 152—54.
- [29] Cohn, *Black Death*, p. 68; Kelly, *History*, p. 65; Phillip Lindley, “The Black Death and English Art: A Debate and Some Assumptions,” in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ed. W. M. Ormrod and P. G. Lindley (Stam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Paul Watkins, 1996), p. 131.

第五章

对黑死病的社会心理反应

死神夺走了那么多男男女女的生命，以至于连把尸体送去墓地的人都找不到。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扛在肩上送去教堂，扔进公共墓坑。墓地发出恶臭，几乎没人敢从那里经过。（迪恩的威廉(William of Dene)，英格兰《罗切斯特编年史》，1349 年）

尸体必须被送去阿莱加的圣乔治教堂(San Giorgio d'Alega)、波卡拉梅的圣马可教堂(San Marco Boccalame)，佛萨罗拉的圣莱昂纳多教堂(San Lionardo di Fossaruola)和圣伊拉斯谟教堂(Sant' Erasmo)埋葬。死尸太多，只能堆在墓地里，草草掩埋。这样墓地就满了。许多人死时没有忏悔，也没有别人在场。人人怀着对他人的恐惧躲了起来。平底船(上的人)叫道：“死尸！”，如果哪家有人去世，必须把尸体扔到船上，(否则)会被课以重罚。（威尼斯，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的日记，1348 年）

……第一次大疫情时，教区长威廉·温格雷夫的仆人们(包括帕尔弗莱曼在内)晚上去坦普尔顿(Templeton)，用手推车把死尸运到威特里奇(Witheridge)埋葬。车太满了，经

过贝尔比福德(Belbyford)时一具尸体掉了下来。有人付给威廉·阿特·海恩一便士,让他第二天去把尸体检回来。(72岁的约翰·帕尔弗莱曼(John Palfryman)回忆,英格兰主教记录中57年前的往事,约1387年)

记忆中,没有哪次瘟疫的死亡人数这么多,可以说前所未有。许多农场遭到灭顶之灾,多数地方只剩下三两个人,有时是不过两三岁甚至刚满周岁的孩子,有的还在母亲尸体上吃奶。我见过一家叫图恩菲尔的曼佳就是这样……九个孩子只有两三个活了下来。(冰岛,荣·埃基尔松(Jon Egilsson),《主教编年史》关于1494—1495年的瘟疫)^[1]

那些经历过黑死病并用寥寥数笔记录下第四章中死亡数字的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瘟疫中。历史学家罗斯玛丽·霍洛克斯(Rosemary Horrox)提醒我们:“记录者有理由夸大数字,他们借此表达了恐惧和对目睹的周围死亡人数的难以置信。”^[2]死者不仅是数字,还是亲人。死者或垂死者是他们的邻居、朋友、子女、爱人和姐妹。温格雷夫马车上装的和被扔到威尼斯平底船上的都是爱人、玩伴或父母。那么多亲人突然死去,而他们的尸体还受到粗暴对待,这是多么恐怖。谁会是下一个?

对于经历过这一切的个人来说,恐惧、悲痛、愤怒、内疚和疲倦等情感交织在一起。意大利诗人和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序言中描绘了佛罗伦萨第一次疫情中人们的各种反应。有人为躲避恐怖和疾病而逃亡,有人忏悔、祈祷并尽可能帮助别人,也有人再无顾忌,用寻欢作乐和纵欲来掩饰恐惧。有时人们会把瘟疫和死亡归咎于堕落者、穷人、外国人或犹太人。面对瘟疫的威胁,有时人们也会团结起来采取自己所认为的积极行动。当社会团体采取的行动反映出个人对某事件正常的心理反应时(恐惧、希

望、仇恨和指责),我们称之为社会心理反应。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这些反应可能非常正面,是良性和无害的,但也可能是负面和有害的。本章将讨论三种相互关联的反应:“可接受的”宗教活动,可疑的鞭笞赎罪者活动,以及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对犹太社区的破坏。

教会的规定和民间的做法

长久以来,天主教会一直试图控制人们的道德意识并进一步控制他们的行为,从而使其符合上帝的意志。这样既能使个人免于地狱之苦,又保证了集体的幸福。祈祷、慈善或朝觐等具体行为体现了精神的悔罪,这是个人同上帝和解的基础,教会对此做了详细而权威的规定。教会要求人们相信,未经忏悔的罪和它带来的惩罚是最可怕的,甚至超过死亡。“善终”离不开圣礼和忏悔,祈祷即使不能使人们立刻升入天堂,至少也帮他们免遭地狱之火。萨努多在上文提到,许多人临终时既没有“做忏悔”,身边也没有神父的“守护”,这无疑是天主教徒的精神梦魇。“善终”还是上帝恩典的体现,佛罗伦萨贵族亚历山德拉·斯特罗齐(Alessandra Strozzi)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他的兄弟在那不勒斯去世了,“我相信他得到了救治,医生们尽力了。最后没有效果是上帝的意志。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临死前上帝给了他忏悔、接受圣餐和涂油礼的机会……上帝为他准备了好位置”。^[3]我们在第四章提到,有些主教允许在极端情况下垂死者向任何人忏悔,“甚至女人”。这是教会的变通做法。教皇甚至走得更远,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和“天国钥匙的掌握者”,他宣布所有临终时“抱着真正信仰”的人都会得到完全的赦免,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过最后的圣礼。

但人们仍然害怕死亡，“抱着真正信仰”而死意味着要以同样的方式而活。基督教认为死亡是因为人的罪：亚当和夏娃因为在伊甸园违抗神命而失去永生，圣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死亡不完全是自然界的中性现象，而是在世上犯罪和作恶的结果，它的道德意义有时体现在该时代的艺术中，死神被描绘成可怕而丑陋的。在这个经常可以看见死亡的时代，人们把蛆虫和腐尸作为意象，它们成了墓地的装饰。匿名的中古英语诗歌《尸体和蛆虫的争论》（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10）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上帝为尸体安排的命运。基督教中早就有强大呼声，要求在活着时训诫甚至羞辱（mortify，字面意思是像对待死尸一样）自己的身体。虽然早期僧侣们有意过着严苛的生活，但 14 世纪的后辈们早已放弃了苦修。不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及其信徒一直以简朴生活为荣，他们试图通过布道和以身作则让日益物质化的欧洲回归更注重精神的生活方式。第一次疫情后，圣方济各的精神性变得很流行。在意大利普拉托（Prato），精神上焦惶不安的富商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成了当地圣方济各会的赞助人，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虽然人们活着时不会亏待自己，但会在遗嘱中要求死后不搞大型葬礼和奢华的纪念仪式。有人坚持像圣方济各一样死在地上，有人则要求被装在布袋里下葬，还有的请求被埋在教堂入口的石板下面，这样进出教堂的人就会从他头顶踩过。^[4]人们相信，羞辱不仅对死者的灵魂有益，幸存者也应改变生活，让自己的肉体挨饿以便灵魂获得更多食粮。这种做法能让死亡变得有意。^[5]

地上的教会被认为只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的一部分。活人为死者的灵魂向上帝祈祷，它们正在炼狱这个“精神之

所”经受磨难,被罪腐蚀的灵魂会被洗净,然后前往天堂。那些已经在天堂中的圣人可以为活人向上帝祈祷,活人则可以向圣人祈求代祷,我们在第六章将会看到,这种“圣人崇拜”保存了人们的最后一丝希望。如果瘟疫是上帝发起的,而人类又是罪有应得,那么除了圣人还有谁能帮助他们呢?整个黑死病期间,人们建造教堂、撰写祷文、绘制圣像和崇拜圣物,希望贞女玛利亚以及塞巴斯蒂安和罗赫这样的圣人能用他们的美德和祈祷减轻上帝正义的惩罚并结束灾难。所以,祈祷者带着悲伤、悔恨、恐惧和希望向上帝和圣人祈祷,他们请求治愈病人、结束家乡的瘟疫、让自己不生病、缩短在炼狱中的受苦,并让活人得以善终。他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圣人们的代祷。为此,神父每天都在教堂举行弥撒,而主教则组织虔诚的祈祷者参加游行,他们穿过城镇,希望表达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和爱。“为了赶走瘟疫”,教皇克雷芒六世(见人物传略)亲自写了弥撒文:

所有参加这场弥撒的悔罪者都是真心的,他们(在炼狱中)会得到 260 天的宽赦。所有参加者必须手持点燃的蜡烛,在接下来五天的弥撒中一直拿着它并双膝跪地,骤死病将不会伤害他们,这在阿维尼翁及其周围地区已被确证。

圣礼之后的规定祷文是:“啊,上帝,我们的救赎。请俯听我们的祈祷,接受圣母玛利亚的代祷,将您的民从您怒火的恐怖中解救出来,仁慈地赐予他们恩典。”^[6]

鞭笞赎罪者

在中古时代西欧各地的城镇中,来自各行各业的世俗人士(有时也有女人)会组织宗教团体或兄弟会。某些方面它们类似

早前的十字军,即把世俗生活同宗教义务和目的结合起来。到了14世纪晚期,这些团体开始和某些教区或教堂联系起来,并从当地教士中招募自己的随团神父。团体有三种类型:慈善团,它们帮助穷人或在瘟疫中埋葬死者;歌祷团,它们定期集会时歌唱赞歌和祈祷;赎罪团(*disciplinati*),它们得名于成员用鞭子鞭打自己和互相鞭打,这是一种个人和集体赎罪的形式。各种团体的世俗“兄弟们”遵守自己制定的行为规则,通常包括定期参加圣礼和遵守教会对于正当生活的规定。成员们一起参加宗教游行,并常以团体形式参加主日弥撒。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成员在原有的宗教义务之外还有新的要求,他们不仅是教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支持者,也是参与者。

选择成为鞭笞赎罪者(*flagellants*)的人要操练鞭笞,把它作为个人和集体的锻炼。耶稣在钉十字架前曾被罗马士兵鞭笞,而早期教会也把鞭笞作为对违规僧侣和教士的惩罚。僧侣常常鞭笞表示悔罪,这种羞辱肉体的方法表现了对罪的悔恨,并让人感受耶稣受难时的痛苦。1260年,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的一个世俗团体公开操练了鞭笞,但蒙住头部以掩盖身份。鞭笞团在城镇间巡游,呼吁个人和集体悔罪。它们开始在意大利和中东欧传播,但因为很难控制参与者,教会随后打压和解散了巡游团体。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德意志它们和教区建立联系并被当地宗教势力吸收。黑死病前,意大利奥维耶多(Orvieto)的圣方济各会鞭笞团每年新增约6到7名新成员。1348年新增106人,但年底时有109人死亡。^[7]

黑死病爆发后人们纷纷加入团体,参与祈祷、提供帮扶和安葬。由于有罪文化和通过悔罪来缓解疫情的需求,许多新的鞭笞团在城镇中应运而生,大部分都由教士领导,甚至教皇也参与了

1348 年在阿维尼翁的游行,但也有些不受教会管理。一些学者认为鞭笞团巡游运动起源于西西里,时间是瘟疫传入后的数月间。他们发现无组织的团体向北而行,于 1348 年 8 月穿过威尼斯,并于 9 月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的卡林提亚(Carinthia)和施提利亚(Styria)。^[8]但大多数学者认为 1348—1349 年的运动起源于奥地利,具体地点是距维也纳约 50 英里的茨韦特尔(Zwettl),时间是 1348 年 9 月 29 日。集体斋戒、弥撒和游行之后,“20 个上身赤裸的人从这座教堂走到那座,鞭笞自己,跪伏在地并唱赞歌”。^[9]

德语地区把这些团体称为“十字架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ross),其人数从 20 到 200 不等,他们穿越中欧和波兰,每到一处都会建立新的团体。行进路线上的每座城镇可能会被 5 个团体光顾 5 次。成员身着白袍或白色斗篷,戴白色的帽子或头巾,上面都有十字架图案。每次游行持续 33 又 $\frac{1}{3}$ 天,每一天象征耶稣生命中的一年。他们不洗漱、不换衣服,也不睡在床上。游行途中或进入城镇时,有一名成员会手持十字架或旗帜。他们还创作了一些方言歌曲和颂歌。进入城镇后他们会前往中央广场,脱去上衣开始仪式。见证过这种仪式的赫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ford)对其做了最详尽的记录,他称那些人为“无头生物”,显然是指他们缺乏领导和理智。但他们善于表演,人们对其反应热烈甚至疯狂,特别是前几次观看时。

亨利说,他们进入城中主教堂,脱去上衣后然后鱼贯而出,显然这是希望把自己和官方教会联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主要罪行跪伏于地:侧卧表示通奸,仰卧表示谋杀。领队用鞭子抽打他们,并为其祈求上帝恩典。鞭子分三股,每股顶端有一枚弯曲

的钉子。然后他们站起来开始列队唱起赞歌，但当唱到基督的受难时就“像木头一样”跌倒在地，伸直双臂呈十字形并祈祷。如此两遍后他们回到教堂开始接受捐赠，但不会主动索取。^[10]有的记录突出了鞭笞过程，还有的提到他们的血被收集起来作为圣物崇拜。

但这些人并非圣人，民众的赞美让其中一些人变得傲慢。有些领队甚至侵犯教士的特权，开始布道、接受忏悔和提供赎罪。有些团体变得极端反教权，甚至公开向神父扔石头。有的干扰教堂事务，公开否认圣餐中存在基督的身体。还有的宣称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当向西进入莱茵兰时，他们失去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社会支持，只是由变节的修士和僧侣领导。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成了危险的乌合之众。历史学家理查德·基克赫法(Richard Kieckhefer)认为，对那些正恐惧地等待瘟疫到来的地区，他们的效果是最强烈的，而对已经遭受过瘟疫的地区就差多了。^[11]不过，这些人到处受到弥赛亚般的热捧，他们流的血被认为能拯救世界，就像耶稣的一样。^[12]

到1349年夏天，他们的行为已经被一些人视作异端，地方的教会和世俗首脑开始谴责甚至禁止他们进入自己管辖的地区。在德意志西部，他们被认为煽动了反犹暴乱。这年秋天，巴黎大学神学系的教皇特使，本笃会僧侣让·德·法伊(Jean de Fayt)目睹了鞭笞团在佛兰德斯(Flanders)^①的行为。1349年10月20日，在查理四世的一再压力下，克雷芒六世突然用敕令谴责了该运动。^[13]他列举了他们的罪状，如自行选择着装、祷文和仪式以

① 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及违抗权威等等。他谴责那些人“在虔诚的外衣下残忍地干着不虔诚的事，肆无忌惮地伤害被虔诚基督徒接受和保护的犹太人”。^[14]他认为大多数成员头脑简单，只是被异端蛊惑，但仍要求主教和世俗统治者禁止这种游行。禁令得到许多人的响应，1350年2月15日，法国国王下令逮捕所有鞭笞赎罪者，查理四世禁止他们在帝国境内活动，西西里的曼弗雷德(Manfred of Sicily)^①用死刑威胁他们。^[15]抗命者被自动开除出教，世俗统治者还对其施以酷刑，如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②的公开斩首。当教皇宣布1350年进行大赦后，鞭笞运动的许多动因，如旅行和寻求新奇的欲望、悔罪和获得精神救赎的需求都不复存在了。当年按照规定路线去罗马朝觐的人的罪都会被赦免。许多人为瘟疫期间许下的诺言还愿(如果活下来我就……)，也有人为自己和亲人的平安感恩。

鞭笞运动于15世纪在德意志多次重现。1414年，80到90人被处以火刑。两年后在桑格豪森(Sangershausen)，300人在一天内被处决。1446年在北豪森(Nordhausen)，已经改过自新的鞭笞者仍被处火刑。审判和死刑直到15世纪80年代才结束。^[16]天主教会无力控制这些精神能量，这不仅表明了帝国境内教会的混乱，也体现了社会和精神焦虑的深层次本质，它驱使人们加入鞭笞赎罪运动或者成为其痴迷的观众。瘟疫既动摇了人们对教会的信心，又让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和沮丧中，即使正常的年份也是如此。鞭笞者的受苦和牺牲被看做积极的悔罪，所以在那些还没有爆发瘟疫的地区，人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强有力的

① 原文可能有误。曼弗雷德1258—1266年在位。显然，他响应的并非克雷芒六世的禁令，而是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译者注

② 古代公国，位于德意志中西部莱茵河以东。——译者注

精神预防。鞭笞团以极端和公开的方式实践着教会的宣传,自以为合法的他们却惹恼了教士,因为后者失去了对悔罪和救赎方法的垄断。在宗教改革前的德意志这是无法容忍的。

对犹太社区的攻击

中世纪晚期犹太人约占欧洲人口的 1%,他们和占多数的基督徒间时常关系紧张。虽然教会官方声称他们的社区受到承认和保护,但普通基督徒却私底下为犹太人打上“杀害基督凶手”的标签,指责他们拒不接受福音书的真理,还与基督教的敌人特别是穆斯林为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德意志有几十个犹太社区被人民军成员攻击,他们自称要消灭欧洲不信仰上帝的人。犹太人常被指控乃至判刑,如在仪式中杀害儿童(1235 年德意志福尔达有 34 人因此被处火刑,1255 年英格兰林肯市有 19 人被处决)、对圣体餐不敬(1298 年 417 个地方有犹太人因此被暴徒殴打或杀害)和在井中投毒(1161 年在波西米亚,1267 年在维也纳,1321 年在法国南部)。^[17]黑死病爆发后不久,法国南部就重现了投毒的谣言。

瘟疫的神秘性让许多人接受了第三章讨论过的各种“成因”,但也有人相信蓄意投毒的指控。瘟疫早期,法国卡尔卡索纳(Carcassonne)地区发现 11 名“贫民和乞丐”携带了“毒药包”,准备在井中投毒。他们被作为法国公敌肢解和焚烧。随着瘟疫和恐惧的扩散,寻找罪魁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在普罗旺斯,矛头被指向英国间谍、贵族、麻风病人和犹太人。在阿拉贡,有王室官员报告说“到处传说水源被他们下了毒”,他指的是经过该地区的朝觐者。维斯卡(Huesca)当地政府被要求保护穆斯林社区,因为

他们处于公众怀疑的阴云下。^[18]

很快犹太人就被和“下毒”联系了起来，从前的谣言不仅在平民中，也在有权势者中再度流行。1349年，阿方索·德·科尔多瓦(Alfonso de Cordoba)医生在蒙彼利埃提到，那里的第三波疫情并非自然，而是“人为的”。他猜测有不明身份的人将装满毒气的玻璃罐在石头上摔碎，释放出腐蚀性蒸气。哈克梅·达格拉蒙特在他的须知中赞同了这种观点，认为犯罪者是“邪恶的人，魔鬼之子”，在普通人看来这指的就是犹太人。^[19]1348年9月，日内瓦一名受命于拉比的“萨瓦犹太人”首先“承认”了罪行。但此时法国南部和阿拉贡已有成百上千名犹太人被杀害。投毒说却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很少有人质疑有毒的水和“腐败空气”之间的关系。1349年，德意志圣方济各会的赫尔曼·基加斯(Hermann Gigas)写道：“有人说(瘟疫)是由腐败空气引起的，有人则认为犹太人想要杀光基督徒，他们在各地的井和泉水中下毒。许多犹太人在拷打下承认，他们在罐子和盘子里养蜘蛛和蟾蜍，还从海外获得毒药”。^[20]

但投毒的无理指控只是欧洲犹太人处境的冰山一角。当时，人们到处寻找基督教社会可能的敌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因其宗教成为了目标。有些头脑发热的人认为，上帝可能因为那些人的罪而将怒火降临到所有人头上。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反犹情绪是顺理成章的。在阿拉贡，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在宫廷身居高位，许多西班牙人因此憎恨他们和他们的权力。还有的犹太人是金融家和税官，代表国王向不满的民众收税。^[21]英格兰(1290年)和法国大部分地区(1306年)早已正式驱逐了犹太人，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店主，向比自己贫穷的基督徒邻居赊账或直接贷款。欠债者大多讨厌债权人和债务。虽然各地情况

不一,但煽动反犹暴力的无疑是宗教狂热、债务、经济憎恶和下毒谣言的组合,它从巴塞罗那开始经过瑞士和莱茵河谷蔓延到比利时。对瘟疫的恐惧,甚至是谈瘟色变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瘟疫过后的 1348 年棕枝主日(Palm Sunday)^①,也就是天主教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法国土伦(Toulon)的 40 名犹太人在睡梦中被人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嗜血的暴徒拖到街上践踏。5 月,卡尔卡索纳(Carcassonne)和纳邦(Narbonne)的犹太人被灭门,拉鲍姆(La Baume)的犹太人全部被害,他们的商品被抢掠一空。5 月 17 日,暴徒袭击和抢掠了巴塞罗那的犹太社区,他们毁掉了与当地债权相关的文件,杀死 20 名犹太人。不久在内陆地区的塔莱加(Tàrrega),300 名犹太人被杀害,赛维拉(Cervera)有 18 人死亡,所有犹太人的房屋遭到洗劫。虽然佩德罗四世国王试图保护“他的”犹太人,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命令。6 月,统治今天法国南部部分地区的让娜女王同样试图保护当地犹太人,但暴徒把她的代表赶出阿特,然后继续杀戮。女王称他们为“撒旦之子”^[22]。这些现象如瘟疫一样沿路传播到多弗内(Dauphiné)并于 9 月向东进入瑞士。苏黎世永远驱逐了所有犹太人。1349 年 1 月,巴塞尔的 200 名犹太人被赶进一个大谷仓烧死。查理四世下令禁止在帝国土地上虐待犹太人,但 11 月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和奥格斯堡(Augsburg),12 月在埃斯林根(Esslingen)、林道(Lindau)、兰茨贝格(Landsberg)、布亨(Buchen)和曼宁根(Meiningen)都发生迫害事件。“12 月 20 日在霍尔弗(Horw,位

^① 复活节之前的周日,标志着圣周的开始。《圣经》上说这天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受到手持棕榈枝的民众的欢迎。——译者注

于瑞士卢塞恩)他们被扔进坑里焚烧。当木头和稻草烧完后,有些犹太人还没死,既有年轻的也有老人。(旁观者中)身强力壮的捡起木棍和石头把那些试图从火堆里爬出来的人打得脑浆迸裂,把想逃跑的人逼回地狱。”^[23]1348年7月、9月和10月,克雷芒六世扩大了教会对犹太人的保护,并要求教士阻止和惩罚反犹行为。^[24]

1349年1月,布莱斯高的弗赖堡(Freiburg im Breisgau)和乌尔姆(Ulm)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施派尔(Speyer)的犹太人据传把自己关在犹太教堂中自焚。在斯特拉斯堡,主教和当地士绅一起审理犹太人投毒案,最后的裁决顺从了“民意”。该城1884名犹太人中有900人被活活烧死(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11),其余的被驱逐(但他们可以在日出和日落间营业)。当瘟疫穿越莱茵兰时,东边的城市也开始了可怕的预防行动。3月,康斯坦茨(Constance)、巴登(Baden)、沃尔姆斯(Worms)和埃尔福特处决了两个月前被逮捕的“有罪”犹太人。直到这年年底,在德意志北部、西里西亚和波兰都有犹太人被处决和杀害。科尼斯霍芬(Königshofen)的雅克布·特温格(Jacob Twinger)总结了许多人眼中(包括教皇)的杀戮背后的原因:“钱是犹太人被杀的原因。如果他们很穷,或者地主没有欠他们钱,他们是不会被杀的。”^[25]但“地主”不是唯一的债务人,工人和下层阶级显然也欠了很多钱,通过暴力破坏同时摆脱了债务记录和债权人。

欧洲宫廷和城市中的上层社会有许多理由来制止这种暴力,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犹太人是他们重要的贷款来源,因为基督教社会禁止收取贷款利息。当需要资金时,犹太人团体是理想的征税对象。但像鞭笞赎罪者一样,暴徒们很难控制,因此官方一边举行象征性的审判和处决,希望以此满足人们的杀戮欲,另一边

对暴徒开展严厉打击。在累根斯堡(Regensburg),237名神父发誓保护犹太人。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和贵族仔细调查了9座城市的投毒指控,最终认定它们都不成立。因为自己的刚直,贵族首领彼得·斯瓦伯(Peter Swarber)被杀红了眼的公会政府剥夺了全部财产。^[26]查理四世设法拯救了位于自己的领地波西米亚上的许多犹太社区,这样做的还有奥地利公爵阿尔伯特二世。普鲁士当局不仅制止了大规模暴力,而且将犯罪者绳之以法。虽然教会没有纵容反犹暴力,并对反犹行为做了谴责,但它要对培养反犹情绪负责。今天我们知道,培养情绪和纵容暴力没有大的区别。赫尔曼·基加斯在他的犹太人“井中投毒说”最后写道:“上帝,复仇之神不会允许犹太人的恶行逍遥法外。在德意志几乎所有的地方,他们都被烧死。”许多德意志犹太人向东迁移,到1490年,匈牙利犹太人口增加三倍,波兰增加四倍。虽然经历了反犹暴力和14世纪90年代的强迫皈依,但西班牙的犹太人口在15世纪从15万增加到25万。^[27]1492年,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①驱逐了所有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

黑死病的社会心理反应非常复杂。短期内它既加强了人们对基督教的虔诚,又为许多反社会行为打开了大门。第一次疫情期间,鞭笞赎罪者和杀害犹太人的暴徒利用社会的恐慌和宗教热情升温在某些时期和地点取得了成功。但鞭笞运动很快在教会的打压下式微,而反犹暴力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平息了,投毒谣言再没有被广泛传播。虽然社会暂时的崩溃被各类犯罪分子利

^① 指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1452—1516)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夫妇。1479年两国宣布合并成为西班牙。——译者注

用,但大多数地方的法庭和执法部门很快恢复了旧有秩序。

当瘟疫、鞭笞赎罪者的巡游、罗马朝觐和杀害犹太人都结束后,世界又有了生命和欢乐,人们开始裁制新衣。(《林堡编年史》(*Chronicle of Limburg*),1350年)^[28]

随后的时间里,基督教获得了蓬勃发展,但1347—1350年的瘟疫还使欧洲人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更加广泛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人和下层阶级中。英格兰虽然没有发生反犹行为和鞭笞赎罪团,但出现了另一种反权威的态度和行为。1350—1400年,虚构的罗宾汉形象作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名鹊起。1381年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向伦敦的进军。1382年,1384年,1390年和1393年,切斯特镇也爆发了平民骚乱。1358年,法国“扎克”农民(Jacques)在巴黎盆地反抗贵族地主。^① 20年后,佛罗伦萨的梳毛工(ciompi)用暴力在行业公会控制的政府中暂时获得一席之地。^② 瘟疫造成的人数锐减既加重了下层阶级的工作负担,也提高了他们经济预期。为了减轻负担和早日实现预期,他们开始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世界开始从中世纪过渡到早期现代社会。

注释:

[1] 以上引文出处: William quoted in Christopher Harper-Bill, “The English Church and English Religion after the Black Death,” in *The Black*

① 由纪尧姆·卡尔勒领导,史称扎克雷起义。因贵族对起义农民的蔑称“扎克佬”(Jacques Bonhomme)而得名。——译者注

② 1378年7月22日,以梳毛工为代表的下层阶级占领了佛罗伦萨市政府,他们将组织行会的权利扩展到下层阶层,使其第一次获得了参加政府的权利。8月31日起义失败。——译者注

- Death in England*, ed. W. M. Ormrod and P. G. Lindley (Stam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Paul Watkins, 1996), p. 110; Sanudo quoted in Stephen D'Irsay, "Defense Reactions During the Black Death, 1348—49," *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 9(1927): pp. 170—71; Palfryman quoted in Christopher Daniell, *Death and Burial in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94; Egilsson quoted in Gunnar Karlsson, "Plague without Rats: The Case of Fifteenth-century Ice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2(1996): p. 269.
- [2]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 [3] Quoted in Gene Brucker, *The Society of Flor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p. 48.
- [4] Kathleen Cohen, *Metamorphosis of a Death Symb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54—56.
- [5] Caroline Bynum,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Middle Age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9(1985): p. 100.
- [6] 教皇弥撒文由 Horrox 翻译, 见 *Black Death*, pp. 122—24。
- [7] Mary Henderson, "La confraternita e la catastrofe: La Confraternita francescana di Orvieto e la pesta nera," *Bollettino dell'Istituto storico artistico orvietano* 48/49(1998/1999): pp. 91, 115.
- [8]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editerraneens*, Vol. 2 (Paris: Mouton, 1976), p. 66.
- [9] Stuart Jenks, "The Black Death and Würzburg,"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77), p. 89.
- [10] 译文见 Horrox, *Black Death*, pp. 150—53.
- [11] Richard Kieckhefer, "Radical Tendencies in the Flagellant Movement of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4(1974): p. 159.
- [12] Anne Autissier, "Le sang des flagellants," *Medievales: langue, textes, histoire* (Paris) 27(1994): pp. 53—54.
- [13] Kieckhefer, "Radical Tendencies," 157; John Aberth, *From the Brink of the Apocalyps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55—56; William McDonald, "Death in the Stars: Heinrich von Mügeln on the Black Plague," *Mediaevalia* 5(1979): p. 91.
- [14] Aberth, *Brink*, pp. 155—56.
- [15] Biraben, *Les hommes*, Vol. 2, p. 70.
- [16]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

- 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6.
- [17] Anna Foa, *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 trans. Andrea Grov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p. 19; Aberth, Brink, pp. 158—59; Steven Rowan, “The *Grand peur* of 1348—49: The Shock Wave of the Black Death in the German Southwest,” *Journal of the Rocky Mounta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ssociation* 5 (1984): p. 24.
- [18] David Nirenberg, *Communities of Violence: 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3; Emmanuel Lévi-Strauss, “A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14th to 17th centuries),” in *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 trans. Siân and Ben Reynol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p. 54; Melanie V. Shirk, “The Black Death in Aragon, 1348—1351,”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7 (1981): p. 35.
- [19] Nirenberg, “Communities,” p. 235.
- [20] Ron Barkai, “Jewish Treatises on the Black Death (1350—1500),” in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ed. Luis García-Balles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更完整的译文见 Horrox, *Black Death*, p. 207.
- [21] Shirk, “Black Death,” p. 36; Angus Mackay, *Spain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41.
- [22] Joseph Schatzmiller, “Les juifs de Provence pendant la peste noire,”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33 (1974): pp. 458—61 (quote at 460); Nirenberg, *Communities*, p. 237; J. Gautier-Dalche, “La peste noire dans les états de la couronne d’Aragon,” *Bulletin hispanique* 64 (1962): p. 71.
- [23] Account of cleric Heinrich Truchess of Constance in Horrox, *Black Death*, p. 208.
- [24] Horrox, *Black Death*, pp. 221—22.
- [25] Rowan, “*Grand peur*,” p. 23.
- [26] Rowan, “*Grand peur*,” pp. 23—26; Norman Cantor, *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World It Made* (New York: Harper, 2000), p. 155.
- [27] Barkai, “Treatises,” p. 1; Foa, *Jews*, p. 8.
- [28]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trans. C. H. Clark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0), p.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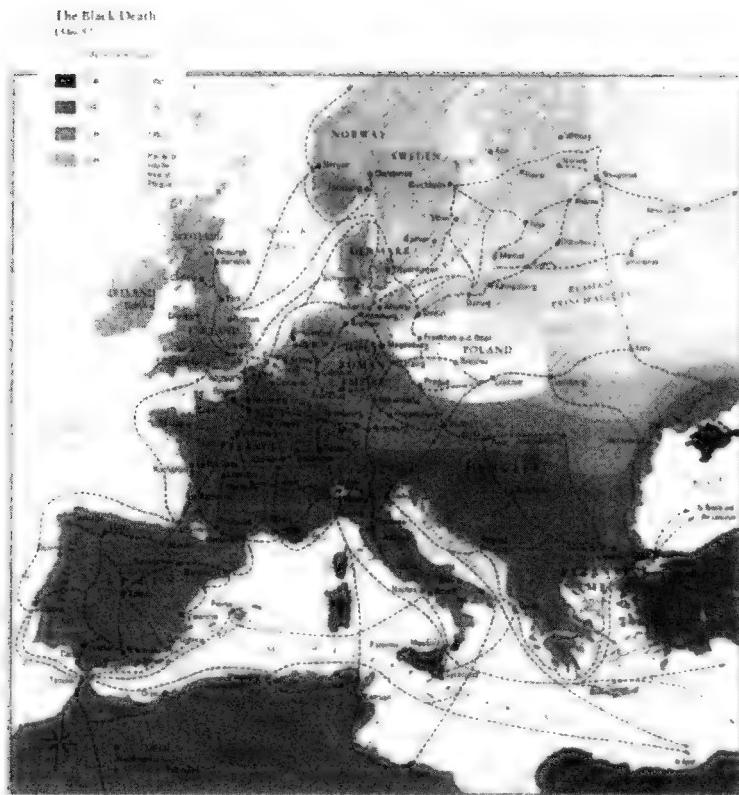


图 1

中世纪的主要贸易路线和瘟疫传播的路径

*Medice, curate
iplum.*

L V C E I I I I



*Tu congnoys bien la maladie
Pour le patient secourir,
Et si ne scais teste estourdie,
Le mal dont tu deburas mourir.*

F

图 2

《医生，治好你自己》。这幅死亡之舞主题的木刻画是 1538 年法文版《路加福音》第四节的插图，作者是汉斯·荷尔拜因。图中文字的意思是：“你对疾病很了解，深谙救人之道，但你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死神哪天找上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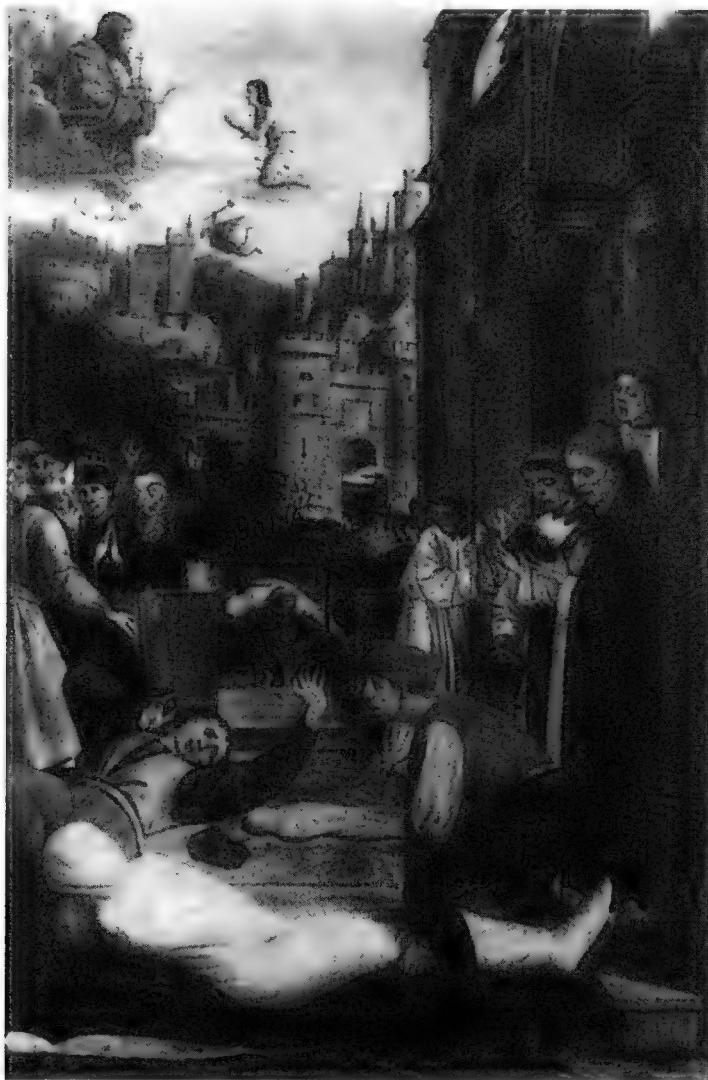


图 3

《瘟疫中塞巴斯蒂安的代祷》，约斯·利弗林克斯作于 1479—1499 年。当送葬队伍在教堂门口被瘟疫击倒时，天上的圣塞巴斯蒂安跪倒在上帝面前祈求结束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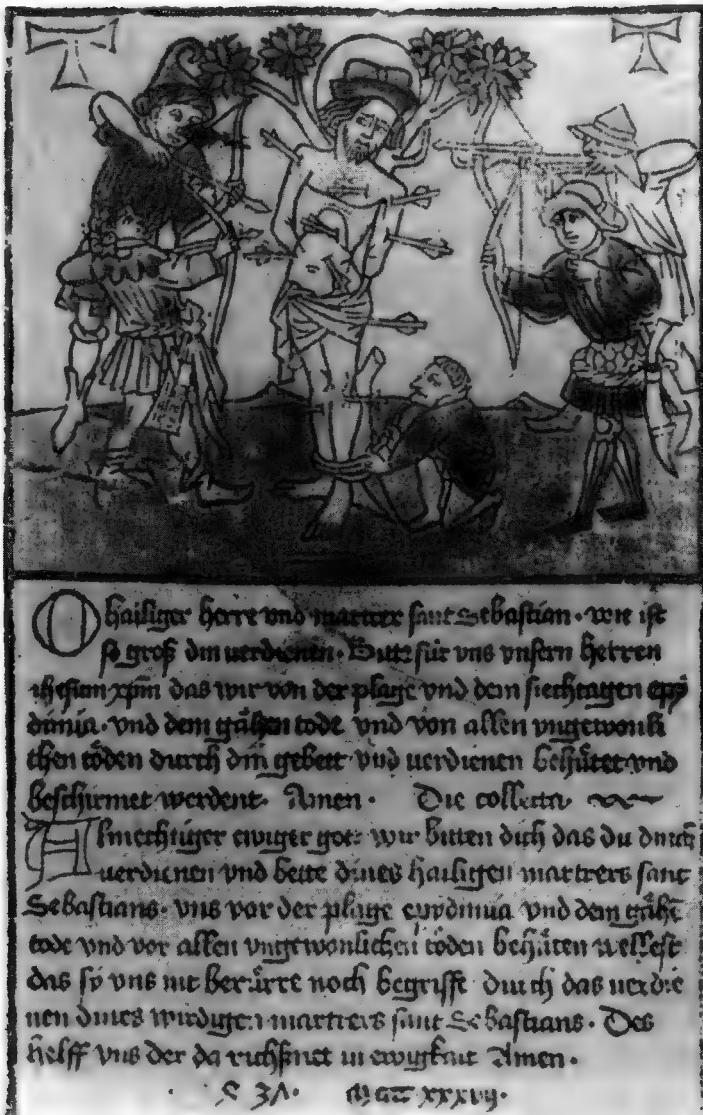


图 4

这幅 1437 年的单页木刻画描绘了“瘟疫圣人”塞巴斯蒂安受难的情形，下半部分的德语祷文请求他代为向上帝祈祷。注意画中弓箭手的装束是中世纪的。



图 5

《鞭笞赎罪者》，选自林伯格兄弟作于 1412 年的《美丽时祷书》手稿。画面中，几个立姿“团员”正在鞭打自己，另一个则鞭打着匍匐在地的两名团员，后者正在进行忏悔。画面上方的龙象征魔鬼，它居于十字架后方，表示基督已将其降服。15 世纪的这些鞭笞赎罪活动是诞生于 1348 年的被当局许可的礼拜游行的一部分。



图 6

《三个活人遇见三个死人》，选自诺曼底公爵·卢森堡的波恩的《圣诗集和祈祷书》，作者可能是让·勒努瓦和他的女儿布列塔尼。波恩本人死于瘟疫，因此该作品当早于1349年。活人同死人交谈这一恐怖的主题被用来提醒世人他们终有一死，中世纪晚期，它变得更加流行。



图 7

16世纪的《尸体和蛆虫的争辩》手稿上的腐尸墓插图。图中既有诗中出现的墓葬形象，又描绘了黑死病发生后出现的这种新型坟墓样式。表现尸体腐烂样子的雕像被特意置于表现死者完美形象的雕像之下。它提醒路人尘世生活的虚无。



图 8

《世界的七个时代：死神的形象》。画面中，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尸体破土而出，翩翩起舞。下面的文字写道：“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好……”它提醒人们，死亡终将战胜肉体。这幅画是米夏尔·沃尔格穆特为哈特曼·谢德尔的《编年书》所作的木刻插图，1493 年由安顿·科贝格在纽伦堡印刷。

第六章

欧洲艺术与黑死病

14 和 15 世纪的艺术创作过程将赞助人和艺术家紧紧包围在一个文化框架中。该框架受教会、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艺术实践传统的影响，决定了可接受的主题、风格和艺术品的用途。对于研究黑死病的学生，艺术是通往过去的一扇窗。有的作品记录了受瘟疫影响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埋葬死者、医生出诊或宗教游行。有的展现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如腐尸、上帝审判或死神杀戮的场面。还有的象征了幸存者的希望和对圣塞巴斯蒂安、圣罗赫和贞女玛利亚等圣人的感激，他们被认为能代表人类向上帝求情。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黑死病引起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的变化。

艺术中的黑死病

无论西方基督教还是伊斯兰世界都无法用视觉图像表现黑死病这样的灾难。艺术家竭力创造出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该事件及其不同方面和意义的图像。他们的作品出现在书籍、教堂和公墓的墙壁、圣坛上方以及带有祷文或诗歌的单面印刷品上。无

数绘画和木刻都描绘了上帝、天使或魔鬼向城镇或人群投掷长矛或射出瘟疫之箭。死神有时也会手持标枪、刀剑、手斧和钢梢多股长鞭,但比起其他武器,箭支和疾病的联系最为直接。它们从天而降,杀死或击伤一些人,但也有许多是落空了。在法国拉沃迪厄(Lavaudieu)的一幅壁画上,瘟疫被拟人化为一个手持弓箭,眼睛被蒙住的女人。^[1]

由于瘟疫频发,死神的形象在14世纪的西方更加标准化了。瘟疫时代之前,它可能是蛇或者吞噬活人的怪兽。有时死神的形象是小矮人,常常还是女性,她被代表永生的基督打败。后来,这一形象演变成更加恐怖和强壮的蛮族女猎手。尸体和骷髅早就被作为死神的形象,而圣方济各会还用它们暗示人类必死的命运。尸体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无论是正常的卧姿还是游荡着的形象都在提醒人们死神的无处不在。它们被包在裹尸布里,蛆虫或蛇从它们的眼眶中钻出,肠子从裂开的肚子里掉出来。虽然画起来很难,但骷髅无肉的四肢和带着诡异笑容的头骨随处可见。它们拿着箭支、刀剑、镰刀或长柄镰刀像割草一样杀人。在1437年乔瓦尼·迪·保罗(Giovanni di Paolo)的一幅可怖画作中,长着蝙蝠翅膀的多毛死神手持箭支骑在马上,向面前一位孤独而悲伤的祈祷者痛下毒手。

活人常被和死人放在一起,如《三个活人遇见三个死人》或《死亡之舞》中的场景(见图6)。前者绘于黑死病出现前,三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出门游玩时遇见三具腐烂程度各异的尸体。画中通常附有诗文,死人对活人说的“我们曾经像你们一样,现在的我们就是将来的你们”揭示了这类作品的主旨。这种庄严的情感在古罗马墓地和早期阿拉伯诗歌中也能找到。黑死病期间,这类形象出现在从意大利中部到英格兰北部的教堂和墓地中,它的流

行源于其传递的信息：人们应该马上忏悔和改变生活，因为很快他们就会成为尸体。“死亡之舞”题材传递的信息不如前者积极。在此类场景中，24 或 36 名代表不同阶级和职业的人在和尸体或骷髅的会面或“共舞”中走向死亡，显然它表达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没有人能逃脱死亡。它还常常反映了社会等级，教皇冠冕堂皇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孩子或者抱着孩子的母亲站在最后。无论在教堂墙壁还是早期的传单上，该主题常附带拉丁诗文或用方言写的对人物情景的评论。学者们对其起源的意见不一，它可能出现在德国，时间是黑死病爆发前或者第一次爆发后。该主题最早的壁画出现在 1424 年巴黎圣方济各会的无罪者墓地。

无论是谁都要遭遇死亡，所以上述主题比瘟疫更具普遍性，但瘟疫期间的大量死亡让这些主题更加贴近生活，从而推动了它们的流行。“死神的胜利”这个主题更准确地描绘了黑死病造成的社会毁灭，反映出死亡的恐怖已从个人和小团体扩展到整个人类。黑死病爆发后，诗人彼特拉克也在自己的诗歌中借鉴了比萨圣地公墓(Camposanto)的一幅此类壁画(约 1340 年)。^[2]在文字旁的图画中，死神以肩扛长柄镰刀的尸体或骷髅的形象出现，它乘坐巨型牛车，碾过从皇帝到农民的人群，而他们正跳着类似死亡之舞的舞蹈。1485 年，让·科隆布(Jean Colombe)在勃艮第的《豪华时祷书》(*Tres Riches Heures*)中使用了该主题的一种变体：人类军队在可怕的骷髅军团面前瑟瑟发抖。在弗莱芒人老彼得·布鲁格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1562 年描绘的梦魇中，成群的死人在弥漫的硝烟中向人类发动攻击，不管对方是否有罪。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而是人与死神。死神总能获胜。

瘟疫爆发期间，许多人被埋进无名的坟墓或大墓坑。这种完

全消失的感觉令人恐惧,于是有条件的人要求在自己的坟墓上留下足够标记。在大约两个世纪里,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在墓顶安放自己真人大小的雕像。14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墓葬形式,在表现主教、红衣主教或贵族落葬时衣冠齐整形象的墓饰下面是真人大小的腐尸像,也就是穿戴整齐的尸体落葬几年后的样子。最早使用这种生动表现尸体变化的腐尸墓(transi tomb,见图7)的是1393年去世的法国医生,拉翁的纪尧姆·德·阿尔希涅(Guillaume de Harcigny of Laon)。1402年,红衣主教德·拉格朗日(de La Grange)在阿维尼翁下葬时也用了这种墓饰。它渐成潮流,英格兰的腐尸像通常裸体且瘦骨嶙峋,德意志的版本表现了蛇和青蛙在尸体上的蠕动钻营,法国和勃艮第的版本常用裹尸布遮蔽尸体的某些部位。分隔人像和腐尸的桌形结构有的没有装饰,有的刻有钉十字架或复活的小幅场景,有的带盾形纹章或铭文。英格兰最早的此类墓葬(1425)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齐切尔(Henry Chichele),他的铭文写道:“我出生贫苦,后来升为主教。现在一病不起,将成为蛆虫的食物……你们死后也会和我一样:全是可怕的尘土、蛆虫和腐肉。”很难把这种悲观的情绪和历史学家约翰·阿伯斯(John Aberth)的说法联系起来,他认为这座坟墓象征了复活战胜腐朽,末日审判后一切将被恢复。阿伯斯把墓顶衣冠齐整的雕像看作未来复活的大主教。许多腐尸墓还要求扫墓人为死者祈祷,让死者减少在炼狱中等待进入天堂的时间。^[3]

描绘瘟疫期间日常生活和死亡的作品不多,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它们很有价值。医生常出现在死亡之舞或医药文学的插图中,特别是后来印刷版的装饰性木刻画。他们一般身穿医生袍并戴着帽子,摆弄着装有待检尿液的大玻璃瓶。医生常出现在病

人的房间里,这是少有的病人也出现在画面中的情形。艺术家还在受难者图像中加入虔诚元素:地面上的人群在痛苦挣扎,而圣人则向安坐云端的上帝祈求恩典。在利弗林克斯(Lieferinxe,南尼德兰画家)的《圣塞巴斯蒂安的代祷》(见图3)中,有人在搬运一具包裹好的尸体进教堂时被反讽地击倒了。无论哀悼者、神父还是他的侍从都无动于衷,继续搬运和装载尸体。画中没有出现棺木表明疫情严重。最著名的集体埋葬场景也许出现在吉尔·里·穆伊西(Gilles li Muisis)的手稿中(约1350年),这是现存唯一的一次爆发期间的作品。人们扛着棺木或包裹好的尸体来到坑边,在别人帮助下将尸体放入。前景和背景中的掘墓人继续着可怕的工作。在乔瓦尼·迪·保罗的《圣尼古拉拯救佛罗伦萨》(1456)中,人数寥寥的送葬队伍穿过除了他们之外空无一人的城市,扛棺人步履艰难地和神父一起跟随秉烛者前行。

代祷的艺术

中世纪的基督徒相信所有人都有罪,而所有罪人都没有资格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恩典。反过来,由于他们的罪和违命,任何上帝认为合适的惩罚都是应得的,包括黑死病。只有那些让上帝喜悦并得到宽恕的人才能向上帝求情,代表人类唤起上帝无限的仁慈并减轻惩罚。这些人离开尘世后成为圣人,和上帝一起住在天上。东西方的教会很早就宣传说圣人仍然关心地上的人,那些认出他们的虔诚者会得到回应。天上的圣人是地上可怜罪人的辩护者,他们代替没有资格的人类向上帝祈祷。《圣经》上说基督是圣父面前最好的辩护者,但如果基督做了法官,谁来辩护呢?如果是基督射出瘟疫之箭,谁有资格让他听见自己的辩护呢?当

然是圣人。

向圣人祈祷、崇拜圣物和绘制圣人像的历史远远早于 1348 年,14 世纪时“圣人崇拜”达到顶峰。圣人的艺术形象被用来装饰教堂、房屋、市政厅甚至城门。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在家中前门旁画了旅人保护者圣克里斯托弗,作为家人和来客的保护神。后来,圣人从向上帝求情的代祷者(*intercessor*)变成了保护者,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帮助人类。个人、手工行业公会、教区甚至城市都有自己的圣人保护者,他们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由于和基督的关系,圣母玛利亚被看作最灵验的圣人。1348 年时,她已经为东西方的教会提供了整整一千年的保护和支持。

玛利亚是人类在瘟疫面前“最有力的辩护者”。在随处可见的末日审判的画面中,基督代表上帝的审判,而玛利亚则象征仁慈,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她获得上帝的恩典。虽然天主教的“福哉玛利亚”(Ave Maria)只请求“为我们罪人祈祷”,但玛利亚自身也是保护者,这体现在天主教中玛利亚的慈悲(*misericordia*)形象上。这类形象最早由摩德纳的巴尔纳巴(Barnaba of Modena, 14 世纪中期的隆巴迪画家)为热那亚主教堂所作(1372 年)。画中巨大的玛利亚形象张开身上宽大的斗篷盖住跪地祈祷的某地居民,而画面上方基督、天使或魔鬼正向下发射长矛和箭支,它们碰到斗篷就会折断或弹开,而斗篷外没有保护的人则被箭支击倒。此类形象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玛利亚这样做是在对抗上帝的意志。16 世纪中叶,天主教会在塔兰托(Trent)会议上对其下达了禁令。^[4]

有些慈母像中没有瘟疫的画面,而是把玛利亚作为普遍的保护者。对许多天主教徒来说,与黑死病有特别联系的圣人是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和圣罗赫(St. Roch, 也作 Rocco, Roche,

Roccus)。塞巴斯蒂安生活在4世纪早期,他是一名士兵,因信仰天主教被判处死刑,在箭雨中他却活了下来。伤好之后他重新反抗异教徒皇帝,结果被残忍地打死。他和瘟疫的关系源于身受箭雨却能不死。自古以来,箭就和上帝发起的疾病联系在一起。旧约多次用箭来比喻上帝的惩罚,如《申命记》(32:23):“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或《诗篇》(64:7):“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诗篇》(7:12):“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遭受上天磨难的约伯哀叹:“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约伯记》6:4),“他的箭支手四面围绕我”(《约伯记》16:13)。古典作家和第一次大流行中的基督教作家都把瘟疫比作箭支。公元590年,罗马人奥通的霍诺留斯(Honorius of Autun)说“箭雨从天而降”^①。根据执事保罗的记录,已知最早的向塞巴斯蒂安的求助发生在7世纪中叶的帕维亚(Pavia)和罗马。罗马阿皮亚大道(Appian Way)^②旁的地下墓穴长久以来被与塞巴斯蒂安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遗骨已于826年被迁往法国索瓦松(Soissos)。

14世纪的公证人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Gabriele de'Mussis)总结了瘟疫爆发后意大利流行的信仰:“上述殉道者中有些据说死于多处箭伤,所以公众相信他们能保佑自己免罹死亡之箭。”同时代的修道院长吉尔·里·穆伊西描述了惊恐的德意志西北地区和法国对塞巴斯蒂安的特别崇拜:

死亡达到顶峰时,许多人……涌入埃诺(Hennegau,即Hainaut,位于今比利时西南部和法国北部)的圣彼得修道院,因为那里的圣物箱中发现了圣塞巴斯蒂安的遗物……当

^① 原文可能有误。奥通的霍诺留斯(1080—1154)是12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译者注

^② 古罗马时期连接意大利东南部阿皮亚的要道。——译者注

瘟疫肆虐法国时，朝觐者不论性别和社会阶层从法国各地涌入索瓦松的圣梅达尔(St. Medard)修道院，据说殉道者圣塞巴斯蒂安的遗骨就埋在那里。但当灾难结束后，朝觐和崇拜也停止了。^[5]

赞助人选择塞巴斯蒂安(或慈悲者玛利亚)作为画作的主题，既是预防疾病的手段，又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恩。在现存不多的几幅14世纪70年代前的作品中，塞巴斯蒂安被描绘成留胡子的长者。而两波瘟疫之后，他的形象变得非常年轻，几乎全裸地被绑在柱子上，全身钉了从3支到100支不等的箭(一般位于耻部、腋下和颈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作品中还要加上刽子手形象，但在中世纪版本中他独自英勇地忍受着痛苦，非常类似同时代受难耶稣的形象。它们在形式上借鉴了耶稣受难时被鞭笞的场景，以期将塞巴斯蒂安描绘成牺牲自我吸引上帝之箭的“避雷针”，这个角色比求情者和保护者复杂得多。在有的作品中他还身插箭支向上帝求情。本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在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①描绘的形象惊人且独一无二，他以慈悲圣母的姿势保护着城中的人。在奥斯陆、戈尔韦郡(Galway，位于爱尔兰中西部)的诺克莫伊(Knockmoy，作于约1400年，旁边有《三个活人遇见三个死人》)和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Ragusa，1465年)都有献给他的礼拜堂和圣坛，在法国诺曼底保存有约564处他的纪念旧迹。

圣罗赫作为瘟疫圣人出现的时间存在争议。早期故事中，他出生在法国蒙彼利埃的贵族家庭，时间是13世纪90年代到1350年之间。他前往罗马朝觐途中遭遇瘟疫爆发，于是就留在托斯卡

① 意大利中北部小城，以保留中世纪建筑风貌而闻名。——译者注

纳的阿夸蓬登特(Aquapendente)帮助病人。在罗马助人三年后，他经由皮亚琴察返乡。路上他感染了瘟疫，一个人呆在树林里，靠一条狗喂食。在上帝的帮助下他恢复了健康，但回到蒙彼利埃后却被怀疑是间谍并被逮捕，五年后他死在狱中。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天使手迹”，上面说他升天后将成为瘟疫病人的保护者。崇拜他的证据最早出现在15世纪初。他的传说在威尼斯周围非常流行，1478年，布雷西亚总督把传说定型为正式而有人情味的生平，他信誓旦旦地说：“感染瘟疫的人跑去寻求罗赫的保护，再重的病也会康复。”画像中的罗赫通常是站姿，他精力充沛，头戴朝觐者的帽子，拿着手杖和扇贝壳^①，身边是喂他食物的狗。他的左腿裸露，显出腿根处的淋巴结肿块，有些画像中天使会特意刺穿它们。他的形象几乎全是被动的，其角色是上帝面前的求情者。^[6]

中世纪人的艺术不仅反映精神上的希望、喜悦、痛苦和恐惧，还把它们加以形象化。通过描绘精神代祷者和保护者，黑死病期间的人们既承认了自身的脆弱，又把希望形象化和强化，其所用的方式对现代人来说可能陌生，但对他们自己是非常真实的。尽管这类艺术常被看作对黑死病可悲和迷信的反应，但路易斯·马歇尔和塞缪尔·科恩这样的现代学者将其看成积极和主动的精神防御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作品的赞助人可以因此获得心理慰藉。

迈斯的论文及其反响

1951年，艺术史学家米拉德·迈斯(Millard Meiss)的奠基

① 中世纪的朝圣者随身带着扇贝壳，用于盛放施舍，也有用扇贝图案装饰帽子和衣服。该传统是为了纪念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传说他救过一名身上盖满扇贝的骑士。——译者注

性研究让人们开始关注黑死病对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艺术品风格与内容的影响。迈斯认为,对瘟疫的恐惧让宗教画的赞助人放弃了持续半个世纪的艺术发展,转而回到更古老,可能也是更虔敬和更加注重精神性的风格。1348年前的画家,如佛罗伦萨的乔托(Giotto)和锡耶纳的洛伦采蒂(Lorenzetti)兄弟已经开始在宗教和世俗题材的作品中将人性描绘成自然的而非超自然或精神的。他们表现了恐惧、愤怒和痛苦这些人类情感,在描绘故事所在的画面空间时刻意模仿自然世界。他们乐观地看待人性,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善的而且值得仔细观察,并要求环境“有序、真实、有广度和纵深”。^[7]艺术家的赞助人喜欢这些作品,因为他们同样对人性抱有乐观和积极的看法。

迈斯认为,瘟疫发生后赞助人和艺术家改变了看法,他们觉得可能是世界有序和人性善良的错误看法招致了惩罚。人的骄傲和傲慢之罪正是上帝之箭瞄准的目标。因此,瘟疫之后的艺术“放大了神的国度并缩减了人的世界”。奇迹和神秘代替了自然的、熟悉的和人性的东西。有负罪感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作品中赞颂神性并相应地贬抑人性,以此表达新产生悔罪感。迈斯认为此类艺术“更具传统的宗教意义和教会特色,并且更接近前一时代的艺术”。^[8]城市社会中无论本地还是外来的新兴精英们也偏爱老一代的潮流,他们的品味不是形成于时尚大城市,而是文化僻壤。在迈斯看来,黑死病使文艺复兴风格的现实和人文主义艺术发展推迟了几十年。在这篇大胆的论文中,他似乎在社会的变迁和焦虑与艺术的风格和内容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

在总体上赞扬迈斯学术贡献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细节进行了批评。有几幅他研究的作品被证明作于黑死病之前,包括著名的比萨圣地公墓壁画《死神的胜利》。这表明,迈斯认为的某些由黑

死病引起的可怕艺术主题其实在瘟疫之前就有了。

迈斯认为“沉重的后瘟疫文化”的特点是回归从前的风格和内容,作于1348年后的一幅名为《斯特罗齐祭坛画》的佛罗伦萨木版画中的神像为他提供了完美的范例。在金色的背景前,坐姿僵硬的基督目光凝滞地盯着观众,他一手将天堂的钥匙交给圣彼得,另一手把象征正确教义的书交给多明我会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贞女玛利亚将圣托马斯引荐给儿子,正面脸的施洗者约翰站在圣彼得身后,两侧站着其他四位圣人。艺术史学家布鲁斯·科尔(Bruce Cole)强调这幅祭坛画与其所悬挂的礼拜堂有关,其沉重的格调并非因为黑死病,而是因为礼拜堂下面是斯特罗齐家族的墓地,它的风格与礼拜堂墙上所绘的末日审判一致。实际上,选择画的主题和画中圣人的不是出资人,“有负罪感”的银行家托马索·斯特罗齐,而是多明我修士和学者皮埃罗·斯特罗齐,礼拜堂和板画都位于他管理的新圣母大教堂内(Santa Maria Novella)。另一位艺术史学家戴安娜·诺曼(Diana Norman)指出,该作品既有自然主义(对服饰的处理)又有精神化元素(目光、不可接近的基督形象)。她认为,如果考虑科尔的观点,这幅画和之前时代的作品非常相似,没有反映出迈斯所宣称的重大变化。第三位批评者路易斯·马歇尔认为,庄严而不可接近的基督形象并不表示神经质和恐惧,她在画中看到的是“崇拜者和形象间相互约定的等级关系”,作品的真正含义是基督遥远但可亲。与其他作品一样,她把这幅画的主旨解读为正面的:人类试图减轻上帝的愤怒,重建和他的恰当、谦卑但积极的关系。^[9]

虽然在具体例证上受到批评,但迈斯关于黑死病改变艺术风格的观点得到艺术史学家汉克·凡奥斯(Henk Van Os)的部分

支持。不过凡奥斯否认所有改变都是由文化上的悲观或精神的变化引起的。他认为许多关键艺术家和赞助人的死亡才是真正原因。在受灾严重的锡耶纳,由于像洛伦采蒂兄弟这样的大师突然死亡,从事艺术培训的大型工作室纷纷倒闭。艺术家们寻找新的合伙人,改变了创作关系。此外,锡耶纳政府这一重要的赞助人在14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重大变故^①,用大量公共支出来塑造艺术品位的时代就此终结。凡奥斯认为是这些原因而非新的宗教精神造成锡耶纳绘画的水准和品位下降。从凡奥斯的观点出发,艺术史学家朱迪丝·施泰因霍夫(Judith Steinhoff)认为幸存的锡耶纳艺术家有意识地重组了合伙关系。艺术领袖的死亡以及收入和佣金的减少(所有作品价格下降50%)迫使不同风格和天赋的艺术家合作参与为数不多的新任务,甚至合用工具。由于个人风格的影响和相互交融,过去的“风格独立性要求”被放弃了。施泰因霍夫也认同凡奥斯的观点,即品位较低的“新赞助人”导致了艺术品位的下降,但她认为这些人并非改变了风格,而是对其完全无知。^[10]

施泰因霍夫指出,锡耶纳的合作潮在1363年瘟疫第二次爆发后结束了,主要原因是艺术市场开始复兴。历史学家塞缪尔·科恩做了大量工作证明文化价值和艺术表现的真正变化发生在第二次爆发后,因为人们意识到巨大的威胁可能会再次到来。迈斯宣称瘟疫后的艺术反映了“对个体性价值的否定”,但科恩没有在文化中找到这种否定。意大利人变得非常关心被人铭记,这体现在建造礼拜堂、赞助艺术和捐赠上。人们看到数以百计的人毫无痕迹地被大墓坑吞噬,目睹了整个家庭的死亡。于是,有钱人

① 1355年,锡耶纳由商人和银行寡头组成的9人政府垮台。——译者注

在活着时和遗嘱中会以自己的名义向宗教和慈善机构捐赠或建立医院和孤儿院。他们的名字、盾形纹章和画像突然出现在各种宗教艺术品上,如绘画、弥撒用具和服装、烛台、旗帜、窗户和祭台布上。把自己同教堂或圣人联系起来不仅有益灵魂,还会带来尘世的好处,如被人铭记并因此得到祈祷。科恩发现,1363年后意大利人的遗嘱对身后纪念活动作了具体规定,他们常要求把钱用在大型建筑或艺术品上,而不是向大量教堂、修道院或穷人做小额遗赠。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请人作画,但科恩发现屠夫、皮匠、面包师、铁匠甚至园丁都是有能力的。^[11]

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就是最好的例子。1348年,他父亲在遗嘱中要求把捐赠分散到普拉托所有的宗教机构。而在弗朗切斯科的遗嘱中,他详细规定了如何用自己庞大的财产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功能完备的基金会,用以帮助城里的孤儿。1410年弗朗切斯科死后不久,他的妻子让人在他们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的豪宅外墙上绘制了他行善活动的壁画。^[12]壁画轮廓至今可见。面对瘟疫时,个人对身后之名的关心直接引发了人类对艺术现实主义的关注,它将是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标志。

迈斯的论文尽管有缺陷,但其大胆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对它展开创造性的讨论,让我们从更准确,可能也更有趣的角度来看待瘟疫的影响。

注释:

[1] Christine Boeckl, *Images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p. 46—48; Marie-Madeleine MacAry, “La peste et saint Roch en Bas-Limousin,” *Bulletin de la Societe scientifique,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e la Corrèze* 94(1972): p. 83.
- [2] 彼特拉克此前写过《贞洁的胜利》与《和平的胜利》，用于赞美这两种抽象的美德。
- [3] Kathleen Cohen, *Metamorphosis of a Death Symb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1—2, quote at p. 16; John Aberth, *From the Brink of the Apocalyps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32—34.
- [4] Jerome Baschet, “Image et evenement; l’art sans la peste (c. 1348—c. 1400)?” in *La pesta nera* (Spoleto: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ro medioevo, 1994), p. 35; Louise Marshall, “Manipulating the Sacred; Image and Plague in Renaissance Italy,” *Renaissance Quarterly* 47 (1994): pp. 506—14, quote at p. 511.
- [5]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6, 54.
- [6]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Vol. 2 (Paris: Mouton, 1975), pp. 78—79; Marshall, “Manipulating the Sacred,” quote at p. 504.
- [7] Millard Meiss, *Painting in Florence and Siena after the Black Death: The Art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0.
- [8] Meiss, *Painting*, pp. 38, 70.
- [9] Bruce Cole, “Some Thoughts on Orcagna and the Black Death Style,” *Antichità viva* 22(1983): p. 29; Diana Norm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rt and Religion after the Black Death,” in her *Siena, Florence and Padua, I: Art, Society and Religion 1280—1400,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86—87; Marshall, “Manipulating the Sacred,” p. 488.
- [10] Henk Van Os, “The Black Death and Sienese Painting: A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Art History* 4(1981): pp. 242, 245; Judith Steinhoff, “Artistic Working Relationships after the Black Death: Sienese Compagnia, c. 1350—1363,” *Renaissance Studies* 14(2000): pp. 6—9.
- [11] Meiss, *Painting*, p. 31; Samuel Cohn, *The Cult of Remembrance and the Black Dea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35—56.
- [12] 见 Time-Life Books, *What Life Was Like in the Age of Chivalry*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97), p. 145.

第七章

开罗与佛罗伦萨的个人和政府的反应

黑死病重创了开罗和佛罗伦萨这两座大城市。那里的居民、教士和政府的反应方式体现了人性的共同点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开罗据说是地中海以西最大的城市，是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马穆鲁克(Mamluk)^①帝国的中心。作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开罗处于土耳其马穆鲁克(意为奴隶)统治者及其外籍士兵的严密控制下。基督教世界的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半岛上争夺政治经济霸权的诸城邦之一。虽然阿尔卑斯山那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它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佛罗伦萨由市民自治，市议会成员来自有权力的商业和手工业公会。两座城市都位于最早受瘟疫影响的重要海港的上游，居民们恐惧地目睹瘟疫沿尼罗河和阿诺河(Arno)而上。

① 马穆鲁克原指公元9—16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后来，他们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统治埃及达300年之久。——译者注

埃及开罗

14世纪游历丰富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将埃及描述为“宇宙的都市、世界的花园、人类的蚁丘、伊斯兰的柱廊、王室的宝座”。同时代的另一位周游世界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见人物传略)认为:“这里的人如此之多, 动起来就像波浪, 城市就像汹涌的海。”^[1]实际上, 开罗由尼罗河畔的四个城区组成: 开罗老城(Fustat), 10世纪时法蒂玛王朝(Fatimid)^①统治者在其北新建的开罗城, 尼罗河上的主要商港布拉克岛(Bulaq)和墓地区卡拉法(Qarafa)。1258年巴格达被蒙古人摧毁后, 这里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教育和学术中心。1261年, 马穆鲁克王朝的巴依巴斯苏丹(Baybars)在此定都。开罗在纳赛尔·穆罕默德·伊本·卡拉温苏丹(Al-Nasir Muhammad ibn Qalawun, 1293—1340年在位)的漫长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据说这里有51家浴室、87个市场、数千家商铺和58家商队旅馆(caravanserai), 也就是为商队的骆驼、货物和人员提供住宿和仓储的大型庭院。和大多数穆斯林城市一样, 开罗人不使用带轮子的手推车, 街上到处是人脚和兽蹄。1322年一个法国人在访问开罗后提到, 虽然该城面积是巴黎的4倍, 但街道“狭窄、曲折、昏暗、坑坑洼洼。到处是灰尘和其他垃圾而且路面没有铺过”。穷人在他们能住的任意地方住着, 富人住的是四周带庭院的豪宅, 中产阶级则住在叫乌尔布(urbu)的多层公寓楼里。马穆鲁克贵族凭借伊克塔制度(iqta)^②

① 909—1171年统治北非和埃及部分地区的穆斯林王朝。——译者注

② 曾流行于中东地区的税收制度。由于军费不足, 君主将地方征税权下放给贵族, 后者每年支付一定比例的税金作为国家军费。——译者注

像封建领主一样控制着农村，靠农民养活却住在开罗雄伟的城堡里。瘟疫前的埃及有 450 万人口，超过 10% 住在开罗，那里吸收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大量财富。

1347 年秋，黑死病几乎同时袭击西西里和埃及。15 世纪编年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尔-马克里齐 (Muhammad al-Maqrizi) 认为瘟疫是由一艘停靠在亚历山大港，载有 300 名奴隶的被感染商船带来的。疫情高峰时每天要举行 200 场葬礼。港口、市场和海关都被关闭。1348 年 4 月，疫情传到开罗和下埃及许多地区。这年 10 月到第二年 1 月是疫情高峰期，2 月份疫情开始减弱。^[2] 阿尔-马克里齐的记录中，夏末每天死亡 300 人，10 月末达到 3 000 人。有人认为腺鼠疫爆发始于 12 月，因为报道中每天死亡 10 000—20 000 人。伊本·白图泰访问巴黎时记录的数字是每天 21 000 人，所有他认识的学者都死了，他不久就离开了。阿尔-马克里齐最后宣称在老城就有 90 万人死亡，但这是当时开罗实际人口的两倍，现代学者估计亚历山大和开罗的死亡数字分别是 10 万和 20 万。

作为穆斯林城市，开罗流行着伊斯兰教对瘟疫的看法和特有的反应。穆罕默德教导说瘟疫完全是真主的意志，它既是对不虔诚者的惩罚，也是对虔诚者的恩典，因为他们死后马上可以进入天堂，穆斯林既不能逃离也不能进入疫区。因为真主只会对他选中的人下手，所以不存在传染。早期的穆斯林评论认为，“真主创造了所有的生命，他决定了他们在地上的寿命和死亡时间，以及将遭受的痛苦和享受的喜悦”。^[3] 有人甚至认为祈求宽恕是不虔诚的行为。正统而严格的穆斯林不相信科学，但受过教育的医生试图调和真主的意志说以及希波克拉底、盖伦和阿维森纳的有毒空气说。比如 15 世纪 40 年代，伊本·哈贾尔 (Ibn Hajar) 就宣称

有精灵(jinn)刺破被选中者的皮肤让瘴气进入。放血可能是有效疗法,但需要真主的许可,“对那些得到宽恕的人,真主会让这种开导疗法(放血)很有效”。安达卢西亚的伊本·阿尔-哈提卜(The Andalusian Ibn al-khatib)否认精灵说而是承认传染,他发现其他理性的人也这样认为,“事实上,非洲已经有虔诚的人收回了早前的观点,并正式立下文书证明他们收回之前按伊斯兰教法所做的决定(fetwa),因为他们发现那会让自己走向灭亡,在良心上负担很重”。^[4]换句话说,他们会在恰当的时候逃亡。

人们的确开始逃亡,甚至1348年9月苏丹和他的随从也离开宫殿逃往西利亚库斯修道院(Siryaqus)。有的城里人逃往乡下,而农村人则抛下土地去寻找有医生、宗教中心以及药品和食物的城市。有人试图在饮食上遵循医嘱来避免得病,或在身上涂满粘土驱毒。1362—1363年的爆发中,伊本·阿比·哈贾拉苏丹(Ibn Abi Hajalah)焚烧芳香木料来净化宫中的腐臭空气。除了此类篝火,公共宗教服务是统治者唯一采取的对抗黑死病的公共措施。1348年11月28日,数百人跟随手持帝国旗帜和《古兰经》的人出城游行,在城外他们祈祷这场日益恐怖的灾难早日结束。人们自己祈祷、斋戒并一丝不苟地遵守仪式纯洁的要求。他们去清真寺聆听阿尔-布哈里(al-Bukhari)^①的《圣训》(Sahih),它规定了虔诚穆斯林在灾难中应该怎么做。如果宗教实践和医学都没有效果,有些穆斯林会尝试巫术。把写好的咒语围在脖子上,或者把墨迹冲洗进杯子里喝下。每天念诵136遍“永恒者的王国不会毁灭和终结”据说能防瘟疫。虽然穆斯林也有所谓的

① 810—870年,波斯逊尼派穆斯林学者,他编著的《圣训》是伊斯兰教的经典。——译者注

“圣人”，但他们不会像基督教圣人那样做精神的辩护者。不过穆斯林有向精灵求助，类似基督徒向圣塞巴斯蒂安或贞女玛利亚求助的做法。如果把基督徒的做法看成积极和主动的，那穆斯林的也同样如此。

瘟疫期间开罗葬礼不断。某个周五，阿尔-哈基姆(al-Hakim)大清真寺里几十口棺木停了两排。祈祷仪式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家的棺木，因为尸体通常被裹尸布包住，看起来都一样。名人的送葬队伍常在街道上相遇，悼念者混作一团并发生冲突。后来，棺木用完了，尸体被和垃圾一起堆在街上，或者扔进尼罗河。包裹好的尸体被用床板、木板、梯子、窗板或篮子运往卡拉法的大型墓地，骆驼一次要驮好几具尸体，蹒跚着穿过狭窄的街道。^[5]能容纳 30 具或更多尸体的大墓坑被不断地开挖和填满。历史学家迈克尔·多尔斯认为，穆斯林没有像基督徒迫害犹太人那样寻找替罪羊，这不仅由于灾难及其细节造成了“精神麻木”，而且因为穆斯林被要求服从真主的意志(见附录原始文献 8)。^[6]

死亡和逃亡造成的人口锐减对开罗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持久影响。食品价格随着需求减少而下降，但当供给耗尽后再次上升。1348 年收成欠佳，劳动力不足而且很难把粮食运去城里。农民逃亡时抛下庄稼和家畜，宝贵的尼罗河灌溉设施也被废弃。在艾斯尤特(Asyut，位于尼罗河西岸)乡间，纳税人数由常年的约 6 000 人减少到 1349 年的 116 人。人口锐减导致食物供少价高，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7]开罗工资飞涨，马童的报酬从每月 30 个迪拉姆(dirham)上涨到 80 个，磨坊主和面包师的工资上涨 113%—160%。制造品和加工食品的价格上涨，但新的家具、厨具和衣物需求下降，因为死者的物品开始流入市场。开罗的长途贸易损失惨重，无论是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还是和欧洲基督

教国家之间,因为外国市场也已枯竭。黑死病还加快了半封建的伊克塔制度的衰亡:随着大量的死亡和财富再分配,农村建立了现金市场,这使得苏丹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8]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用虔诚行动取悦真主,幸存的富人和新贵开始建造医院、学校和清真寺,这带动了建筑行业的需求。从 1341 年到 1412 年,开罗建起 49 座新的清真寺,马穆鲁克的贵族们(amirs)建起 40 座宫殿。几百座被废弃和洗劫破坏的房屋、商铺和商队旅馆需要重建。14 世纪 50 年代,苏丹花费重金建造新的主清真寺,它能容纳 400 名学生,他们将在未来代替那些死去的学者、教士和法官。从 1384 年到 1386 年,切尔克斯王朝(Circassian)^①的第一位苏丹巴尔库克(Barquq)也兴建起清真寺,但规模稍小。虽然苏丹们的正常收入已经枯竭,但根据伊斯兰法,他们可以把无遗嘱死者的财产收归国有。

虽然 1362—1363 年、1374—1375 年和 1379—1381 年爆发了新的疫情,而 1354 年和 1375 年又分别发生洪水和饥荒,但到了 14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罗的情况已明显改善,这赢得了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赞誉。^[9]但好景不长,欧洲经济的恢复、蒙古人帖木儿(Tamerlane,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的威胁、高税率、内部骚乱和疫情新的爆发让中东一蹶不振(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9)。到 15 世纪早期,开罗城郊荒芜、百业萧条,清真寺和市场也被荒废。一方面买不到什么,另一方面即使有东西也很少有人买。开罗损失了整个纺织业和一半的制糖者。^[10]在 1419 年那次不算严重的爆发中,从 3 月中旬到 4 月底平均每天有 193 人死亡,这还

① 又称布尔吉王朝。1377 年,切尔克斯人巴尔库克趁叙利亚和埃及的骚乱推翻了马穆鲁克王朝,并于 1382 年称苏丹。——译者注

不包括死在医院里的人。1428年伊本·苏海拉(Ibn Zuhaira)感叹开罗只剩下“从前的二十四分之一人口”。^[11]

研究马穆鲁克王朝的历史学家阿布·拉·玛哈辛·伊本·塔格里·比尔迪(Abu L-Mahasin ibn Taghri Birdi)指出,在1429—1430年的那次严重疫情中,市政府一天内清点的送去卡拉法的棺木就有12 300具。他估计瘟疫期间仅开罗就死亡10万人。他认为这比1348年以来任何一次爆发都更“严重和可怕”,人们称之为“大灭绝”。与过去的瘟疫相比,“它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其中之一是它在冬天爆发,到了春天消失。而瘟疫通常是春天爆发,夏初时结束”。宗教领袖宣布将斋戒三天,城里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被带到沙漠中布道和祈祷。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援引阿尔-马克里齐的编年史说:“某地18名渔民一天内就死了14个,剩下4个把他们送去墓地,路上死了3个。剩下那个把他们埋葬后也死了。”虽然情形凄惨,但活人尽到了对死者的责任。比尔迪写道:“没能埋葬死者的人和它们一起在墓地过夜。掘墓人整晚都在工作,他们挖好的每条大沟里都有许多尸体,狗跑来啃食它们的四肢。人们整晚都在焦急地寻找洗尸人(做好下葬前必要的准备)、搬运工和裹尸布。”^[12]

1438年瘟疫袭击开罗时,苏丹的宗教律师提出,真主要惩罚的是通奸罪,所以应该完全禁止女人出现在公共场合,以防她们诱惑男人。苏丹同意了,但富人派女仆外出购买食物例外。于是其他妇女也扮成仆人的样子,这样禁令不了了之。比尔迪嘲笑这种罕见而无用的禁令是“统治者愚蠢的结果。”^[13]

埃及的灾难没有结束。从1347年到马穆鲁克统治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终结的1517年,170年间有50个疫年,其中20年疫情严重。虽然15世纪中叶重现了类似14世纪80年代的复兴,

但开罗直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都没能超越昔日的荣光。

意大利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人是自豪的(也有人说是傲慢),他们把城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11 世纪末,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成功地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封建领主手中获得了管理自己城市事务的权力。14 世纪时,佛罗伦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自治城邦的中心,它自己铸币、征税、制定外交政策,还控制着方圆几英里内的乡间和村镇,也就是它的郊区(contado)。在家庭财富上,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的繁荣来自毛纺贸易和银行业。市民必须加入城市的某个行业公会,即佛罗伦萨的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的组织,市政府由主要公会的代表掌管。在佛罗伦萨,对城市的自豪感和经济成功密不可分,富人把兴建教堂看成像建造市政厅一样。

基督教既是个人也是公共事务。每年街上都会挤满宗教游行队伍,而当有著名的布道者来这里鞭策懒散者和鼓励虔诚者时,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大教堂会出现爆棚。人的罪和对它的惩罚是每个佛罗伦萨人意识的重要部分,但丁这位城市的宠儿在《神曲》中生动描绘了地狱中的痛苦,而在每个未来的市民都要去接受洗礼的洗礼堂(Baptistery)里,人们可以在天花板上看到审判日上正襟危坐的基督,还有饥肠辘辘、正咀嚼着罪人的撒旦。佛罗伦萨人知道自己有罪,教士们没少提醒他们。但和别处的基督徒一样,他们觉得只要用善行证明自己的信仰并且按照神父的要求悔罪就能取得上帝的原谅。许多人加入宗教兄弟会,为穷人祈祷并帮助他们。也有人资助市内的医院和慈善组织,而所有

人都通过自己的教区、主教堂和市内的修道院捐助教会。他们非常重视罪和美德、天堂和地狱以及神的奖惩,所以当瘟疫来临时,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尽管在 14 世纪初遭遇过饥荒和某些类型的瘟疫,但佛罗伦萨已经蓬勃发展了两个世纪。1346—1347 年的黑死病爆发前夕,一场饥荒造成约 4 000 人死亡。^[14]14 世纪 30 年代末,佛罗伦萨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市区人口在 9 万到 12 万之间,而郊区则为 30 万。^[15]1348 年 3 月末和 4 月初瘟疫爆发时(可能从比萨或热那亚传入),市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人们一直相信疾病是由臭味引起的,所以从 13 世纪起,政府严格控制有异味行业的选址和生产流程,甚至每两年还要清理一次下水道。1319 年,他们禁止在某些地方屠宰牲畜,因为被宰杀的动物“呼出的有毒气体会造成(周围)居民生病”。1348 年 3 月,他们通过了《腐败和有害空气法》,为了限制市内“有毒和腐败的物质和尸体”,佛罗伦萨人必须“将所有发臭或散发出有毒气体,会污染空气并致人感染的物品从佛罗伦萨及其郊区清理出去”。^[16]4 月 3 日,可能对瘴气说不够放心,他们又立法要求将病人的衣物销毁,不得出售或赠送他人。妓女被驱逐出境,可能既出于道德原因,又因为医生认为性行为会引起感染。比萨和热那亚人被禁止入境,违者会被处 500 里拉(数目不小)的罚金。但这些措施都没能避免每天死亡 60 到 80 人,所以 4 月 11 日政府成立了八人临时委员会来监督执法和管理丧葬。^[17]不过,这种非常合理的做法直到 15 世纪才被佛罗伦萨人再次使用。

为了“保障(市民)健康和消除土地污染”,威尼斯人在 3 月份成立了三人卫生委员会。在意大利佩鲁贾,著名医生佛里尼奥的詹蒂莱(Gentile da Foligno)强烈要求“绅士们”同医学院(公会)

一起探讨“保障市民健康的措施”。^[18]大多数欧洲城市中，此类措施姗姗来迟：巴塞罗那在 1408 年，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在 1426 年，阿维尼翁在 1479 年，米兰在 1485 年。1347 年就遭受重创的马赛直到 1472 年才成立类似的委员会。15 世纪中叶，欧洲各地的卫生委员会开始对外来人口检疫，它们签发和检验代表某人未患病的“健康护照”，隔离病人，组织管理慈善机构、医疗服务、丧葬服务、登记死者并记录最新的发病地区。^[19]

据费拉拉的编年史记载，佛罗伦萨人于 6 月中旬开始统计每日死亡人数，开始为 100 人，但 7 月到 8 月死亡人数“开始激增到 300、380 和 400 人”。^[20]薄伽丘《十日谈》的序言很可能就以这一时期为背景：十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男女青年在瘟疫肆虐时决定遵照医嘱，逃到空气更好的乡下庄园避难，他们连续十天共讲了 100 个故事。薄伽丘在开篇经典地描绘人们对黑死病的反应。他形象描述了症状、医生的无助和疾病的传染性，特别是“幸存者的恐惧和奇思异想，他们几乎都变得非常残酷，拒绝同病人和与之相关的东西接触，并认为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薄伽丘笔下家庭关系崩溃与第一次大流行期间的现象如出一辙，“哥哥扔下弟弟，叔叔扔下侄子，姐姐扔下弟弟”。在《十日谈》中，我们看到临死时无人照料的病人、贪婪的收尸人(becchini)和无名的坟墓，“城里到处是尸体”。^[21]那两个世纪的人不仅读过薄伽丘的故事，还亲身经历过这种恐怖。不过《十日谈》不仅以地狱般的画面表现了人性的弱点，还用这可怕的背景来烘托那些美丽、迷人、看上去毫发无损的青年和他们有趣的故事。

薄伽丘提到，医生建议青年们躲开疫区和病人，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所有天主教徒都要面对的道德问题。和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没有阻止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逃跑，但同时它希望他们为周

围人提供关爱和帮助,甚至牺牲自我。薄伽丘笔下的那些人认为,逃跑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命,留下来却于事无补。同一世纪晚些时候,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伦理学家科鲁奇奥·萨鲁塔蒂(Coluccio Salutati)谴责逃跑是不道德的和对家乡的可耻背叛。他注意到,许多逃跑的人也死了(他不相信瘴气理论)。1374年,由于市议会无法凑齐法定的议员人数,政府下令逃亡不归者将被处以500里拉的罚款。逃亡者中也有医生,于是1382年威尼斯政府威胁将剥夺他们的公民权。^[22]佛罗伦萨人马乔内·迪·斯特法诺(Marchionne di Stefano)在提到1383年家乡遭受的第四次疫情时说:“许多法律都禁止公民在瘟疫期间离开。因为(当局)害怕无力离开的(平民)会造反并被心存不满者组织起来。”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真的起义了,并在1378年占领政府。把有钱有势的人留在城中是为了威慑瘟疫期间的革命者吗?马乔内的答案是否,因为“冲破藩篱的总是大而强壮的动物”。^[23]这一年,佛罗伦萨第一次安排了岗哨,他们的作用也许不仅是防止带病者进入,还有阻止城里人逃走。^[24]

逃跑问题让公众对瘟疫成因的态度发生了有趣的转变。如果瘟疫是对罪的惩罚并且无法逃避,那么逃跑有什么用呢?如果上帝只是用瘴气惩罚不悔罪者,那么他应该保护虔诚者,无论他们是否逃跑。但还是有人逃跑,特别是有能力的。萨鲁塔蒂的学生,佛罗伦萨历史学家里奥纳多·布鲁尼(Lionardo Bruni)认为1383年没什么值得记录的,因为许多上层人士不是离开就是死了。1390年和1400年两次疫情时,在普拉托经商的佛罗伦萨市民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卷起大部分家私,独自逃到皮斯托亚(Pistoia)和博洛尼亚(Bologna)。他在书信中提到,这些目的地是精心选择的,自己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采纳达·托西尼亞諾(da

Tossignano)医生的意见,后者在须知中说:“目的地最好从没发生过瘟疫,即使那些地方的瘟疫已经结束6个月了。因为遗毒(reliquae)像酵素一样会感染来这里的人。”^[25]从现代观点来看,逃亡最大的问题是它很可能引起疾病在地区间的传播。

薄伽丘强调,死亡与持续的混乱会使社会崩溃,后世有不少人描绘了类似画面,但对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的研究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遗嘱仍然得到很多人的公证,这表明垂死者没有被完全抛弃。虽然市政府活动的记录中存在空白,但没有证据表明欧洲哪个地方的政府或城市生活发生崩溃。虽然在城市中,尸体常被扔进无名的大墓坑,但这在战争期间也会发生。尸体数量太多,社会无力按照传统方式及时处理。危机结束后人们很快回归了正常生活。

当然,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确遭到重创。虽然妇女常会死于分娩,许多儿童也会夭折,但经历了这些事件的男主人仍能继续生活下去。可是当失去父亲、祖父和叔伯们之后,妻子、孩子、仆人甚至奴隶就要听天由命了。被称为“伪友”的坏人会借机欺凌孤儿寡母,以保护之名夺走他们继承的最后一点财产。即使在瘟疫肆虐期间,许多人还要忍受遗产和监护权官司之苦。瘟疫过后,因为捐赠和遗赠而盆满钵满的佛罗伦萨圣弥额尔协会(Confraternity of Orsanmichele)将捐助对象定为贫苦的妇女儿童,而不是潦倒的男子。人均受捐额从半个里拉(1348年)增加到15里拉(1350年)和23里拉(1351年)。佛罗伦萨烤栗协会(Confraternity of the Roast Chestnuts)负责在疫年埋葬死者,但1350年转而向穷人特别是妇女提供资助。^[26]类似活动遍布基督教世界。

总的来说,资源不变而分享人数减少使得贫困率下降,而工

人(即使最底层的)的需求和工资则激增。但弱势者同样人数上升,如法律上无人保护的孤儿,以及带着幼子的寡妇,现在穷人更可能是妇女。好在社会已经意识到这点并开始提供帮助,因为妇女实际上是社会的未来。和其他地方一样,佛罗伦萨人也认识到需要提高出生率来弥补巨大的死亡数字。积极支持婚姻和生育的政策被称为生育主义(natalism),在官方和个人的动议下,生育主义成为佛罗伦萨的重要政策。结婚时男方会坚持要女方从娘家带去嫁妆,把它视为自己的重要财产,很少有人不这样做,而穷人家只能依靠别人提供全部或部分得体的嫁妆。于是帮助准新娘被看作“善行”,不仅因为它本身是虔诚的行为,而且受助妇女还会为恩人的灵魂祈祷。有一年瘟疫时,平时有求必应的弗朗切斯科·达蒂尼拒绝帮助一位年轻女子,因为他刚帮助过的另一位女子不久就死了。寡妇在法律上仍享有自己的嫁妆,所以不太可能得到帮助。圣弥额尔协会资助了瘟疫后20%的婚姻。可以想见,1350年后结婚年龄大大下降,但世纪接近尾声时又缓慢回升。15世纪初,佛罗伦萨人建立了嫁妆基金(Monte delle doti),女婴的父亲存入一小笔钱,等孩子结婚时就能得到丰厚回报。在政府因财政吃紧对它下手前,基金一直运行良好。

虽然既呼唤上帝的恩典又求助于医学知识,但市政府的反应并不显得反讽。它允许在6月24日为保护城市的圣人施洗约翰举行例行庆典。虽然医生警告有感染危险,人们还是组织了宗教游行,队伍蜿蜒着穿过各个街区。另一方面,医生获得许可进行尸检,以期更好理解瘟疫的特性。^[27]如果瘟疫成因既有自然也有超自然的,那么政府必须分别应对。个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一边不停向上天祈祷,另一边又求医问药、节制饮食、焚烧芳香木料净化房间,还尽可能避免忧郁。有人在最后一条上走得太远,

就像薄伽丘生动描绘的，他们沉湎于酒精和情欲。即使有公德心的人也很少去保护被弃的商店和房屋，于是罪犯和坏蛋开始肆无忌惮，“做他们最想做的事”。^[28]

9月初疫情结束时佛罗伦萨的死亡数字惊人。历史学家吉恩·布鲁克(Gene Brucker)表示，1352年的税收调查“暗示”城中只剩下5万居民。历史人口学家马西莫·李维·巴奇(Massimo Livi Bacci)宣称1348年的死亡率是常年的20倍，盛夏死亡高发时的数字还要可怕。“我们只有各地的零星材料，它们虽然体现了瘟疫的总体影响，但对于确定死亡人数没什么价值。”^[29]大多数学者认为佛罗伦萨的死亡率约55%—60%，即约6万人。

1363年，1371年，1383年，1390—1391年，1400年，1410年，1417年，1422—1423年，1429—1430年，1439年，1448—1450年，1456年，1478—1479年和1495—1498年，托斯卡纳地区又发生传染病疫情。虽然每次爆发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远小于1348年那次，但它们的累积效应使得人口直到18世纪才恢复瘟疫前的水平。1427年，佛罗伦萨人口只有瘟疫前的37%，直到世纪末才有明显增长。尽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佛罗伦萨的出生率却不高，同时城市拒绝大规模移民。佛罗伦萨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要好于埃及人，再加上高企的食品价格，因此他们没有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的动力。即使如此，1354年到1364年间还是有12 000人为了高工资和慈善捐助搬到城里。

编年史学家马特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的哥哥乔瓦尼死于瘟疫，他描述了佛罗伦萨面临的经济前景和问题：

本以为人口下降会使地上各种食物变得充足，但并非如此。人类如此不幸，一切都极为短缺，这持续了很长时间。有的地方……发生可怕的大饥荒。本以为衣服和除了食物

之外身体必需的一切会变得充足,但同样并非如此,它们短缺了很长时间。劳动报酬以及由各种手艺人和工匠制作的东西的价格是常年的两倍还多。^[30]

有技能者的工资上涨近 200%,即使无技能的劳动者也索要原先 3 倍的薪水,但佛罗伦萨的经济恢复迅猛。1348 年后,富人在农村购买大量田地并很快从高粮价中获利,粮价最终因丰年高产而下降。他们与劳动者签订分益合同,双方都能从增产中获益。在诸如此类的方面,佛罗伦萨的企业家比开罗同行更善于最大化利用资本。^[31]年轻的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很早就深谙此道,14 世纪 50 年代他拿着父亲和兄弟的遗产去阿维尼翁从事各类买卖并因此致富。佛罗伦萨人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和财富靠的是承担合理风险以及利用家庭、合伙人、兄弟会、行业公会、店主—顾客关系和公共政府等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不过虽然拥有关系网,佛罗伦萨人还是展现出建立在自力更生之上的自信,这为下一世纪的文艺复兴定下了基调。^[32]1363 年的瘟疫后,他们还恢复了合法奴隶制。

虽然在 1348 年 4 月到 8 月间佛罗伦萨政府几乎崩溃,但它很快就恢复了。它提高税率以弥补失去的收入并鼓励其他地方的工匠前来定居,但限制本地农民移民。法庭则开始处理头痛的遗产和监护权问题。从 1348 年 8 月起,人们乐观地宣布,将建立(或重建)佛罗伦萨大学(Studio fiorentino)。政府认为,它不仅能弥补失去的知识分子和为缩水的人口提供更好的教育,还能吸引外乡学生。^[33]和修道院一样,行业公会放松了对会员的要求以吸引商人、工匠和专业人士。但医生公会却正好相反,因为瘟疫期间出现许多骗子和庸医,它还和公共政府一起加强了对处方和药品销售的控制。

黑死病第一次爆发后的 150 年间,佛罗伦萨人经常通过政府采取许多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措施来控制瘟疫及其影响,其中的一些效果存疑。有些措施是道德方面的,目的是控制和消灭某些性行为,如公开卖淫(1403 年)、女修道院中的不道德行为(1421 年)和鸡奸(1432 年)。^[34]从 1385 年一直到 18 世纪,粮食局(Grain Office)一直在《死者档案》中记录市民的死亡情况,1424 年起新增了死亡原因。它为现代分析提供了资料,比如从 1424 年到 1430 年,记录中 68% 的人死于瘟疫(另外 7 人死于肠道疾病,7 人老死,4 人死于发热)。^[35]粮食局还监督妓女、掘墓人、教区埋葬记录和禁奢令实施情况。^[36]禁奢令针对的是两种行为:一、下层阶级越级穿着廉价的二手上层阶级服装;二、葬礼过于奢华。豪华葬礼本来是城市英雄和重要人物的专利,但 1353 年,富有的尼科拉·阿奇亚尤奥利(Nicola Acciaiuoli)从那不勒斯运回儿子尸体的举动引发了瘟疫后的奢葬风。下层阶级开始模仿上层,人们使用大量蜡烛,在棺木上覆盖精美织物并花钱请人哭丧。1374 年生效的法律限制了蜡烛(4 支)和致哀者的人数。^[37]

“为了保障健康、预防瘟疫和避免感染(这是感染一词首次出现在公共文件中)”,佛罗伦萨于 1448 年又成立名为“八人卫队”(Eight Guardians)的公民委员会。除了向穷人分发面包,委员会还有 4 位医生、4 位理发师外科大夫和 60 名男女护工为他们提供救治。佛罗伦萨的新圣母医院(Santa Maria Nuova)拥有 200 张床位,但 1464 年人们又开始在市内兴建另一所医院。很快,他们还在港口城市利沃诺和比萨修建了两所医院,用于隔离将来从海上传入的疾病。^[38]佛罗伦萨新的隔离医院(lazaretto)由原来的麻风病院改建,准备专门收治瘟疫病人,其人员包括神父、医生、理发师外科大夫、药剂师和若干护工。1424 年,威尼斯已经

有了此类医院并于 1429 年扩建,1471 年建立第二所。米兰的第一所隔离医院建于 1468 年。1472 年和 1476 年佛罗伦萨政府两次重新批准了此计划,医院于 1479 年建成,但直到 1494 年医院的 26 张病床才迎来第一批瘟疫病人。1494 年,佛罗伦萨政府重组了 1348 年尝试过的卫生委员会。5 名任期为 6 个月的委员负责监督出现疫情报告的地点,为佛罗伦萨的旅行者开具健康证明并惩罚违反卫生法的人。卢卡·朗杜齐(Luca Landucci)在日记中提到(见附录中的原始文献 12),15 世纪 90 年代末的那次疫情中他们还把患病穷人驱逐出城,这也是欧洲许多城市的做法。1496 年,委员会成为正式的瘟疫办公室(Ufficiali del Morbo),但直到 1527 年才成为常设机构。^[39]

开罗与佛罗伦萨的比较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本章的佛罗伦萨部分要比埃及部分长得多。这不仅因为佛罗伦萨的档案记录更加丰富,而且从长期来看,佛罗伦萨人的各种反应影响更广。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选择了逃亡和医药,他们都在私下和公共场合祈求上帝的恩典,并且都遭受了丧亲的痛苦以及突如其来疾病的恐怖。在两种文化中,社会准则和政府都没有崩溃。抛弃上帝的人数无法与敬畏(或爱戴)他的人相比,所以传统宗教及其领袖保住了对人们的精神和文化控制。当对死者的哀悼和埋葬结束后,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回归了原先的生活。

但佛罗伦萨和基督教欧洲的恢复要比开罗和伊斯兰世界迅速和完全得多。虽然低出生率和疫情复发造成的高死亡率使得两地人口恢复缓慢,但佛罗伦萨的经济很快蓬勃发展且日益资本

化(谨慎地将财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财富)。开罗和佛罗伦萨人都是非常出色而有竞争力的商人,但意大利人之间的竞争不仅降低了物价还提高了产品质量。到了1400年,佛罗伦萨人已开始向开罗出口高质量的毛纺织品,导致当地织户失业。相对较好的资本流动性(投资和改变其方向的容易程度)鼓励人们投资于利润率最高和最稳定的地方,至少在意大利北部是这样。这造就了更加富有和乐观的社会。

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成功与否取决于上帝和真主是否高兴,但基督徒对于自己与全能者议价的能力更加乐观。他们认为上帝的意志是可改变的,比如通过圣人的代祷和幸存者的祈祷以及善行。真主被认为是仁慈的,但穆斯林更多把他的意志看作宿命,他们认为未来其实早已注定,而基督徒则相信命运可以改变。这种差异被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统治体制放大。在开罗,伊斯兰帝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没有留给个人参与、影响和自主的空间。而天主教世界中教会和国家是分离的,双方都没有凌驾对方以及个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两者间的竞争使个人能充分地参与、影响社会和自主行动。在佛罗伦萨,这三点是公民政府的根基。所以在黑死病的多次爆发中,佛罗伦萨和欧洲人的反应要比伊斯兰国家的人更加灵活、创新和进步。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黑死病在欧洲国家消失的时间要比在近东早了一两百年。

注释:

- [1] Quoted in Gaston Wiet, *Cairo*(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4), pp. 63, 73.
- [2] Abraham Udovitch et al., “England to Egypt, 1350—1500,” in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ed. M. Cook(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19.
- [3] Lawrence Conrad, "Epidemic Disease in Formal and Popular Thought in Early Islamic Society," in *Epidemics and Ideas*, ed. Ranger and Slack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3.
- [4] Anna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59, 73.
- [5] Michael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37—43.
- [6] Michael Dols, "The Comparative Communal Responses to the Black Death in Muslim and Christian Societies," *Viator* 5(1974): p. 286.
- [7] Dols, *Black Death*, pp. 160—63; Dols, "Comparative," p. 277.
- [8] Dols, *Black Death*, pp. 271—72.
- [9] Janet Abu-Lughod, *Cair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7.
- [10] Abu-Lughod, *Cairo*, p. 39; Eliyahu Ashto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306.
- [11] Ashtor,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p. 304.
- [12] Abu l-Mahasin ibn Taghri Birdi. *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AD*, Vol. 18 part 4, ed. and trans. William Popp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15—64), pp. 69, 70, 73, 182.
- [13] Ibn Taghri Birdi, *History*, pp. 146—47.
- [14] Antonio Ferlini, *Pestilenze nei secoli a Faenza e nella valli del Lamone e del Senio* (Faenza: Tipografia Faentina, 1990), p. 51.
- [15] 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5, 69.
- [16] John Henderson, "The Black Death in Florence: Medical and Communal Responses," in *Death in Towns*, ed. Steven Bassett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3.
- [17] Henderson, "Black Death," p. 144; Ann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99.
- [18] Henderson, "Black Death," pp. 142—43; Jon Arrizabalaga, "Facing the Black Death: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of University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ed. Luis Garcia-Balles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71.
- [19]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 Europeens et mediteraneens*, Vol. 2(Paris: Mouton, 1976), pp. 138 -- 39; Ann Carmichael, "Bubonic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Plague, Pestilence and Disease in History*, ed. Kenneth Kiple et al. (New York: Marboro Books, 1997), p. 63.
- [20] Ann Carmichael, "Plague Legisla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7(1983): p. 514.
- [21] Giovanni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trans. Mark Musa and Peter Bondanella (New York: Norton, 1977), pp. 5, 6, 8.
- [22] Francesco Gianni, "Per una storia letteraria della pesta," in *The Regulation of Evil*, ed. Agostino Paravicini Baglioni and Francesco Santi (Sismel: Galluzzo, 1998), p. 100; Samuel Cohn,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5; D. W. Amundson, "Medical Deontology and Pestilential Diseas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3(1977): p. 410.
- [23] William Naphy and Andrew Spic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History of Plagues, 1345—1730*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pp. 59—60.
- [24] Carmichael, *Plague*, p. 99.
- [25] Ann Carmichael, "Contagion Theory and Contagion Practice in Fifteenth-century Milan," *Renaissance Quarterly* 44(1991): p. 226.
- [26] John Henderson, "Women, Children and Poverty in Florence at the Time of the Black Death," in *Po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European Past*, ed. Henderson and Richard Wal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70; Henderson, "The Parish and the Poor in Florence at the Time of the Black Dea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3(1988): pp. 259—60.
- [27] Gian Maria Varanini, "La Peste del 1347—50 e i governi dell' Italia centro-settentrionale: un bilancio," in *La pesta nera* (Spoleto: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ro medioevo, 1994), p. 295.
- [28] Boccaccio, *Decameron*, p. 5.
- [29] Gene Brucker, "Florence and the Black Death," *Boccaccio: secoli di vita*, ed. Marga C. Jones and Edward Tuttle (Ravenna: Longo Editore, 1977), p. 22; Massimo Livi Bacci,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A History*, trans. Cynthia and Carl Ipsen (New York: Blackwell, 1999), p. 42; quote from Alberto Falsini, "Firenze dopo il 1348,"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129(1971): p. 434.
- [30] Bronislaw Geremek, *Poverty: A History* (New York: Blackwell,

- 1994), pp. 80—81.
- [31] Henderson, "Women," pp. 163—64; Samuel Cohn, "Florentine Insurrections, 1342—1385,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English Uprising of 1381*, ed. R. H. Hilton and T. H. As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3—45; James Powell, "Crisi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12 (1984): pp. 208—9.
- [32] Brucker, "Florence," p. 28.
- [33] Brucker, "Florence," p. 23; Katherine Park, *Doctors and Medicine in Early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0.
- [34] Naphy and Spicer, *Black Death*, p. 73.
- [35] A. L. Morrison, et al., "Epidemic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5 (1985): p. 534.
- [36] Carmichael, *Plague*, p. 27.
- [37] Sharon Strocchia, *Death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5, 59, 62.
- [38] John Henderson, "Epidemic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in *Maladies et societe (XIIe-XVIIIe siècles)*, ed. Neithard Bulst and Robert Delort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89), pp. 171—72; Varanini, "La Peste," p. 316.
- [39] Carmichael, *Plague*, 101, 103, 105; Henderson, "Epidemics," pp. 172—74.

第八章

结语：黑死病的结束 和对它持续的兴趣

从 17 世纪 50 年代到 18 世纪 20 年代，欧洲各地的疫情先后消失了。苏格兰、意大利和英格兰是 1670 年，西班牙是 17 世纪 80 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中欧是 1720 年，10 年后是法国。整个过程非常清晰，原因却仍然不明。最终的解释当然是生物学的，但人类的干预是否影响了自然？大多数学者会考虑多种可能，并常把它们结合起来，但各人也有所偏爱。下面的讨论假设大瘟疫是腺鼠疫。

有人认为一定是鼠疫菌发生了变异导致毒性下降。史蒂芬·艾尔(Stephen Ell)提出，耶氏鼠疫杆菌可能变成了致死率和致病性较低的耶氏肠炎杆菌(*Y. enterocolitica*)或耶氏伪结核性杆菌(*Y. pseudotuberculosis*)。但他马上又提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变异？为什么只发生在欧洲？变异是复杂的过程，对鼠疫菌来说这种变异没什么好处。生物学家赫斯特(L. F. Hirst)认为发生改变的可能是跳蚤，但他没有作出解释。另一方面，人类可能因为感染了耶氏伪结核性杆菌而暂时获得对腺鼠疫的免疫力。

法国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Jean-Noël Biraben)认为这足够说明问题,但历史学家爱普尔比(A. B. Appleby)指出这会导致腺鼠疫逐步消亡,而不是突然消失。不过无论如何,耶氏伪结核性杆菌直到19世纪才作为独立的菌种出现。^[1]

大多数解释集中在老鼠身上。曾经流行的观点是,黑家鼠发生衰退,被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取代,而印度客蚤很不喜欢后者。但问题是褐家鼠直到18世纪中叶瘟疫结束后才出现在西欧,而且现在两种老鼠仍然是共存的。有人认为,瘟疫入侵过程中,免疫系统发生变化的黑家鼠取代了容易感染的种类,而爱普尔比则把地方性宿主的消失看做鼠群内部产生免疫力的结果。但这些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呢?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在另一种假设中,老鼠数量可能减少到了必要的地方性宿主水平之下。有人把它和贸易习惯的改变联系在一起,欧洲人终止了和中亚的陆上往来并把海上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艾尔的看法正相反,他认为欧洲从未发生过地方性宿主引起的瘟疫,瘟疫的终结和宿主消失无关。汉斯·钦瑟(Hans Zinsser)1935年的解释受到不少人的赞同,他认为由于城市中更多的食物来源和更安全的藏身之处,老鼠的迁移性减弱,因此感染新跳蚤的机会也减少了。^[2]

人类的进步可能有意无意地减少了他们的感染机会。包括生物学家施鲁斯伯里(J. F. Shrewsbury)在内的许多人指出,使用瓦片或石板铺设屋顶的新砖房是问题的关键,因为黑家鼠无法在这样的屋顶或墙内筑巢。也有人认为个人卫生的改善赶走了跳蚤,生物学家昂立·莫拉莱(Henri Mollaret)特别强调肥皂驱赶跳蚤的作用。他还指出,冬天更频繁地更换衣物使得跳蚤因无法获得人的体温而动弹不得。有人认为营养改善提高了人的抵抗力,但也有人反对,因为丰衣足食的富人也无法幸免。^[3]历史

学家大卫·赫勒希(David Herlihy)等人认为是人们有意识的防治举措最终发挥了作用,如传染理论的进步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发展。历史学家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强调在别处爆发瘟疫后,本地政府采取了检疫和其他有力的措施。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和商品的旅行监管和封锁很可能减少了受感染鼠群的流动,而将病人隔离则限制了传播肺鼠疫的机会。下水道、垃圾控制甚至使用消毒剂等公共卫生进步也可能发挥了作用。但爱普尔比指出,即使瘟疫后平息后,那不勒斯和伦敦(甚至在1666年的大火后)仍然臭气熏天。历史学家卡利·孔科拉(Kari Konkola)发现,瘟疫消失时欧洲正好开始大规模使用砒霜灭鼠,也许那就是真相。^[4]

黑死病和西方的想象

距离历史学家和医生们记录的第二次大流行爆发已经过去650年,但黑死病仍然让西方社会不安和着迷。虽然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大屠杀以及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阴影中,我们仍然敬畏自然的破坏能力。人类用像黑死病那么可怕的东西自相残杀虽然听上去不可思议,但却比任何时候更有可能。前言中兰德公司的研究暗示,中世纪的大瘟疫可能是我们社会一面遥远的镜子,而人类社会能够承受如此一击而不倒的结论让人更加不安。

公众文化把黑死病的恐怖融入了像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这样严肃而黑暗的电影,或者像蒙蒂·派森(Monty Python)^①那样在《蒙提·派森

^① 英国六人喜剧团体,拍摄过《蒙提·派森和圣杯》、《蒙提·派森和布莱恩的一生》等影片。——译者注

和圣杯》(*Holy Grail*)中无厘头恶搞。在网上，我们不仅可以买到“黑死病来了”的T恤衫和咖啡杯，还能找到黑死病伏特加的卖家。老鼠和肮脏的中世纪农民形象，或者跳舞的骷髅和“把死人交出来！”的命令仍然植根于我们的社会意识中。但是当大众媒体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类苦难、暴力和大量死亡的画面后，薄伽丘和历史学家们描绘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显得更加熟悉和不那么恐怖了，仿佛好莱坞鬼屋的虚幻世界。

所以，研究中世纪黑死病的学生要面对两种同样流行的倾向，一方面是为了感官刺激而强调瘟疫可怕和令人不安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所有新发现传染病的担忧，因为它们可能会带来无法控制的致命疫情。黑死病的第一次爆发是人类历史上已知最大的自然灾害。近年来，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它的重新审视修正了我们的理解，从前确信的东西必须被改变或者认真检验。人口学家提高了死亡人数的估计，社会历史学家则下调了疾病对从叙利亚到爱尔兰的各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影响。虽然新的爆发改变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但短期内的恢复显得非常快速而完全。历史学家们还开始相信，黑死病的巨大冲击只是强化了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潮流，而非它们的源头。

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零星声音质疑，该世纪初发现的腺鼠疫在流行病学上并不符合14和15世纪的那种疾病（或若干种疾病）的记录。后来，零星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比如记录中没有提到老鼠，疾病传播太快且爆发季节有问题，死亡率过高并且症状不符合等，因此它很可能不是腺鼠疫。那它又是什么呢？反对阵营产生了不同意见，他们的答案从炭疽一直到未知的病毒性出血热。当牙髓中发现鼠疫菌DNA后，许多人认为已有定论，但还是有人质疑研究过程和结论，他们认为：“这只是法国

南方的情况,但英格兰发生的不是鼠疫,它是……”就像第二章中所暗示的,生物学和医学的进步会让讨论继续下去。

14世纪50年代,中世纪编年史学家估计的局部或各地死亡率从 $1/3$ 到90%不等。现代历史学家对这些数字持谨慎态度,他们的估计是“25%到33%”。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部分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地方,综合他们的研究,总体和地方死亡数字的估计都要提高。农村的死亡率似乎与人口密集的城市非常接近。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无论初始人口水平如何,在地区、国家甚至大洲等较大范围内死亡率都接近40%,只是各地略有区别。重新评估使得整个事件的影响更加惊人,它支持了那些认为黑死病不是腺鼠疫的观点,因为现代腺鼠疫爆发的死亡数字要低得多。

对地方研究的重视,特别是依靠法律和政府资料,改变了过去对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即它们因巨大和可怕的死亡数字而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各部门当权者的逃跑和死亡被认为使城市和乡村失去了监管和社会控制。但最新的研究显示,地方议会仍在召开、公证人仍然签署遗嘱、死者仍得到埋葬,罪犯也仍被记录在案并最终受到惩罚。死亡和逃跑的确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征税能力,教会等机构的领导质量也出现下滑,但没有哪个地方的权力结构在瘟疫中解体,这点可以从黑死病第一次爆发后许多地方快速和完全的经济恢复中看出。当然对许多地方来说,瘟疫的直接影响是毁灭性的:法国和英国的有些村庄永远消失了,今天去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的游客看到的是一座和1348年之前同样的小镇,经济重心的转移使它既不发展也不消亡。不过总的来说,西方基督教世界利用了低人口和财富再分配的积极方面。与之相比,马穆鲁克王朝的相对停滞导致经济和政治的衰退。但当疫情复发后,西方也陷入了萧条,因为人们意识到灾难将遥遥

无期。

最终当代学者达成的共识是，虽然引起骚乱和恐惧，但黑死病更多是西方变革的催化剂而非导火索。人口学学生发现，到1348年欧洲人口已经持续下降了30年。研究欧洲艺术的学生认为，与瘟疫的心理冲击相比，它对风格和内容的影响相对较小。研究英国史的学生发现，封建制度衰亡的根源被不断提前，黑死病只是加快而非促成了它的消失。黑死病出现前，经院主义已经走了下坡路，方言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虽然直到16世纪20年代教会仍没有任何改革（更别提宗教改革了），但对天主教的不满早已生根发芽。今天，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把黑死病看作重要转折点，认为它改变了后来的一切。不过这股学术潮流很可能引来反对的声音，人们会更深入地挖掘并继续改变对黑死病本质和意义的看法。

黑死病虽然发生在中世纪的晚期，它的影响却超出了那个时代。它是没有目的和动机的非正常传染病，既不是某人的过错也不是为了惩罚某人的罪。无论这种疾病是什么，它都是自然和无法逃避的。许多现代人热衷于把它还原为自然事件，就像地质学家研究地震、气象学家研究飓风或者气候学家研究干旱。不过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理解个人和社会对它的反应。该事件包括自然疾病同人类和社会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产生的影响。历史学家试图整理和理解纷繁万象中的某些经历、反应和影响，并赋予它们意义。他们提出的问题、假设和选择研究的证据影响了最终的结论，而研究又会反过来影响问题、假设和别人的研究计划。除非哪一天黑死病被忘记，否则永远不会有“盖棺定论”，历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保证它永不发生。

注释：

- [1] Stephen Ell, “Immunity as a Factor in the Epidemiology of Medieval Plague,” *Review of Infectious Diseases* 6(1984): pp. 869, 876; A. B. Appleb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lague: A Continuing Puzzl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1980): p. 165; on Biraben and Hirst see Leslie Bradley, “Some Medical Aspects of Plague,” in *Plague Reconsidered* (Matlock, Derbyshire, England: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1977), pp. 20—21.
- [2] Appleby, “Disappearance,” p. 171; Ell, “Immunity,” p. 869;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34), pp. 206—7.
- [3] J. F. Shrewsbury,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5; Henri Mollaret, “Introduzione,” in *Venezia e la peste, 1348/1797* (Venice: Marsilio Editori, 1979), p. 14.
- [4] David Herlihy,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 Paul Slack,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gue: An Alternative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4(1981): pp. 469—76; Appleby, “Disappearance,” p. 167; Kari Konkola, “More Than a Coincidence? The Arrival of Arsenic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y of Medicine* 47(1992): pp. 187—90.

人物传略

阿布·阿卜杜拉·伊本·白图泰(1304—1368年),摩洛哥法学家和旅行家

在结束了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到伊斯兰世界最边远国度的24年旅行后,伊本·白图泰(Abu Abdullah ibn Battuta)穿过黑死病肆虐的近东和北非回到家乡,并把沿途见闻记录在他的《游记》中。1304年,白图泰出生在丹吉尔一个法学家的家庭,他接受了正统的伊斯兰宗教法教育。20岁时,他前往东方进行麦加朝觐,还准备继续法律学习和游历世界。在虔诚者的资助下,他穿过突尼斯来到开罗,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在那里他遇见了一支前往麦加的商队。朝觐过后,他北上巴格达,并游览了伊拉克和伊朗其他的伊斯兰教城市。然后,他跟随巴格达的伊尔大汗一行人回到麦加,并于1327到1330年间在那里学习法律。后来他准备前往印度,于是搭船沿红海和非洲海岸南下,在到达桑给巴尔(Zanzibar,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后折返回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接着他转而北上,穿过叙利亚来到土耳其、克里米亚和金帐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他第一次使用马车,装载自己庞大的家产、家眷、奴隶和随从。在君士坦丁堡,他第一次生活在“异教徒”中间,然后向东穿过金帐汗国和阿富汗进入印度,终于在1333年9月到达印度河畔。他成了德里苏丹的伊斯兰法官,但在近8年间只审判了一个案子(醉酒者被打了80鞭)。1341年8月,伊本·白图泰和一个中国使团一起前往北京,但在

古里港(Calicut,印度西南部港口)遭遇风暴,他们的船只被毁,多人遇难。他漂泊到马尔代夫群岛,当上了法官并与六名女子先后结婚和离婚。接着他游历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中国沿海,并于1346年拜访了北京和杭州。1347年4月他回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然后北上并于1348年1月到达巴格达。

第二年春天,伊本·白图泰来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加沙正在爆发瘟疫,他写道:“那里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南下途中,白图泰在霍姆斯目睹了瘟疫,他宣称自己到达的当天就有300人死亡。7月,白图泰来到大马士革,他的记录显示每天死亡人数达2400人。人们斋戒三天,并在周五做了祷告,然后“真主缓解了瘟疫”。白图泰没有过多停留,决定再次去麦加朝觐。他到达耶路撒冷时,那里的瘟疫已经平息。在一次宴会上,主人表示自己曾经发誓,“如果瘟疫平息,某一天不必再为新的死者祈祷,我就举办宴会……而昨天我没有为新的死者祈祷”。白图泰发现加沙“荒无人烟,因为许多人死于瘟疫。当地法官告诉我,80名公证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幸免于难。死亡人数上升到每天1100人”。在埃及阿布西尔(Abu Sir)的一家旅馆里,有位圣人与他见面后就蜷缩在角落里过夜。第二天早上白图泰来到那人身边时,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做了祈祷并将他安葬。愿真主保佑他”!在亚历山大,有人告诉他一天内就有1080人死亡,而开罗的数字“已经上升到每天21000人”。朝觐完毕,他穿过北非回到摩洛哥,发现自己24年未见的母亲已经死于瘟疫。

后来,他还去过格拉纳达和撒丁岛,并向南到达马里和廷巴克图王国(Timbuktu,位于马里中部,14世纪时是当地黄金和盐的贸易中心),这样他就游历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他的足迹遍及

今天的 44 个国家,走过了约 73 000 英里。1368 年,他在摩洛哥的非斯(Fez)去世。

查理四世(卢森堡的查理)(1316—1378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查理四世(Charles IV/Charles of Luxembourg)的统治时期,黑死病在帝国首次爆发,后来又相继发生两次疫情。1316 年 5 月 14 日,查理出生在布拉格,洗礼名是温切斯拉斯(Wenceslas),他的父母是卢森堡的约翰和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7 岁时他被送到巴黎,在法王查理四世的宫廷中接受教育。在行坚信礼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查理。在巴黎时,他深受皮埃尔·罗热(Pierre Roger)布道的影响。罗热后来成为教皇克雷芒六世,黑死病肆虐的 1347—1352 年正在他的任内。年轻的查理还在巴黎大学短暂停留过,因此可能对正式教育有所了解,特别是占星学。20 岁不到,他就开始管理波西米亚王国。1340 年父亲失明后,查理又接管了家族在卢森堡的土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与教皇争斗多年,因此惹怒了许多德意志王公。1344 年,路易被教皇革出教会,并被要求在两年内退位。两年后,路易被废黜,查理在波恩被选为罗马国王,距离皇帝宝座仅一步之遥。早年与教皇的友谊给了他很多帮助。一年后他的父亲在克雷西战役(Crécy)^①中阵亡,查理加冕了波西米亚国王,并于 1355 年在罗马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黑死病在帝国境内的第一站是意大利,但查理四世并没有为这片自治区域采取任何措施。实际上,在自己的家族领土之外,

^① 1346 年 8 月 26 日发生在法国北部的克雷西,交战双方是法国和波西米亚联军与英国。这是百年战争的重要战役之一。——译者注

他的影响十分有限。鉴于此,他只能无所作为。和教皇一样,查理谴责了将犹太人视为“瘟疫传播者”并迫害他们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却宣布阿尔萨斯现在和将来受迫害犹太人的财产将被转交给特里尔(Trier)的大主教。这可能只是为了讨好帝国的一位选帝侯而耍的政治手腕,但客观上却削弱了教会制止暴行的动力。不过,它对遏制暴徒们的烧杀劫掠也有一定效果,因为法律上他们无法得到属于教会的财产。还有传言说,查理曾向勃兰登堡侯爵许诺,将纽伦堡下一次反犹行动中获得的三处最好的犹太人房产送给他。这位侯爵也是选帝侯,因此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查理还响应教皇号召谴责鞭笞赎罪者,但他们最终的消亡与他关系不大。

黑死病爆发前,查理已经建立了布拉格大学(1347年获得教皇批准,1348年4月获得皇帝颁发的许可令),它是中欧第一所大学,模板是巴黎和博洛尼亚的大学,两者分别是欧洲神学和法学研究的中心。查理广泛的学术兴趣在当时是罕见的,这得益于他在巴黎的日子。在第一次瘟疫后的30年间,查理在帝国新的首都布拉格大兴土木。他常年资助学者和作家,比如诗人海因里希·冯·穆格恩(Heinrich von Mügeln)就在他的宫廷效力。海因里希的诗歌《若有谁想知晓》用占星学的观点解释了瘟疫的成因,非常符合查理的口味。该诗用德语写成,这反映了查理对帝国各方言的重视,特别是捷克语和德语。他的其他功绩包括翻译和推广了巴黎大学的《瘟疫须知》。

后期的查理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他先后四次结婚,并通过每次婚姻吞并新的土地。在结束加冕仪式后,查理于1356年颁布了所谓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这份宪法性的文件规定,罗马国王将由七位帝国主要的贵族(包括勃兰登堡伯爵和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出,教皇无权干涉。1378年11月29

日,查理在布拉格去世。

克雷芒六世(皮埃尔·罗热)(1291 或 1292—1352 年),教皇

克雷芒六世(Clement VI/Pierre Roger)是罗马(和阿维尼翁)的天主教主教,1342—1352 年间出任教皇,他的任内正值黑死病肆虐。皮埃尔出生在法国科雷兹省(Corrèze)莫蒙市(Maumont)一个下层贵族家庭,是家中次子。1301 年,他进入奥弗涅地区的神座修道院(Chaise-Dieu),5 年后正式成为本笃会修士。不久他被送去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完成了艺术、哲学、神学和宗教法的课程。他在巴黎授课和布道时引起了法王查理四世和知名教士的注意。30 岁不到,他就在主教任免权问题上为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提供理论支持。当教廷搬到阿维尼翁附近后,皮埃尔很快引起了约翰的注意。教皇和国王提前几年向皮埃尔颁发神学硕士学位,授予其教师许可,让他在巴黎大学教授宗教法和神学。身为学者的皮埃尔继续站在教皇一边,抨击圣方济各会对教会拥有财产的质疑,反对法王提出的教会审判权和世俗法庭分立的主张。为了奖赏他的支持和服务,教皇于 1326 年任命他为费康(Fécamp)的诺曼修道院的院长,1328 年升任阿拉斯(Arras)主教,1329 年擢升为桑斯(Sens)大主教,1330 年改任鲁昂(Rouen)大主教。在英法百年战争初期,作为忠诚的法国人,皮埃尔还是法王的谋士和外交官。此外,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法王腓力六世率领的新的十字军东征。1338 年,他进入红衣主教院,并于 1342 年 5 月 7 日被选为教皇,同年 5 月 19 日,他加冕为克雷芒六世。

作为教皇,克雷芒竭尽所能捍卫教廷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增加教廷威仪来光耀教会。在阿维尼翁,他斥巨资扩建和装潢教皇

宫,还在教廷引入菲利普·德·维特利(Philippe de Vitry)的新式音乐。实际上,他创造了西方拉丁语世界最炫目的宫廷。他热衷于书籍收藏,委派彼特拉克搜寻珍本。他的布道里常常引用古典作品的内容。克雷芒还关心穷人,他每天要分发30 000个面包,是前任约翰的3倍。他试图让英法停战,希望双方联合起来参加对土耳其人的东征,但以失败告终。克雷芒和神圣罗马帝国关系紧张。他和前任都将巴伐利亚的路易视为异端,拒绝了后者的要求。他安排波西米亚的查理当选罗马国王,但却拒绝将其加冕为皇帝。此外,要求他回归罗马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科拉·迪·利恩佐(Cola di Rienzo)被革命政府推举为“人民的护民官”之后(1347年5月)。

当欧洲遭遇瘟疫时,克雷芒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精神之父;当2月初瘟疫到达阿维尼翁后,他还不得不特别为自己的教区操心。克雷芒对天文学和占星学很感兴趣(当时,两者的关系比现在密切得多),因此他试图找到天体和疾病间的联系。为了了解病因,他下令对尸体进行解剖。作为教区的精神领袖,他赦免了所有死者的罪,即使他们死前没有能够向神父忏悔。他觉得瘟疫是上帝在惩罚人的罪,并在自己激情洋溢的布道中提到这一点。他警告说,过着罪恶生活的人将受到严惩。当时的资料显示,他曾经鼓励当地一个鞭笞赎罪团赤着脚穿过阿维尼翁,因为他觉得那些受苦和赎罪的榜样会平息上帝的怒火,促使更多人悔罪。克雷芒还自掏腰包帮助病人和埋葬死者。当原有墓地用完后,他出资购买新的墓地,甚至感谢罗纳河接受死者的尸体。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内,克雷芒鼓励人们祈祷和悔罪,甚至为瘟疫时期撰写了特别的弥撒文并在西欧流传。当听说犹太人和犹太社区被迫害时,他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1348年7月4日,

他颁布教皇令,表示瘟疫中犹太人的死亡率并不比基督徒低,因此禁止在基督教世界内侵害他们。9月26日,他又颁布了第二道敕令。虽然犹太人拒绝承认基督和福音书的做法令他不满,但克雷芒还是把他们看作上帝的选民,对其加以保护。当鞭笞赎罪团开始在中欧巡游,他正式对其进行谴责。他宣布1350年为大赦年,所有前往罗马朝觐者的灵魂都将被赦免。这样做既能疏导鞭笞赎罪者的精力,又安抚了罗马人民,因为在教廷离开后的40年间,他们的买卖和收入大受损失。

克雷芒于1352年12月6日去世,被埋在最早出家的神座修道院。他的坟墓之上是自己身着全副教皇衣冠的白色大理石像,周围是45位他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的雕像。

普拉托的弗朗切斯科·迪·马可·达蒂尼(约1335—1410年),托斯卡纳商人

1348年的黑死病让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 da Prato)成了孤儿,他的一生中还将目睹6次疫情。弗朗切斯科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遗嘱要求为孤儿和弃儿建立两个基金。他的父亲在普拉托开了家小酒馆,距离佛罗伦萨10英里。1348年父母去世后,弗朗切斯科得到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15岁时,他离开普拉托,和别的托斯卡纳商人一起前往教廷所在的阿维尼翁。在经历瘟疫重创的阿维尼翁,商人们大受欢迎。接下去的30年间,达蒂尼积累了一小笔财富,他的买卖包括布匹、盔甲甚至小型的圣人画像。1376年,他与来自佛罗伦萨的贵族女子玛格丽塔·班蒂尼(Margherita Bandini)结婚,但两人终生未育。教皇回归罗马后,夫妇俩也于1382年回到了托斯卡

纳。弗朗切斯科通过在阿维尼翁的代理商继续自己的买卖,不久还在巴塞罗那、米兰、马略卡、热那亚、比萨和佛罗伦萨开设分号。他的冒险获得了成功。在普拉托,他们新建了豪宅,由玛格丽塔打理一切。这座房子至今完好,里面保存着达蒂尼大量的书信和账本,这些材料的价值无法估量,使今天的人们能一窥瘟疫时期的日常生活。

回到故乡的达蒂尼一家和他们的亲友经历了 1390 年和 1399—1400 年的两次瘟疫。玛格丽塔在佛罗伦萨的姐夫在三封家书中证实了 1390 年 5 月到 6 月间当地正流行瘟疫,信中说:“空气被污染了”,“空气发臭”。普拉托也受到威胁,信中质疑达蒂尼为何不把家人搬到更安全的地方:“你在等着家里有人死去吗?!”反讽的是,与此同时,达蒂尼在佛罗伦萨的代理商正为粉刷匠和颜料而犯愁。7 月初,达蒂尼决定搬到皮斯托亚。巴托洛梅奥·迪·梅塞·尼科劳(Bartolomeo di Messer Nicolao)的一封欢迎信反映了当时达蒂尼往来书信中的情绪:“愿上帝的仁慈不是来自我们的美德,而是他无限的善。虽然死亡是自然的事情,既不可鄙又不能避免,我们还是要好好努力活着。瘟疫绝非人力所为,而是来自上帝。他的仁慈带给我们希望。我们憎恶降临的危险,或者过早剥夺我们生命的东西。”达蒂尼一家搬走后,友人们从普拉托来信,告知他们共同朋友的死亡。10 月 1 日,弗朗切斯科·安乔里尼(Francesco Angiolini)送来一张病人和新近死亡者的名单。两天后,达蒂尼写信给患病的公证人巴托洛梅奥(Bartolomeo):“我一定向上帝祈祷,请求让你和你所有的朋友恢复健康。”他表示,自己确信疾病是由人的罪引起的,因此“我觉得除了向上帝祈祷,让他宽恕我们的罪之外,无药可救”。不久,达蒂尼的好朋友,虔诚的公证人拉波·马泽伊(Lapo Mazzei)为他

上了这么一课：“看着你我的朋友和邻居被死神击倒，你就会明白除了善行，无论拥有多少财产都是没用的。如果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被遮住的话，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应该看得明白：生命就是奔向死亡（但丁《炼狱》，第 33 曲第 54 行）。”几周后，达蒂尼一家回到了普拉托。

1399 年 8 月，达蒂尼冒着酷暑参加白衣朝觐（Bianchi Pilgrimage）^①，和几百名意大利人一起前往附近的阿雷佐，希望取悦上帝，避免瘟疫，因为意大利各地都出现瘟疫的流言。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同年 11 月 7 日，达蒂尼的老朋友尼科洛·吉恩塔（Niccolo Giunta）从佛罗伦萨来信，他说：“这里每天都有人参加游行和斋戒，本周没有一天吃肉。因为害怕瘟疫，每天早上都要举行弥撒，人们秉烛参加完弥撒，然后祈求上帝救我们脱离瘟疫。如果对我们的灵魂有益，上帝会这样做的。”起初疫情并不严重，达蒂尼最大的负担只是儿童的医药费。但到了 1400 年春天，死亡数字开始上升。4 月 23 日，尼科洛写道：“瘟疫在这里造成了巨大损失，许多人生病。”后来的书信记录了亲友的死亡。达蒂尼的热那亚合伙人去世后，他的公证人斯基亚塔先生（Schiatta）送上了迟来的安慰信，斯基亚塔自己的妻子也在差不多同时去世，他说：“她无比虔诚地参加教会的各种圣礼，就像每个忠诚的基督徒一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仍在与她交谈，她始终保持着理性，只要生命还没有离开她……愿上帝赐予神圣的仁慈，接纳她的灵魂进入永恒的天国。”达蒂尼早就准备逃离普拉托。阿雷佐和博洛尼亚是最好的选择，他在两地都有许多朋友，特别是受过他资助

^① 1399 年，从意大利北部发起的宗教运动，参加者身着白衣表示悔罪和灵魂的改过自新。8 月到达了佛罗伦萨。——译者注

的当地圣方济各会。在博洛尼亚，“空气清新，无人死亡”，许多佛罗伦萨人早在 6 月中旬已经搬到那里，大多数还带着足够的日用物资。在阿雷佐，据他的朋友说“一切都要优于博洛尼亚，无论空气、酒、水、自然条件还是其他什么，唯一的问题是，瘟疫已经到过博洛尼亚，但还未到过这里”。他听取了别人的意见，特别是皮斯托亚的斯特法诺·瓜扎洛蒂 (Stefano Guazzalotti)，那人认为：“最好去博洛尼亚而不是阿雷佐，因为瘟疫已经到过那里，而它还没有到过阿雷佐。从理性上说，发生过瘟疫的地方要比瘟疫还未到达的地方更安全。”两天后，他们搬去博洛尼亚，一年后才返回。

瘟疫重创了达蒂尼，他失去了斯基亚塔先生和尼科洛·吉恩塔，他的银行合伙人在到达博洛尼亚后不久也死去了。斯特法诺·瓜扎洛蒂 (Stefano Guazzalotti) 失去了大儿子，拉波 (Lapo) 至少埋葬了 3 个孩子，他说：“三天前我亲眼看着两个孩子死去。仅仅几个小时，老大和老三就先后在我的怀抱中死去。上帝知道我对老大抱了多大希望。对于我来说他就像个伙伴，对于其他孩子，他就像父亲一样。”

接下来的 10 年间，拉波帮助达蒂尼订立遗嘱。他拿出 1 000 弗洛林^①帮助佛罗伦萨的无罪者医院，他用大部分财产创建了达蒂尼基金，用于帮助孤儿和弃儿。1410 年 8 月，达蒂尼在普拉托去世并被埋在当地，不久就爆发了新一波的瘟疫。

帕伽玛的盖伦(约 129—199 或 229 年)，希腊—罗马的内科医生

盖伦 (Galen of Pergamum) 继承了古希腊医学家科斯的希波

^① 一种最先由意大利佛罗伦萨于 1252 年制造的金币，当时约合 1 里拉。——译者注

克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 年)的理论和实践。他的医学著作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影响巨大。盖伦的父亲是数学家和建筑师,从小就让他系统地学习希腊哲学和修辞学,还亲自教给他各种知识。盖伦 16 岁前往士麦那(Smyrna,今土耳其西部港市伊兹密尔)学医,几年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完成学业。157 年,他回到帕伽玛(今属土耳其)行医。他最早在阿斯克勒庇翁(Asklepion)^①医治角斗士,从他们身上他无疑学到了许多人体生理学知识和康复手段。角斗士是奴隶,奴隶是财产,因此他们的主人要求尽可能让财产保值。约 161 年,盖伦迁居罗马行医,他公开讲授和示范尸体解剖。在治愈一位著名哲人后,他引起了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注意。但因为不堪恶意竞争或者由于罗马发生瘟疫,盖伦于 166 年返回了帕伽玛。3 年后,奥勒留将他召回,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出征日耳曼,但盖伦后来留在了罗马照顾 8 岁的康茂德(Commodus, 奥勒留之子)。盖伦以学识和治疗手段著称,因此他成为了康茂德的老师,并与热爱哲学的奥勒留探讨学术问题。在宫中的这段时间,盖伦完成了大部分的作品,也包括非医学的。他写过教育理论、语法和道德哲学。不过真正让他闻名的还是医学作品。

盖伦博采众长,他的老师包括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一些名气较小的思想家,但他向读者强调的是从知识和观察中作出独立判断。行医者需要通用的信息和理论,但每个病例都是不同情况和症状的组合。他的作品详细描述了各种案例,内容包括排泄物的情况,体温和情绪状况(激动、无力或平静)及其变

① 即阿斯克勒庇厄斯的神庙,他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疗之神,其庙宇是古代的医院。——译者注

化。虽然不是专家,但他认识到医生必须把人体看作整体,对其详加了解。他不仅解剖人的尸体,还解剖动物尸体以加深对生命工作方式的了解。他相信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之间没有显著区别,这种观点可能来自治疗角斗士的经历。在《我的观点》中,盖伦强调了医学和哲学的关系,将前者普适化,把理论而非实践作为它的基础。另一方面,医生的观察和实验也影响到他的哲学作品,它们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品更加务实和贴近生活。

盖伦接受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他把人体器官分为心、脑和肝三个系统,这些不正确的观点被中世纪的医生继承。由于大多数疾病被认为是体液失衡的结果,因此治疗主要是通过饮食或直接调节的方法(如放血)恢复平衡。将体液同周围条件(热冷干湿),“因素”(地水火风)甚至植物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诱人的普适模型,直到 17 世纪前人类一直被它蒙在鼓里。

由于盖伦的作品是希腊文的,它们只是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流传,说拉丁语的西方世界对其只有零星的了解。从 9 世纪开始,穆斯林医生和科学家开始更深入地把盖伦的观点和实践融入自己的作品。通过这些阿拉伯文的资料,西欧学者吸收了盖伦大部分的思想,在现存 13 和 14 世纪的拉丁医疗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与盖伦的临床材料相比,以他的体液理论为依据的疗法却效果不佳。直到黑死病来袭,西方世界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佛里尼奥的詹蒂莱(约 1275—1348 年),意大利医生和医学院教授

詹蒂莱(Gentile da Foligno)是 14 世纪最著名的医生和医学

作家之一。他的瘟疫传单对后来的同类作品影响甚大。1275 年左右,詹蒂莱出生在佩鲁贾或者佛里尼奥,他的父亲老詹蒂莱很可能也是医生。他娶雅克巴·波尼玛尼(Iacoba Bonimani)为妻,两人育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位后来也成为医生。他可能在博洛尼亚大学接受教育,老师很可能是当时最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塔戴奥·阿尔德洛蒂(Taddeo Alderotti)。他对塞内卡这样的古罗马文学大师颇为欣赏,当时后者的作品在意大利北部重新流行起来并被人研究。直到 1322 年,詹蒂莱都留在博洛尼亚教书和行医。在许多老师和学生离开一两年后,詹蒂莱终于也来到锡耶纳帮助当地政府筹建大学,但没有成功。此后他接受佩鲁贾的邀请前往任教(可能还担任公共医生),薪水是丰厚的 60 个金弗洛林。除了曾在帕多瓦待过很短的时间,从此他一直住在那里。

与当时大多数西方医生一样,詹蒂莱在学校和自学得到的知识都来自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权威。许多医学院教授所谓的经院医学,学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掌握传统文本。学生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明显的矛盾,但不允许质疑权威。与艺术、法律和神学一样,老师们对权威进行评论,以供学生和其他专家参考。詹蒂莱写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医学作品、医学传单或须知、演讲和评论,有 90 多份保存至今。令他闻名于世的是对 11 世纪医学家阿维森纳《医典》(*Canon of Medicine*)的评论。詹蒂莱从 1315 年开始动笔,直到黑死病爆发前才完成。12 世纪末,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把阿拉伯文的《医典》翻译成拉丁文,这是当时最受尊敬的医学教科书,它在欧洲的权威地位持续到 17 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持续到 19 世纪。詹蒂莱根据西方大学中盖伦的理论以及自己的经验对《医典》作了诠释。对于经验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他提出了异议。虽然阿维森纳十分

倚重自己的经验,但他认为把结论直接教给学生就够了,而詹蒂莱则深刻地感到有些东西只能从观察和实验中学到。

瘟疫来袭时,詹蒂莱已经是个老人,但他仍然写了至少五份关于疾病的须知。第一份是为热那亚的医生公会写的,1347年秋天那里爆发了瘟疫。最详细的一份是为佩鲁贾写的,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作品,因为1348年6月18日他因劳累过度而倒下(并非死于瘟疫)。由于他声名在外,又是最早撰写此类作品的人,许多人成了詹蒂莱的信徒。他的须知并未过多涉及上帝和天体的内容,而是严肃地把瘟疫看作中毒。詹蒂莱承认自己不清楚中毒的具体过程,但他表示所有接触过毒物的东西也会带毒,毒素会摧毁心脏。瘟疫“在人际和不同地方间传播”。他承认避免瘟疫的最好办法就是逃亡(要逃得快,逃得远,不要很快回来),但同时建议净化空气,减少体力劳动,选择保持身体“干燥”的饮食,并保持乐观。他详细罗列了保持身体“干燥”的食物和药方。他建议在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大量放血,或者用烧红的金属灼烧淋巴肿块,或者用碾碎的海棠果和鸟粪做成膏状物涂在患处拔毒。作为一个好老师,他在最后还探讨了更多学术问题,如个体的易感性等。

利萨德·阿德·丁·伊本·阿尔·哈提卜(1313—1375年), 安达卢西亚的医生和官员

阿尔·哈提卜(Lisad-ad Din ibn al-Khatib)和阿比·贾法尔·艾哈迈德·伊本·哈提玛(Abi Gafar Ahmed ibn Khatimah)是安达卢西亚最著名的两位瘟疫须知作者。71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后,哈提卜的祖先就从叙利亚来到安达卢西

亚。他在格拉纳达学习医学，并在 1341 年左右为当地的统治者优素福一世服务，担任宰相阿里·本·阿尔-贾亚布 (Ali bin al-Djayyab) 的秘书。1349 年宰相死于瘟疫，阿尔-哈提卜取代他掌管皇家法院。1354 年优素福去世，穆罕默德五世登基，哈提卜在权力更迭中幸免于难。1349 年，穆罕默德五世被政敌废黜，逃往摩洛哥。哈提卜也遭囚禁，出狱后他回到穆罕默德五世身边。1362 年穆罕默德复辟，忠诚的哈提卜被任命为宰相，成为宫中最显赫的人物。但到了 1372 年他的政敌开始占据上风，哈提卜借考察王国防务的机会，越过海峡逃到了摩洛哥的休达 (Ceuta)。他受到异端罪和叛国罪的指控，于 1375 年被捕并送回格拉纳达。在经过秘密审判后，他在监狱中被勒死，因为人们不能合法地处决他。

与其他几位著名的穆斯林医生一样，哈提卜更多的是学者而非行医者。他的著述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和医学。他的论文《论瘟疫的传播》(*Muqni'at as-sa'il an marad al-ha'il*) 可能是 1359—1362 年在摩洛哥流亡期间完成的。与任何同时代的穆斯林医生以及大多数基督徒医生相比，他更加注重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而非权威的传统模型。他写道：“不要忘记，当传统的证明与观察相悖时，我们要把它看成比喻。”这意味着当《古兰经》或其他宗教文献与日常所见相悖时，虽然不能认定它们有误，但至少说明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它们的真理和意义隐藏在文字之下，只有通过正确的解读才能领会。哈提卜驳斥了瘴气理论，并委婉地对真主发动瘟疫的看法表示异议。因为他清楚地看到，瘟疫传播的原因是感染这个随机因素，而非污染的空气或是神的指令，虽然这种看法与反对感染存在的伊斯兰教义相悖。“经验、调查、思考、个人观察和可靠的报告都证明了感染的存在。这些都是证据。”哈提卜大胆挑战了当时的正统医学和宗教，他日后受到异端

指控可能与此有关。

哈提卜把瘟疫分为淋巴肿块型和肺部感染型，并用体液理论分析两者。为了避免感染，他建议暂时躲避，而他推荐的疗法则体现了当时所理解的瘟疫对人体的影响。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人”，他一生经历了意大利的三次瘟疫并失去许多亲人，他极富个人情感的诗歌体现了当时的焦虑和痛苦。1304年，彼特拉克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父亲是公证人，与但丁交好。他从小就开始接触古典拉丁文学，为日后成为人文主义学者打下了基础。1313年，彼特拉克一家迁往教廷所在的阿维尼翁，最后在附近的卡庞特拉斯(Carpentras)落脚，弗朗切斯科在那里接受正式教育。随后他进入法国蒙彼利埃的法学院，并于1323年前往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但刻板的教育和律师生涯让他生厌。父亲去世和其后一系列事件让彼特拉克失去了遗产和依靠，于是他加入教会，前往“西方的巴比伦”阿维尼翁谋求机会。他投入红衣主教乔瓦尼·科罗纳(Giovanni Colonna)门下，作为后者的代表于14世纪30年代游历了罗马和北欧各地。1327年，他在阿维尼翁第一次遇见劳拉，这名女子是他大量开创性意大利语诗歌的灵感之源。他的十四行诗流传广泛，大受欢迎，罗马和巴黎都邀请他担任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接受了罗马的邀请，因为那里不仅是使徒之城，还环绕着古代的荣光。他讨厌阿维尼翁，但因为创作和研究离不开教廷资助，他只好定居在近郊的沃克吕斯(Vaucluse)，在那里作诗、研究和打理花园。

“我觉得今年,也就是 1348 年,是不幸的开始。”瘟疫爆发时,他正在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和帕尔玛之间穿梭。5 月 19 日,外号“苏格拉底”的好友路易·海利根(Louis Heiligen)告诉他,劳拉已经在阿维尼翁去世。7 月,红衣主教科罗纳去世,不久,彼特拉克的密友帕加尼诺·德·比佐泽罗(Paganino de Bizzozzero)全家也没有幸免。诸如此类的消息促使彼特拉克写下了拉丁文诗《致你自己》(*Ad te ipsum*),诗中写道:

死亡的世界里时间突进,
老少垂死的人环绕着我,
走遍世界也找不到
希望的庇护和港湾。
我惊恐的眼中只有葬礼,
庙宇^[1]不堪棺木的重负,
荣耀者失去荣光,
与卑微者比邻而居。
我的心看见生命的终点,
至亲的逝者浮上眼帘。
神圣的大地载不动这许多坟墓。

(翻译:恩斯特·哈奇·威尔金斯)

他还说过:“生命是漫长的痛苦。”彼特拉克曾写过《爱情的胜利》和《贞洁的胜利》两首诗,现在他开始写《死神的胜利》,将劳拉和其他许多人的死亡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永恒的诗歌和绘画主题。后来他又写了《名誉的胜利》,预言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崇拜。与此同时,在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修道院,他的哥哥格拉尔多亲手埋葬了其他僧侣。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他担负着寻找新院长和重建家园的重任。在一封著名的写给格拉尔多的信

中,弗朗切斯科表达了自己的恐惧:

没有天上的雷电或地上的火焰,没有战争或其他看得见的杀戮,后人怎么会相信几乎整个大地上,而不仅是某些地方的人都被夺去了生命呢?房屋空置,城市被遗弃,农田被荒废,土地不够用来埋葬死者,全世界弥漫这恐惧和孤独,有谁曾看见或听说过这样的事,有哪本史书上记载过它?……未来快乐的人啊,他们不会知道这些痛苦,很可能把我们的亲眼所见当做虚构。我们的确应该承受这些(惩罚),甚至更多,但我们的祖先也应承受。愿我们的后人不要遭受同样的命运。(翻译:乔治·多克斯)

彼特拉克留在了意大利北部,1361年再次爆发瘟疫时他决定待在米兰。当有人请他去乡间别墅避难时,彼特拉克婉拒了,他勇敢地说:“在(死亡)面前恐惧是可鄙的。”7月,他失去了25岁的私生子乔瓦尼,他说:“在史无前例的瘟疫灾难中,他死于米兰,死神还从未有过这里,但它终于发动了进攻。”8月,他获悉亲爱的朋友“苏格拉底”和阿维尼翁的好友菲利普·德·维特利(Philippe de Vitry)的死讯,他生命中最后的快乐也被剥夺了。

一边是修士的清规戒律,一边是无拘无束、自由研究古典作品的愿望,彼特拉克一生都生活在这对矛盾中,而瘟疫和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忧郁。在威尼斯和帕多瓦一带,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1374年7月18日,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亚历山大·埃米尔·约翰·耶尔森(1863—1943),瑞士/法国的微生物学家

耶尔森(Alexandre Emile John Yersin)是第一个成功分离出

腺鼠疫病菌并制造出疫苗的人。他出生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拉沃(Lavaux)，是遗腹子。母亲一边管理一所女子精修学校，一边把他拉扯大。耶尔森从小受加尔文宗的教育，但后来放弃了所有宗教信仰，而是把研究昆虫作为爱好。在洛桑学院医学预科学习一年后，他从那里退学，于1884年前往德意志马尔堡(Marburg)学习植物学，但后来又改学人体解剖和病理学。1885年，耶尔森搬到巴黎，首先在神舍医院(Hotel Dieu)工作，然后加入了安德雷·高尔尼(Andre Cornil)的私人细菌实验室。在那里，他遇见了著名细菌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作为志愿者，耶尔森参与了巴斯德研究所的狂犬病研究，然后作为埃米尔·鲁(Emile Roux)的助手研究白喉和结核病。1889年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巴黎大学嘉奖，这与他对结核病的研究有直接关系。这年夏天在柏林，他跟随巴斯德在学界的竞争对手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学习细菌学。回到巴黎后，耶尔森开始教授研究所新开设的微生物学课程，同时继续研究白喉并加入法国籍。这年年底，他决定去度假。

在一年的假期中，耶尔森在一艘往来于马尼拉和西贡间的班轮上担任医生。他对印度支那腹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绘制地貌，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当地居民。巴斯德的学生阿尔贝·卡勒麦特(Albert Calmette，卡介苗的发明者之一)邀请他成为实验室合伙人，但耶尔森婉拒了，因为他决定暂时不把医生作为终生职业。1893年，他从巴黎回到东南亚，调查当地的流行病。当时中国正流行瘟疫，耶尔森决定亲赴实地研究。由于无法进入大陆，他只能于1894年6月15日来到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很快，他获得了意大利传教士维加诺神父(Father Vigano)的帮助，后者已经在当地待了30多年。6月12日，罗伯特·科赫的日本高

足北里柴三郎带着大量随从人员也来到香港，他获得港英当局的许可，可以使用所有的医疗设施并研究瘟疫死者的尸体。耶尔森却不得不栖身竹棚，研究用生石灰保存的尸体。这些尸体是维加诺贿赂英国水手得到的，原本要被处理掉。

耶尔森认为淋巴结肿块中应该存在病原体。他研究了从肿块抽取的物质，发现其中存在高浓度的未知细菌。他把该物质注入动物体内，动物也死亡了。用了不到一周，他就分离出致命的病原体。6月22日，耶尔森将研究结果提交给当局并获得首肯，被允许使用医疗设施和研究死者。与此同时，北里柴三郎也分离出他认为是罪魁祸首的病毒和细菌，但他的副手认为那可能是链球菌。北里柴三郎的老师绪方正规也承认，耶尔森才是唯一真正的发现者。该病菌被正式命名为鼠疫巴斯德氏杆菌（巴氏鼠疫菌），但由于北里柴三郎一直认为自己也是发现者，它也通称北里-耶尔森菌。1971年，它的正式名称被改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耶氏鼠疫菌）。耶尔森还发现了病菌与家鼠的关系以及人鼠间可能的联系。他发现细菌在土壤中也能存活一定时间，但并没有找到跳蚤和病菌传播的关系。

虽然港英当局希望耶尔森留在香港，他却被法国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调查“黑水热”，但没有找出病因。1895年他回到巴黎，利用被驯服的活体病菌制造疫苗。活菌实验失败后，他用58℃的高温杀死病菌，冷却一小时后将其注入动物体内，结果发现对包括马在内的许多动物都有效果。他马上回到越南，开始在芽庄（Nha Trang，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的研究站里生产免疫血清，这里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一个正式的分支机构。1896年春天，香港再次爆发瘟疫。6月26日，第一名患者被治愈，他是一个18岁的中国神学院学生。在接下去的10天里，23名患者接

受了血清治疗,21人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二年印度爆发瘟疫时,血清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只有50%的人活了下来,人们的工作还有待完善。耶尔森留在了芽庄,但不再研究微生物,转而从事养牛以及种植从巴西引进的橡胶树和用于提炼奎宁的金鸡纳树。他在当地建立了一所医学院,但法国殖民当局只允许他的学员担当护士。耶尔森对此非常不满,最终关掉了学校。1940年德意志入侵前夕,他最后一次造访巴黎。1943年冬天,他在被日本人占领的芽庄平静地去世。

注释:

[1] 指天堂教堂。

原始文献

1. 君士坦丁堡的黑死病(1347年)

瘟疫带给拜占庭帝国的灾难毫不逊于它带给西方的。1355年,退隐后的康塔库泽诺斯家族(Cantacuzenos)的约翰六世皇帝在修道院写了1320—1356年的帝国史。在叙述1347年的瘟疫时,他讨论了各种问题,包括疾病的起源和传播,症状和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它的反应。虽然不是医生,他对医学细节和民众反应的观察却相当敏锐。由于熟读古希腊文学,他直接从修昔底德笔下了解了雅典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49—53页,约公元前330年),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前者的影响。他书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既与同类作品存在联系,又有所不同,比如瘟疫发源于俄罗斯南部而非中国、疾病的传染性、家畜的死亡、幸存者表现出免疫力、疾病的不同形式以及恐惧、紧张和更加虔诚等社会心理反应。

文献1

瘟疫的描述

选自康塔库泽诺斯家族约翰六世皇帝(John VI Cantacuzenos)的《历史》(Historiaum),作于1355年后

到达拜占庭时,皇后发现小儿子安德洛尼科斯(Andronikos)死于瘟疫。瘟疫来自极北之地的斯基泰人(Scythians,位于俄罗斯南部),它袭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岸并杀死了大部分人。

它不仅肆虐本都(Pontus,位于黑海南岸)、色雷斯(Thrace,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和马其顿,还袭击了希腊、意大利及其诸岛、埃及、利比亚、犹大(Judea,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和叙利亚,几乎扩散到整个世界。

瘟疫无药可救,无论有规律的生活还是强健的身体都无法抵挡它。它对强壮的人和虚弱者一视同仁,条件最好人的和穷人一样死去。这一年没有发生别的(重大)疾病。原先有病的人肯定会死于瘟疫,什么医术都不管用。疾病在每个人身上的发展过程也不一样,无力抵抗的人当天就死了,有些甚至活不过几个小时。那些能撑过两三天的人一开始会发高烧,这时疾病正侵袭他们的头部。他们无法说话并对周遭一切失去知觉,随后好像进入了沉睡。有时他们可能会醒过来,但舌头僵硬说不出话,而且由于头部后侧的神经死亡,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他们会突然死去。有时瘟疫会侵入肺部而非头部,它引发炎症导致胸部剧痛。

病人痰中带血,呼吸腥臭。发烧导致咽喉和舌头干枯并发黑充血。这与饮水多少无关。病人永远处于失眠和虚弱中。

上臂和小臂出现脓肿,有时也出现在上颌骨或身体其他部位。有时脓肿较大,有时较小。病人体表出现黑色水泡。有人全身爆发黑斑,有人数量不多但很明显,有人则色浅而密集。所有死于该疾病的人都会有上述症状,但有的出现了所有症状,有的只有几种,甚至在为数不少的病例中,死者只出现一种症状。幸存者寥寥无几,但他们不会再次感染该疾病,它不会两次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小腿或手臂上会形成大的肿块,切开后有大量腥臭脓液流出,这是该疾病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有人出现了全部症状却意想不到地康复了。谁也帮不上忙,即使有人把对自己有效的疗法介绍给另一个病人,对后者来说也是有害无益。有人还因帮别人治

病而感染。瘟疫造成了巨大破坏，许多房屋被遗弃。家畜和主人死在一起。最可怕的是失去信心。当有人感觉自己生病时，他们知道没有康复的希望，于是陷入绝望，这导致了衰弱加剧和疾病恶化，病人会马上死去。没有语言可以表达该疾病的本质，只能说它与人类日常罹患的各种恶疾完全不一样，它的降临是因为上帝想要恢复人间的贞洁。许多人都改过自新，使自己心灵向善，有的还是死了，但也有人战胜了疾病。那段时间，他们摒弃一切邪恶，过着有德的生活。甚至有许多人虽然还没患病，却已经把财产分给了穷人。如果有人感觉自己患病了，他绝不会冷漠到不为自己的过错忏悔，以便在上帝的审判席前得到最大的救赎机会，他不相信灵魂是无可救药的。在拜占庭有许多人死去，皇帝之子安德洛尼克斯也在患病后第三天去世了。

来源：克里斯托斯·巴特索卡斯(Christos Bartsocas)的《14世纪两段关于“黑死病”的希腊文描述》。“Two Fourteenth Century Greek Descriptions of the ‘Black Death.’”选自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21 (1966): pp. 394—400.

2. 布拉格诗人眼中的黑死病成因

海因里希·冯·穆格恩是布拉格的宫廷诗人。在巴黎接受过教育的查理四世皇帝对占星学和科学兴趣浓厚，诗人在创作这首作品时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该诗把瘟疫归咎于木星和土星会合于水瓶宫，该观点起源于希腊—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医学和经院科学，诗中所说的天文事件发生在1345年。瘟疫和占星“科学”都不是合适的诗歌题材，但海

因里希却别出心裁地用德语方言将两者结合起来。1350年左右,列日的西蒙·德·科维努斯在拉丁文的《太阳的审判》(De iudicio Solis)中同样写了天体的寓言,但他的作品要长得多,内容也丰富和复杂许多^[1]。我们不清楚两人中谁才是这类题材的开创者。不过,西蒙明确地将所有天体置于犹太—基督教之神的终极权威之下,而海因里希的作品则可以被解读为完全自然主义的。

文献 2

《若有谁想知晓》(Wer wil nu wissen das)

海因里希·冯·穆格恩,作于约1349—1355年

若有谁想知晓

大瘟疫来自何方,

让他跟随我的诗章

走上真知之途。

天上有十二个星座,

据我所知叫行星之宫。

水瓶座是土星最大的星宫,

它的主宫^①所在。我发誓。

若有虚言,甘受火刑!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当土星位于主宫时,

① 古代占星学中,六大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分别是黄道十二宫中两个宫的主星,土星对应的是水瓶和摩羯。——译者注

恰好与木星之神^①的
权柄和威仪连在一起。
凭着主宫的力量，
土星获得了胜利，
重创了木星之神。
他伤害了造物，折磨着生灵。
土星干冷如同大地，
高贵的木星却湿润温暖。
在这敌意的气候中，
土星唤起了死神的肆虐。

现在我要讲说真相：
因为水瓶具有人形，
所以人类将受死神的蹂躏。
不过，我听人说过，
如果他们会合在别的星座
比如双鱼
无疑死亡的将是群鱼。
阿布马萨尔和托勒密^[2]确立了这些规则，
我把它们放在这儿。
如果有谁要反驳它们，
那种想法一定来自愚蠢的心。

来源：威廉·麦克唐纳德(William McDonald)的《星球中的死

① 木星即 Jupiter，是罗马主神朱庇特的名字。——译者注

亡》,“Death in the Stars.”选自 *Mediaevalia* 5 (1979): pp. 89—112.

3. 瘟疫机制的一种解释:腐败的空气(1348年)

阿尔梅里亚的阿比·贾法尔·伊本·阿里·伊本·哈提玛(*Abi Gafar Ahmed ibn Ali ibn Khatimah of Almeria*)是安达卢西亚(阿拉伯人对所占西班牙南部地区的统称)的一位医生,他写于1348年的《瘟疫分析研究》(*Tahsil al-gharad al-qasid fi tafsil al-marad al-wafid*)是14世纪最通俗的关于瘟疫的医学传单之一。在下面的摘录中,他解释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元素“气”和其他“次要”物质的混合物)是如何被瘟疫蒸汽污染从而造成人类和动物死亡的。同样的,水也会“受瘟疫污染”而带有毒性。在他对瘟疫的理解中,最关键的是“腐败”的概念。通过与一位并不存在的反对者的“对话”,哈提玛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的作品在细节上同基督教的医学作品并不一致,但在许多方面仍是相似的,这反映了基督教和穆斯林都把古希腊人的观点作为基础,特别是希波克拉底、盖伦和亚里士多德。现代读者会觉得文中的许多讨论不仅错误,而且非常奇怪。不过,它反映了当时许多医疗手法和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文献3

瘟疫传单

伊本·哈提玛

我们周围是用来呼吸的空气,空气的腐败常常是(瘟疫的)直接原因。腐败可以是部分或完全的。部分腐败是由于空气的全

部或部分次要特征发生了退化,比如因自然条件改变导致空气中(次要)特征数量的增减,或者像后文提到的那样,空气同异物发生混合,但(气)元素本身并未被改变或污染。

而完全腐败则是腐烂引起了(空气的)基本成分被破坏,导致空气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混合物。我们在后文会提到这是由哪些物质造成的。

如果你想知道两种腐败的区别,下面就是答案:

在第一种情况下,空气没有发生质变,所有基本成分都没有丢失,而是保持完整。它因为混合或接触而被污染,但其本质没有改变,否则就不再是“空气”了。举例来说,当空气与干热污秽的蒸汽混合后,蒸气改变了空气的次要特征,但没有使其腐败或者污染其气质元素,因为蒸气并未完全占有空气。但在第二种情况下,空气的部分或全部主要成分受到污染,所以它的本质完全改变了,不能再称为“空气”。有人把两者都称为空气,但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指的是各种成分的混合物,而第二种情况下只是比喻而已(因为其实它已不再是“空气”了)。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与干热毒雾混合后,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比例超过了正常物质,导致正常空气的成分被改变并腐败,于是正常空气变得像腐败毒雾一样,这就好比(加入其他物质后)气质元素就成了正常空气。在摆放着(失色)银器的老餐厅里,船上和井里的黑色泥垢中,动物死亡后臭味挥之不去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这些地方的空气发生腐败,性质完全改变,成了致命的毒雾。如果接触到这种毒雾并吸入它,人就会马上死亡。火焰被放到这种毒雾中会马上熄灭,但当把火焰放到它旁边时,毒雾对空气的腐蚀和污染能力就会达到最大。瘟疫过程中空气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古人宣称有数以千计的人因此死亡。牛群也无法幸免,因为空气的这种变化

对它们的体质危害特别大。有个可靠的人告诉我几个基督徒商人一事，他们刚从东方来到阿尔梅里亚。在土耳其海岸对面的某个湖中，水面上漂浮着大量腐烂的鱼，恶臭四下扩散。他们认为这些鱼死于雷击，但这完全是错的，雷电碰到水就会熄灭。即使我们假设雷电可以进入水中，它也只会杀死被击到的鱼，即使雷电非常频繁，它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大量的死亡。我认为，如果空气的腐败和变化会导致动物死亡，那么水体也可能因腐败和变化而导致水族死亡，因为水变成了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混合物。该现象常常发生在平缓、封闭的浅湖中。当瘟疫袭击此类湖泊时，下沉的腐败空气与湖面气流混合（腐败空气溶入水中）。（土耳其附近的）湖泊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你会说：“你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于空气和水变成了易腐物质。这与科学矛盾，四大元素^[3]只能部分地被破坏，这需要将（大量的）某种元素与另一元素混合，比如，气和水、水和土等等。但是，如果它们变成了其他东西，那就不再是纯净元素而是化合物了。根据这点，希波克拉底得出结论，人是四种体质的化合物。人不可能是单一体质或是由同一元素构成的。”我对此的回答是：

对我们有益而必需的空气并不是纯净的因素，它是由作为主体的气元素与水汽、来自土中的干燥的烟、微小的火的颗粒组成的化合物。我们所说的“空气”是由这些物质混合而成的。因此，腐败过程会不断减少作为主体的气元素的比例。对于纯净的气元素，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纯净状态下的气元素也许只存在于空气循环的大气层上方。

水的情况也一样，特别是平缓的浅水地带。暴风雨引起的气流进入水体后使其腐败。

来源：由帕特里克·甘(Patrick Gann)转译自塔哈·迪纳那(Taha Dinanah)的德译本《阿尔梅里亚的艾哈迈德·阿里·伊本·穆罕默德·阿里·哈提玛论瘟疫》“Die Schrift Ahmed ibn Ali ibn Mohammed ibn Ali Hatimah aus Almeriah über die Pest.”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19 (1927): pp. 34—38.

4. 法国的瘟疫预防建议(1348年)

1348年夏天，瘟疫快速逼近巴黎，法王腓力六世命令巴黎大学医学系撰写防病须知。人们根据早期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阿拉伯医生的著作拼凑出一份拉丁文学术报告，但与瘟疫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即使如此，它仍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并影响了未来几十年间无数瘟疫传单的作者。它认为瘟疫是由腐败空气引起的(见文献3)，腐败空气特别容易影响那些“体液平衡”过于湿热的人，这些观点是预防建议的基础。虽然它的建议和“科学”基础存在缺陷，但须知在病因和疗法间的关系上极具逻辑性。不幸的是，这种逻辑使得西方人直到一个世纪前才找到瘟疫真正的原因和疗法。

文献 4

《瘟疫须知》第二卷，巴黎大学医学系，1348年

第一章 空气的选择及净化

任何想在瘟疫中自保的人应尽可能选择未受腐败蒸气污染的清洁、纯净和干燥的空气。为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空气的选择，这与居住地相关；二是空气的净化，这同它的性质和成分相关。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遵循阿里(Halys)的建议，他

说：“人们应尽可能离开疫区。如果不能的话，也应避开带有腐败蒸汽的风，如选择空气不流通又不太潮湿的房子。”出于这些考虑，在这段黑暗又令人不安的时间里，低矮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必须选择远离沼泽、泥泞或者因死水和沟渠而发臭的地方作为居住地。北侧必须有窗，要时刻注意刮来的风是否经过疫区。南面的窗必须关紧，如果一定要打开，注意不能在日出前或者先要生火。窗户要用防水布封死，这样空气无法自由进入，除非那是正午时吹来的纯净北风，因为太阳的热力可以将其净化。我们不建议人们住进森林。离开森林，搬到更北面的地方，把房子南面封起来是更好的选择。

在净化空气时，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房间，点燃芳香的干木来去除空气中的不洁、臭味和污浊，最好用刺柏、岑树、葡萄藤、迷迭香、小橡树和荆棘。冬天特别适合这样做，富人可以用沉香木、琥珀和麝香；也可以用艾菊、苏合香、乳香、马郁兰、乳香胶、阿月浑子、柽柳或类似植物。

所以，到了冬天必须准备好这些植物，或者把它们混在一起，或者单独焚烧，火温不要太高，只要发出怡人香味就行了。熏香中还应使用香根莎草和柽柳，因为它们的酸性成分能更好地净化秽气。我们也可以制作烟熏锭剂，具体方法见最后一章。这种锭剂的使用时间是日出、日落和午夜，配合乳香或刺柏子使用效果会更好。此外，阿魏能防止空气腐败，除秽解毒。而另一种净化空气的办法是将新鲜枣子切碎投入火中，注意要把它们直接扔到灼热的煤块上直至完全烧焦。

夏天净化空气时则要用寒性材料，需要将玫瑰水或极冷的水与醋调和后用来为室内增湿。我们必须四处放置些绿色植物，或者柳条、玫瑰、水草、葡萄叶等茎叶及“寒性”花卉，或者别的芳香

植物,洒上玫瑰水和醋,或者准备一块浸过醋的海绵。

第二章 锻炼和沐浴

下面谈谈锻炼和沐浴。首先是锻炼,平时不锻炼的人不要在瘟疫期间开始锻炼。而对习惯锻炼的人来说,即使空气没有异状也应减少运动量,以免加大呼吸的需求。如果空气污浊有异,不要出门,只在房间或院子里略作锻炼。有人建议要做些锻炼,但瘟疫期间我们会有锻炼过度的风险。

再谈谈沐浴,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洗热水澡,因为这会使身体松弛而潮湿。体胖者更应该少洗热水澡。除非你有洗热水澡的习惯,或者体态丰盈紧实,那么在祛病时可以通过洗澡来润湿身体。^①

第三章 饮食

我们认为饮食不能过量,同时要避免湿性的东西,因为这会导致瘟疫。食物要清淡、易于消化又能补血,如用丰年收获的优质小麦做的面包,同时加入少量麸皮或大麦,经过一两天的充分发酵后精心烘焙而成。

肉类方面必须选择一岁大的羊羔、鲜嫩的小牛肉、山羊羔、兔子、童子鸡、母鸡、山鹑、山鸡、椋鸟、阉鸡等禽类,甚至像云雀和变色鸟(gamaleon)^[4]这样的小鸟。加工这些肉类应该用烤制而非水煮的方法。羊羔肉如果需要水煮的话,必须先盐渍一天。而且,水煮的肉类必须用生姜、丁香、荜澄茄、小豆蔻、肉豆蔻、豆蔻

^① 此处所引英译有误。法文原意应该是:“作者许可的情况是:或者有(洗热水澡)的习惯,但也应减少次数;或者身体肥胖,体液油腻而郁积,因此排毒前先洗澡能软化体液,有助于它们的排出。”(Si des auteurs le permettent, c'est à ceux qui y sont fort habitués, et encore plus rarement que de coutume, ou du moins à ceux dont le corps est replete, qui ont des humeurs grasses et compactes, et à qui le bain convient ordinairement avant la purgation, pour detremper en quelque sorte les humeurs, de maniere à favoriser leur expulsion.)——译者注

仁、豆蔻花或豆蔻壳,特别是藏红花和肉桂等香料调味,同时加入一些醋或酸果汁。

来源:埃米尔·勒布伊(Emile Rebois)《瘟疫的历史和批判研究》*Etud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sur la peste* (Paris: Picard, 1888), pp. 95—105. 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译。

5. 15世纪一位英国诗人对预防黑死病的建议

约翰·里德盖特(约1370—1450)年轻时就加入了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Bury St. Edmunds),从此一直过着修士的生活。今天他被看作一位多产的诗人,是乔叟和莎士比亚之间英国文坛的重要人物。他有15万行作品留存下来,以各种诗歌体裁涉及了众多主题。他最有名的保护人是格罗斯特公爵亨弗里(Humphrey, Duke of Gloucester),后者拥有一所大型图书馆,是当时许多作家和学者的支柱。在这首未具日期的长诗的第十五段,里德盖特建议不要让“你的宫廷出现分歧”,这暗示了此诗可能是为亨弗里所写,或者至少是为某个贵族和他的家人所写。诗中推荐的许多食物和草药,包括“黄金饮料”,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除了所谓的《卡奴图斯瘟疫论文》(Canutus Plague Treatise)^[5]外,14或15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任何瘟疫防治规范,无论是拉丁语还是方言的。因此,作为以方言诗歌形式写成的医学建议,里德盖特的这首中古英语作品显得尤为珍贵。与巴黎的《概要》等作品类似,此诗以“无论谁想要”的第三人称形式开头并概述了所提建议,全诗其他部分则采用第二人称。在

“结语”处，他又回到第三人称作了总结。

文献 5

《瘟疫期间的饮食和注意事项》

约翰·里德盖特，15世纪

无论谁想免罹疾病，身体健康，
抵挡瘟疫的魔杖，
都应保持欢乐，远离悲伤；
避开坏空气，不要涉足
被感染的危险地方。
健康饮食，吐纳芬芳，
为了自己的安康，
避开黑雾，在空气清新时徜徉。

空腹时不要出行，
早起时勿忘生火，
多流连花园的芬芳，
但要注意保暖添衣。
避免一切纵欲，
特别是柳巷和浴场：
体液的交换危害巨大。
出行时注意避开黑雾，选择清新空气。

切勿贪恋肉食，
也要戒食水果，
选择鲜嫩母鸡和小鸡，

配上酱料，不要吝惜
酸果汁和醋，多多加入
有益的香料。谚语说，
晨眠好比黄金，
它帮助你抵抗黑雾。

饮食

为了你身体安康，保护头部勿要着凉，
谨记不要生食，
选用健康的酒类和白面包。
不要吃到十分饱。
远离淫荡的老女人。
若要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
睡前勿饮酒
晚餐勿太迟。

选择优质面包，
用上好面粉拌匀，
放置一天半，滋味大不同。
避免过度体力劳动
平静地徜徉于花园，
享受舒心的芬芳。
体温反复过高让人疲倦，
谨记勿在中午入眠。

谨遵医嘱，饮料中要加入

鼠尾草和芸香，还有玫瑰水，
它们有益健康。
希波克拉底说过，
美酒对人人有益，
注意适量，还要加上
各地推崇的
滋味浓烈、清新和寒性的草药。

总而言之，为了健康，需要：
谨记避免过度劳累和体温过高，
不要饕餮和贪杯，
避免晚餐太晚。
哈欠、颤搐和瞌睡，
打鼾、发困和疲劳告诉你，
上床时间已来到。

无论青年和老人，
肚子太饱麻烦多，
腹中疼痛，咕隆作响要起夜。
少吃晚餐让人早起精神爽。
保持体力有三妙方：
心情愉悦无牵挂，
饮食节制，远离烦恼最重要。

葛缕子是味良药，请餐前服用，
配上酒神花园里藤蔓的精华，

调和之后有益心脏。
黄金酒善治发热受寒，
如果穷人负担不起，
一碗稀粥也能止吐和退烧。

晚餐吃得太多或饮酒时间太晚
会使体内产生过多粘液，
胆汁使胃部不适，
忧郁挥之不去，切忌！
所有不适都源于过量或不足，
缺乏自控，不懂调节
让人偏离平衡，走向极端。
谨记要适度。

也就是说，如果为了极端的快乐
你放纵欲望超过自然的胃口，
让你的消化系统
处于超负荷的危险中，
你要当心发热受寒，无名肿痛。

饮食适度是最好的医生，
他让你消化平衡，远离病痛。
于是我们得出适时的结论：
饮食适度，利于消化，
在恰当时候入眠好比黄金，
饮食不要违反自然的季节规律，

按照个人的体液特点——
粘液质、抑郁质、多血质和胆汁质
理性地选择食物，
这样就能避免不受控制的病痛。

如果水蛭没有效用，
请谨记下面的三条建议：
饮食适度，避免过劳，
面对逆境也不要抑郁。
接受挫折，安于清贫，
不要攀比，温饱足矣。
切勿抱怨，乐于现状。
如果药石无效，就试试这些。

凡事不要轻信，
不要操之过急，不要骤起报复之心，
不要侮辱穷人。
谈吐彬彬有礼，饮食节制，
不要贪恋桌上的各色食物，
注意用餐举止，保持心思缜密，
不要失言或欺骗，
永远努力赞美他人。

鄙视两面三刀的家伙，
餐桌上勿道他人短长，
避开用谣言和恭维

制造麻烦的人。

不要让你的宫廷出现分歧，

那会给你家庭带来麻烦。

尊重关系你福祉、财富和运势的一切，

勿生事端，与邻人和平相处。

衣着整洁，符合你的身份，

不要超过你的限度，要恪守诺言，

特别避免和三类人发生不睦：

首先，不要和强过你的人竞争，

不要挑衅和你一样的人，

和低于你的人争斗是耻辱的。

因此，我建议你

终生与人为善，博取个好名声。

早晨和晚间在窗前生火

有助于驱散黑雾和瘴气，

但按时参加弥撒效果更佳，

早上起床时向上帝致敬，

殷勤地关爱穷人，

怜悯和同情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上帝就会赐你仁慈和福祉，

提升^[6]你的地位和财富。

晚间勿在家中纵欲，

晚餐适量，不要太晚。

打瞌睡，秉烛熬夜，
早晨赖床，昏昏沉沉，
它们为一切恶行打开大门。
避开醉酒的说谎者和好色徒，
赶走赌徒和下注者，
他们就像轻浮的女子。

谨记饭后不要马上人眠，
勿使头、脚和胃部受寒。
不要思虑过多，不要烦恼，
按照你的地位维持家庭。
必要时忍受痛苦，坚持真理勇于担当。
遵守誓言，不要欺骗。
声色只属于年轻时，年长后要冷静节制。
世俗欢愉是过眼云烟。

早晨感到饥饿后才能进食，
清新空气和漫步有助消化。
不要在餐间饮酒为乐，
除非工作辛苦或确有需要。
食物太咸让虚弱的胃无法承受，
特别是当人们无法抗拒
与他们体质不符的食物。
贪吃的嘴常带给胃巨大的痛苦。

因此，关爱灵魂和身体的人

要谨记两件事：

纵欲伤身，

适度饮食带来健康，

而慈善是灵魂的香膏。

这份配方既非来自药剂师，

也非出自安东尼和休两位大师，

但它是最珍贵的药方，而且对所有人免费。

来源：约翰·里德盖特《关于瘟疫的饮食和注意事项》“A Diet and Doctrine for Pestilence,” in *The Minor Poems of John Lydgate*, vol. 2, ed. Henry Noble McCracken (London: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934), pp. 702—7. 玛格丽特·蒙特维尔德(Margaret Monteverde)译。

6. 瘟疫的医学体征(约 1447 年)

到了 15 世纪中叶, 区别瘟疫和其他疾病的体征或症状不仅对病人十分重要, 对社区更是如此。如果病例没有被确诊, 社区就会缺乏准备, 而错误的阳性诊断则会带来恐慌、逃亡和不必要的公共措施。米凯莱·萨沃纳罗拉(Michele Savonarola)于 1385 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帕多瓦, 他在那里学习和行医, 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的著述既有关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 也有关于医学的。1441 年, 萨沃纳罗拉应招成为费拉拉的埃斯特宫廷的一位医生, 他死于 1462 年或 1468 年。在这份方言写成的医学须知中, 萨沃纳罗拉称阿维森纳为大师(il Principo), 并把他的理论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

他以发热这一体征开头,然后简要描述了哪些症状表示病人会康复,哪些表示可能很快死亡。

文献 6

《关于意大利瘟疫的论文》:第二章(约 1447 年)

米凯莱·萨沃纳罗拉

简单说来,瘟疫引起的发热有如下症状:

首先,摸上去并不烫手,但病人感觉非常难受,特别是在左侧,他们因此极为痛苦,而旁人却很难理解为什么低烧会引起那么大的痛苦。大师说过,有时候医生和病人都不会把这种低烧看成大问题,脉搏和尿液看上去都没有变化,病人最终却死亡了。所以,对瘟疫热,医生们仍然有许多疑问。当这种症状出现时,病人会显得非常虚弱,四肢无力,这发生在第一天或第二天,他不明原因地感到极度虚弱。同时还会伴有其他症状:如面貌的改变;舌头枯干发黑;病人呕吐、汗液混浊、气喘且口臭;皮肤上出现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斑点;脓疱出现后又突然消失,因为一直有脓液流出。病人头痛、喘不过气来、突然失去胃口;患者无法入眠;出现大的肿块;病人看上去呆滞无神。有时会出现类似水肿的体内衰竭,或者像大师所说的,瘟热会使疑病者更加紧张。在疾病的早期,有时会有胆汁排出,脉搏常常快而弱,但在夜里会变强。

我们不能过于相信尿液。大师说瘟疫患者的尿液经常没有问题,成分、颜色和沉淀物正常,但病人还是死亡了。因此,尿液的“形态”很容易造成误导。不过据记载,有时候尿液显得稀薄,说明它的成分不正常;有时候颜色发生显著改变,而且通常发浑,俗称“马尿”(subiugale)。尿液稀薄、恶臭并带泡沫。如果在这些症状外还出现肿块和痈,那么就能确诊了。所有上述症状都需要

自行判别,限于篇幅我就先不详述了。

以上就是瘟疫热的特有症状,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哪些体征表示发热已经结束了,医生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果情况危急,他们可以安慰病人的朋友,让家属安排忏悔,订立遗嘱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发热结束时病势已经很沉重,医生也束手无策。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病人最好忏悔并准备后事。

如果出现了好的迹象,如退烧和症状缓解,在发病几天后胃口恢复,或者四肢恢复了些气力,精神好转而且神智正常,那么就有希望完全康复,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如果病人脸上出现死亡的迹象,比如面色憔悴,肤色发褐而且脸上出现渐渐变成绿色的斑点,那么他很可能离死不远了。同样,发病早期出现的流汗、呕吐、排尿等身体脱水也是致命的症状。尿液浓稠、浑浊,没有沉淀物是很糟糕的现象。尿液稀薄,久置而不沉淀,并且发臭,呈黑色或青黑色是致命的症状。同样的,如果发病初期的排泄物呈多种颜色且恶臭,或呈胆汁状,那么病人也无法康复。排泄物油腻、发臭,表面略微发绿也是致命的。发病早期出现汗液发臭是不好的现象。呕吐物腥臭,呈韭菜叶的绿色,或者像枝头的花^[7]一样红中带黑也是致命的。有时出现脓疱,但会逐渐减退。持续头痛并伴有体力衰退,原先的症状有所缓解但出现新的不好的现象,这都是致命的。(如果出血发生在第七天而非第四天,且症状没有缓解,那将是致命的。)伴随体力衰退出现的脉搏变化也非常不好。我希望这些(观察)已经足够了。

来源:米凯莱·萨沃纳罗拉的《方言瘟疫论文》*Il trattato in volgare della peste*,贝洛尼(L. Belloni)编译。(Rome: For the

Societa Italiana di medicina interna, 1953.)

7. 瘟疫期间遗嘱的订立：意大利普拉多（1348年）

历史学家塞缪尔·科恩认为，14世纪60年代前，意大利人在遗嘱中通常把财产分散给许多人，但1363年后他们只选择几个受赠者，以便被人铭记。在许多方面，马可的遗嘱都是很典型的。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子女，如果他们没有在瘟疫中死去就将平分遗产。他留给了10所教堂、修道院或世俗兄弟会各自1里拉或10个索尔多（1里拉合20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以救赎自己的灵魂。他的妻子被要求抚养孩子，继续酒店生意，并不得改嫁。如果他的子女全部死亡，那么普拉托的主教堂将成为其财产的主要继承人，他留给圣斯特法诺教堂内的礼拜堂的金额将从半里拉增加到25里拉。在后来经过修改的遗嘱中，我们看到瓦娜、诺夫里奥和达蒂尼怀孕的妻子维尔米利亚都先于他去世了。斯特法诺和弗朗切斯科活了下来，后者以区区50个弗洛林起家，最终成为富商和城里最有名的人。

文献 7

普拉托的马可·达蒂尼的遗嘱，1348年6月1日

以上帝的名义。

已故达蒂诺的儿子，弗维亚门（Porta Fvia，街区名）的马可，因为基督的仁慈而身心安康，希望口述对财产的安排，藉由他人之手写下此遗嘱。

首先，他选择并希望死后被埋在普拉托的圣弗朗切斯科

教堂。

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的圣斯特法诺大教堂的神父 1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为该教堂内新建的贞女玛利亚腰带礼拜堂的祭坛奉上 20 个索尔多。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弗维亚门的圣皮埃罗教堂 1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该教堂的贞女玛利亚兄弟会 20 个索尔多。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圣方济各会修道院 2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圣弗朗切斯科教堂的贞女玛利亚兄弟会 10 个索尔多。

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10 个索尔多。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圣奥古斯丁会修道院 1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此外,他留给普拉多加尔默罗会的圣母修道院 1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此外,他留给普拉托的圣母修会 10 个索尔多,用于举行弥撒。

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为坐落于比森奇奥河(Bisenzio)对岸的圣安娜教堂内的圣母祭坛奉上 10 个索尔多,用于祭坛的装饰。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圣约翰兄弟会 10 个索尔多。此外,为了自己的灵魂,他留给普拉托甜蜜济贫院和那里的穷人 20 个索尔多。

此外,他要求、希望和命令,上述遗赠将由下面列出的他的继承人及其监护人在他死亡之日起 3 年内执行。遗嘱人还要求和希望将他所有的货物用于偿还其不当所得,非法交易或截留款项。

对于其他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现在和将来的权利和义务,他指定自己的孩子弗朗切斯科、诺夫里奥、斯特法诺和瓦娜,

以及怀孕的妻子维尔米利亚将来生下的儿子或女儿为继承人。如果任何一个孩子在 18 岁前死亡,且没有合法的婚生子,那么其他继承人将获得死者的那部分遗产,就像未成年人的信托金规定的那样。

此外,只要妻子维尔米利亚贞洁而体面地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守寡且恪守妇道,并不索回嫁妆,那么她就能一直掌握和使用他的财产。

如果上述继承人未成年就全部死亡,那么财产将由他(马可)的兄弟,已故达蒂诺的儿子安吉洛·达蒂尼继承。此外,如果发生那种情况^[8],他的房屋、仆人以及商铺(按照法律规定描述了其所在地)的使用权全归妻子(维尔米利亚),包括床、家用物品以及房屋内的一切,还有商铺。条件是她要恪守妇道,为自己守寡。

此外,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灵魂,他就留给位于普拉托圣斯特法诺大教堂的新建的贞女玛利亚腰带礼拜堂 25 个里拉。此外,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他就每年留给贝蒂诺·贝蒂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姐姐卡特里娜 12 袋无杂质的优质谷物,只要她依然守寡并且没有嫁妆。

遗嘱人指定巴萨洛内·迪·古奇奥先生、安吉洛·达蒂尼,皮埃罗·迪·吉恩塔和自己的妻子,弗维亚门的维尔米利亚为孩子的监护人,授权他们管理日常经营和收支记录。

所有上述行为是在普拉托弗维亚门的慈悲济贫院进行的。

(8 位证人的名单)

我是普拉托的雷纳尔多·迪·班杜奇奥,受皇家法官和公证处的委派,见证了上述事件并将其公开记录。

来源:《马可·达蒂尼的遗嘱》“Il Testamento di Marco Dati ni.”选自 *Archivio Storico Pratese* (April 1925): pp. 74—78. 恩里科·本萨编译。

8. 黑死病动摇了伊斯兰世界: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景象(1348年)

这首诗(译文为散体)的作者是叙利亚著名的穆斯林地理学家阿布·哈弗斯·乌马尔·伊本·阿尔-瓦尔迪(Abu Hafs Umar ibn al-Wardi)。它以向真主祈祷的形式,在不长的篇幅内包含了丰富的关于黑死病的见闻,如瘟疫的传播、对真主虔诚的祈祷、对毒气理论和医疗的驳斥、患病信徒成为殉道者、瘟疫的各种比喻,以及听天由命者的行为。伊本·阿尔-瓦尔迪无意中描绘了一幅正面景象:面对黑死病,人们和解、忏悔,奴隶也获得解放。1349年3月18日,伊本·阿尔-瓦尔迪在完成这首诗后不久也死于瘟疫。他的作品是唯一对叙利亚第一次瘟疫大爆发的详细描述,被后世许多阿拉伯历史学家所引用。

文献 8

《关于瘟疫的报道》(Risalah al-Naba An al-Waba)

阿布·哈弗斯·乌马尔·伊本·阿尔-瓦尔迪(1348年)

真主在各种逆境中保佑我。我的福祉只归于真主。难道真主不能保护他奴仆吗?啊,真主,为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祈祷,赐他安息。看在他的分上,救我们脱离瘟疫,赐给我们庇护。

瘟疫带来恐怖和杀戮。它来自黑暗之国。啊,它是个什么样的游客啊,15年了还不离开。中国也无法幸免于难,最坚固的城

堡也挡不住它。瘟疫侵袭了印度的印度人，把信德地区(Sind，位于今巴基斯坦南部)压弯了腰，甚至还出手抓住了乌兹别克地区。在河中地区(Transoxian，指锡尔河、阿姆河和泽拉夫尚河流域)，它折断了多少人的腰！然后它越发强大，继续传播。它袭击波斯，脚步迈向契丹之国，还对着克里米亚露出利齿。它把烧红的煤投向鲁姆(Rûm，今安纳托利亚)，肆虐了塞浦路斯和附近的岛屿。瘟疫摧毁了开罗，目光牢牢盯住埃及，那里的人夜不能寐。它停止了亚历山大的一切活动。瘟疫就像蚕，它吞噬了织坊(tiraz)的美，让织工接受命运的安排。啊，亚历山大，这场瘟疫就像狮子，它向你探出巨爪。默默接受瘟疫的命运吧，70人中只有7个能幸免。

然后，瘟疫转向上埃及。它还把风暴刮到拜尔盖(Barqah，位于利比亚东部)。然后袭击了加沙，还让亚实基伦(Asqalan，以色列南部港口)摇摇欲坠。瘟疫压垮了阿卡(Acre，以色列北部港口)。然后鞭子落到耶路撒冷，并(以人的生命)征收了天课(Zakât)^①。它从岩石清真寺追到阿克萨清真寺，如果不是真主慈悲之门及时打开的话，所有逃难者都完了。然后，它加快步伐袭击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平原。瘟疫控制了西顿(Sidon，黎巴嫩西南部港口)，出人意料地偷偷降临贝鲁特。接下去，它的弓箭瞄准了大马士革。瘟疫就像国王一样统治着那里，它肆意行使权力，大行杀戮，每天要杀死1 000个甚至更多的人。它用脓疮摧毁了人类。愿至高的真主宽恕大马士革，熄灭瘟疫的火焰，教它不要靠近她芬芳的果园。啊，真主，拯救大马士革吧，保护她免受袭击。城里士气低落，为了一粒谷物，人们愿意出卖自己。瘟疫

^① 伊斯兰法律规定，穆斯林要捐出一部分财产帮助穷苦人。——译者注

袭击了阿尔-马萨(al-Mazzah,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地中海沿岸),还出现在拜尔萨(Barzah,位于沙特西部)。然后,瘟疫来到了巴勒贝克(Ba'labakk,位于贝鲁特东北),把自己和那座城市合为一体,因为它把名字留在了那里。在卡拉(Qara,阿曼的一个部落),它背诵起“停下吧,朋友们! 让我们哭泣”。^①瘟疫血洗了阿尔-伽苏拉(al-Ghasulah,位于沙特麦加省)。它让谢姆辛(Shemsin,位于约旦)暗无天日,使瘟疫之雨降临阿尔-朱巴(al-Jubbah,沙特古城,距利雅得北部350公里)。阿尔-萨巴达尼(al-Zabada-ni,位于叙利亚西南部)被棺椁淹没,瘟疫还把不幸带到希姆斯(Hims,即霍姆斯,位于叙利亚西部),离开时带走了1/3的人。它在哈马(Hamah,位于叙利亚西部,距霍姆斯不远)定居下来,阿西河(Asi,流经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两岸因为瘟疫的热度而冷寂。

啊,瘟疫,你不该向哈马呼出致命的毒气,这最肥沃的土地和最雄伟的城堡,你不该将它亲吻和拥抱。瘟疫又进入了马拉-阿尔努曼(Ma'arrah al-Nu'man,叙利亚西北部城市)并对它说:“我不会伤害你。哈马已替你承担了足够折磨。我已心满意足。”如同一只充满黑暗的眼睛,它凝视着马拉城,眉头写满威胁。在这个每天被瘟疫暴政统治的国度,它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瘟疫带着毒液来到萨尔明(Sarmin,位于叙利亚西北部),它诅咒逊尼派和什叶派,像军队般把磨尖的矛头刺向前者,把后者的土地化作废墟。它光顾了安条克,但又匆匆离去,仿佛负心汉羞见旧日情人。接下去,它对沙伊萨(Shayzar,叙利亚古代要塞)和阿尔-哈里姆(al-Harim,位于叙利亚西北部)说:“别怕。请忽

^① 6世纪阿拉伯诗人伊姆鲁·阿尔-卡伊斯(Imru' al-Qais)的名句。——译者注

视我，无论我是否来过，你们都一样贫穷。瘟疫过后，废墟终将被重建。”然后，瘟疫征服了阿萨斯(Azaz,位于阿勒颇西北)，并夺走了阿尔-巴布(al-Bab,位于阿勒颇东北)全部有学问的人。它洗劫了特尔-巴沙尔(Tel Bashar,阿勒颇北部的一座城堡)。瘟疫降服了杜鲁尔(Dhulul,西奈半岛东部亚喀巴湾附近的一条山脉)，然后径直穿过低地和山区。许多人被它从家中卷走。

然后，瘟疫瞄准了阿勒颇，但没有成功。感谢真主的仁慈，它带来的灾难只是最轻的。我希望这不是更大灾难的开始。瘟疫曾降临过阿勒颇并取得胜利。他们说，它发动了对人类的攻击。我称其为瘟灾。

它挨家挨户地搜寻生命，令人多么吃惊！只要有一个人吐血，全家都将死亡。不消两三夜，它就把一家人都送进坟墓。我请求造物主在瘟疫降临时赶走它。尝了自己的血注定会死。

啊，真主，瘟疫执行的是您的命令。救我们脱离灾难。只要您愿意，瘟疫就会离我们远去。除了全能的您，还有谁能保护我们免受这恐怖？瘟疫像军队，甚至疯子般抓住和侵入我们平静的生活，但真主要比它更加强大。它磨好了长矛，对准每一座城市，我吃惊地望着可怕的矛尖。

瘟疫已经到过多少地方？不带走房子里所有的居民，它发誓绝不离开那里。它点着灯把他们一一搜出。瘟疫在阿勒颇也引起同样的恐慌，它派出毒蛇四处活动。它被称为“安撒布的瘟疫”(Ansab)，是伊斯兰纪年以来的第6次瘟疫。我认为这就是先知(我们为他做最虔诚的祈祷，愿他安息)预言的死亡。阿勒颇成了痛苦之地，愿真主救我们脱离灾难。瘟疫变成一条蛇，这邪恶的生物吐出毒液就能杀人。

啊，阿勒颇的贵族们正研究高深莫测的医术呢！按照医嘱，

他们吃干燥和酸味的食物。影响人体健康的肿块被抹上亚美尼亞的黏土。人人调理体液,让生活更加舒适。他们用龙涎香、樟脑、柏树和檀香熏蒸房间,戴上红宝石戒指,在日常食物中加入洋葱、醋和沙丁鱼。他们减少食用肉汤和水果,但吃香橼之类的东西。如果你看见许多棺木和抬棺人,或者听见阿勒颇到处传来死亡的消息和哀号,赶紧躲开,不要和他们接触。在阿勒颇,抬棺人的收入大大增加。啊,真主,不要让他们获益。流着汗的抬棺人喜欢瘟疫时节。啊,真主,不要让他们喜悦。他们玩乐着,当有买卖上门时也不着急。在我眼中,灰色的阿勒颇因为焦虑和欺骗变成了黑色。抬棺人自己的儿子也将被死神带走。

祈求真主宽恕我们灵魂的罪恶,瘟疫必定是您的一种惩罚。您的喜悦救我们脱离您的愤怒,您的宽容救我们脱离您的惩罚。有人说:死亡是因为空气的腐败。我说:死亡是因为迷恋于堕落。哀号者让我们想起多少罪和冒犯?……对穆斯林来说,瘟疫是奖赏和殉道的机会;而对不信道者,它是惩罚和谴责。当穆斯林忍受不幸时,耐心将是他的祈祷。我们的先知(愿真主祝福他,让他安息)说过:死于瘟疫的人是殉道者。这高尚的传统是真的,它确保他们成为殉道者。信仰正道者会因这个秘密而喜悦。如果有人认为瘟疫带来的是感染和毁灭,我会告诉他:真主创造一切,还将重建一切。如果撒谎者提出异议并想要另寻解释,我会告诉他,先知(愿他安息)说过:谁感染了第一头?^① 虽然瘟疫给人类带来灾难,但它是真主的意志。永远都是这样。

① 一个贝都因人问穆罕默德,为什么和生病的骆驼放在一起,健康的骆驼也会生病。先知反问:“谁感染了第一头?”穆罕默德的意思是,既然第一头骆驼生病是真主的意志,那么所有的骆驼都是因为真主的意志而生病。见阿尔-哈佳吉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卷。——译者注

我寻求真主的庇护以躲避瘟疫的枷锁,它的剧烈爆发波及各地,引发了许多奇事。它的突然来袭让人们不知所措。瘟疫毫不留情地追杀尖叫着的人,无视他们献上的赎金。它的铁蹄遍及四海。瘟疫闯入屋中,不带走里面所有的人绝不出来。“法官命令我逮捕这里所有的人。”这个命令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夺走了人们的希望,改善了他们在尘世的行为。有的祈求邻居照顾自己的子女,有的向邻居告别,有的完成未尽的工作,有的准备裹尸布,有的与敌人和解,有的善待朋友。这位变得慷慨万分,那位与背叛过自己的人重归于好。这位捐出家产,那位遣走奴仆。这位改变了性格,那位纠正了行为。因为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瘟疫,等待着最后毁灭的来临。除了仁慈的真主没有人能拯救他们,赞美真主吧。

除了对高尚传统的虔诚,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瘟疫面前逃亡。来吧,让我们祈求全能的真主结束这场瘟疫,因为他是最好的帮手。啊,真主,我们比从前更加虔诚地呼唤您,请求您结束瘟疫。您是我们在瘟疫面前唯一的庇护。我们不凭借身体,而是凭借您抵挡瘟疫。啊,创世之主,求您救我们脱离这棒击。我们的罪甚于沙石之数,但您的仁慈更加宽广。以最可敬的辩护者,仁慈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名义,我们请求您结束这场灾难。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和折磨。因为您是我们唯一的支柱,寄托着全部的信任!

来源: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W. Dols)《关于瘟疫的报道》(Risalah al-Naba An al-Waba),选自 Dickran Kouymjian 所编的《近东的货币学、图像学、铭文学和历史》in *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ed. Dickran Kouymjian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74),

pp. 443—55.

9. 瘟疫和人类的堕落：叙利亚穆斯林的观点（14世纪90年代）

瘟疫及其余波带来了道德的堕落，不仅基督徒看到了这一点，穆斯林也认为人类已从过去善的状态上跌落下来。灾难没有让人变得更好，反而降低了人性和对宗教的虔诚。下面的长诗选自穆罕默德·伊本·萨斯拉（Muhammad ibn Sasra）的《大马士革编年史》，该诗的匿名作者慨叹到，与其生活在当时无耻的腐败和堕落中，还不如死于瘟疫。在经受多次瘟疫袭击后，叙利亚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又遭遇了政治和经济的解体。伊本·萨斯拉在介绍此诗时说：“百业荒废，统治者心肠变硬，富人鄙视乞丐，生灵涂炭，苦难丛生。”

文献 9

匿名诗歌，选自《大马士革编年史：1389—1397》，由穆罕默德·伊本·萨斯拉记录

如果谁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善，告诉他：

“切勿接近那些人，以免受伤和失望。”

真主啊，我们生活在奇迹的年代，如果
这是个梦，一定把我们吓得不轻。

在这里，我们堕入了最坏的状态，
死亡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这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奇迹和异事，
有些让人瞠目结舌。

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有信仰，如果你

侥幸不死，也将永无宁日。
真主啊，寻找善只会让人失望。
见证了堕落者的名利双收，
理智对我们何用。
在这最坏的时代，
我们羡慕先逝者。
我们看到了见所未见，
听到了闻所未闻。
死者在死亡中得到救赎，
活人反被痛苦折磨。
把昨天的人带到今天，
或者让我们回到昨天吧！
过去的人纯净如水，
这是我们从小看到的。
把痛苦留给我们，他们
飘然而去，为何抛下我们！
真主偏爱人类过去的
幸福时光，我们也是。

来源：穆罕默德·伊本·萨斯拉的《大马士革编年史：1389—1397》，第二卷。由威廉·布里纳（William M. Brinner）编译。（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 218.

10. 15世纪早期的一首英语诗歌对死亡的思考

14和15世纪，活人与死人相遇的可怕场景成了常见的

文学和艺术主题。不过下面这首匿名的中古英语长诗另辟蹊径,以尸体与吞食尸体的蛆虫间的对话作为形式。在该诗原稿的页面上端绘有腐尸墓(transi tomb)的图像,也许那就是诗人的灵感来源。14世纪90年代,法国开始在墓饰上表现尸体腐烂和成为蛆虫食物的情景,15世纪初英格兰也出现了这种做法。除了引出主题的部分之外,该诗开篇处的抑扬格五音步墓志铭很可能真的来自某座腐尸墓。类似《死亡之舞》或者《活人遇见死人》中的艺术和诗性的处理,该诗传递的信息显然是:忏悔并过好现在的生活,对可怕的坟墓那边不要抱任何希望。

文献 10

《尸体和蛆虫的争论》

匿名

墓志铭

仔细看我上面的样子,
看曾经锦衣玉食的我
如何被蛆虫吞噬和腐朽,成为
恶臭的泥土,刺鼻的粘液和烂泥。
所以,好好听听下面的争论,
明智地把它写进你高贵的心里
这样你就能长点见识,
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未来又会变得怎样。
当你全无准备,死神已然将你征服,
当你坟头葱茏,正好来把死神踌躇。

尸体和蛆虫的争论

死神带着各种疾病横行，
瘟疫牢牢统治整个国家，
良知驱使我踏上朝觐之旅，
我打定主意，行色匆匆。
某个神圣的日子里，面前出现一座教堂，
我开始拨动手中的念珠。

它孤零零矗立在美好的土地上，
我想听弥撒，但迟来一步。
见门开着，我走进去
双膝跪下开始祈祷。
带着虔诚崇敬，
我面对圣像拜伏在地。

旁边有座高贵的墓龛，
通体精雕细绘，
还有各种新刻的纹章。
我急忙去看墓志铭，
却见镀金的铜墓门透出光芒，
有位优雅贵妇呈现在我面前。

她的衣着华贵而新潮。
我久久凝视，
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迷迷糊糊，仿佛走出了自己的身体，

我听见尸体和蛆虫的奇特争论，
它们有问有答，仿佛对话，
请仔细听好了，就像这样。

尸体对蛆虫说：
“蛆虫，蛆虫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们为什么要吃我？
你们让我的肉体千疮百孔，
它曾经却是高雅而诱人，
怡人而香甜，
我保证，在所有被称为贵妇的生物中
它得到的爱最多。

我曾是个罕见的美人，
血统高贵，夏娃的真正后裔。
从小丰衣足食，
所有的心都喜欢与我相伴。
我曾经婉拒许多荣耀和伟大的人物，
现在我已入土，死神让我和你们蛆虫呆在一起，
一丝不挂委身地下。

你们是最不厚道的邻居，
好像永远饥肠辘辘，
时而争吵，时而大嚼，把我全身搜遍，
贪婪的胃口永不知足。
从不休息，你们总是吸吮和咬噬，

没有一刻懂得节制，
随时准备着再次施暴。

当你们开始侵入我的身体，
我以为是因为饥肠辘辘，
可是你们现在已经脑满肠肥，
出于礼貌和绅士风度，请高抬贵手，
到别人身上安家，
寻找更加丰盛的大餐，
因为我已经几乎空空如也，消耗殆尽。”

蛆虫对尸体说：
“不，不！我们还不想离开你，
只要你还有两根骨头连在一起，
我们就要把它们擦亮磨光，
竭尽全力把它们之间的一切清理干净。
我们从不为自己的劳作索取报酬，
无论金银还是其他，
我们蛆虫只想以你为食。

我们无法品尝你的滋味和气息，
你的肉体正可怕地腐烂和发臭，
令所有生物敬而远之，
只有我们蛆虫除外。
如果我们和兽类一样，能够闻香和尝味，
你认为我们还会公然亲近你的腐肉吗？

不,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躲得很远。”

尸体对蛆虫说:

“你们真是对我不敬,
如此威胁和恐吓于我。
想要把我变成一堆枯骨。

啊,骑士们,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

还有你们这些得体的绅士,无论出身是否高贵,
都曾乐于为我效劳,
发誓你们的心一生一世都属于我

你们的生命随时听我调遣,
快来帮助和保护我。
这些可怖的巨虫,模样丑陋,
无情地大啖我的肉体,
你们看,它们正啃噬和吞食着我,
那个你们曾经全心全意爱着的我。
快来帮我,保护我的身体!”

蛆虫们回答说:

“他们能做什么?让他们来吧,
我们不怕他们,更不怕他们的抱怨,
那些在你之前就已死去的大人物
我们曾和它们激烈争辩
把他们一点点肢解,
那些皇帝,国王和征服者,

所有世俗和宗教的主宰，
 那九个伟人：
 犹大·马卡比，尤里乌斯·恺撒
 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logne)^①，
 亚历山大，大卫，
 赫克托耳和亚瑟，
 查理大王和统帅约书亚公爵，
 以及所有最高贵的特洛伊骑士们。
 还有美貌的海伦，
 波吕克赛娜(Polyxene)，鲁克莱西娅(Lucretia)和迦太基的
 狄多(Dido)^②。

她们和你一样美貌。
 但一旦被我们抓住，
 谁也不敢挪动分毫。
 因为一切有毒生物，
 都受命参加这项工作。
 它们和我们一起，
 将把你完全吞噬和摧毁。

鸡头蛇，王蜥和妖龙

^① 布永的戈弗雷是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德意志贵族，1099年建立耶路撒冷王国，自称圣墓守护者。——译者注

^② 波吕克赛娜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小女儿；鲁克莱西娅是克拉提努斯之妻，因被罗马末代国王塔提尼乌斯之子强暴而自杀；狄多是迦太基女王，因埃涅阿斯拒绝与自己结合而自杀。她们和上文的海伦都是传说中的美女。——译者注

蜥蜴,玳瑁和环蛇
蟾蜍,鼴鼠和蝎子
蝰蛇,毒蛇和蝮蛇
蛤蟆,蚂蚁和尺蠖
蜘蛛,蛆虫,自然界的黑暗之物,
水蛭还有其他类似生物。”

尸体对蛆虫说:
“我无能为力,
既无援手也不能脱逃,
只好任由它们摆布。
被它们啃个精光,注定悲惨的命运,
因为它们痛恨一切生命,
我只能任由摆布,
即使它们把我摧毁,也只能听天由命。”

蛆虫回答说:
“你出生那天,我们就派去信使,
我们下达命令,
它们必须遵守,不得违背。
直到你死,都不得离开你,
我们希望它们啃噬和骚扰你,
最后和你一起来到我们的王国,
它们的回报就是你的肉体。

只要它们恪尽职守,

你就只能接受命运。
 它们有的去了你的子宫和胃，
 虱子一直住在你的头发上，
 蛆虫住在你的手上，跳蚤躺在你的床上，
 我告诉你，还有其他各种毒物，
 它们把你装扮好送给我们。”

尸体回答说：
 “现在我终于认出你们的信使！
 活着时它们和我住在一起，
 我不再争辩这事
 而是默默忍受你们对我的暴力，
 随你所愿对我下手，一切凭你。
 但在《诗篇》中，大卫说，
 ‘一切都要听从人的召唤。’”

蛆虫回答说：
 “只有活着时，人才有那种能力，
 只有在那不幸的世界上它们才是你的。
 既然生命已经离你而去，你再也无力反抗。
 你如同泥土，由存在变成虚无。
 在四旬斋和圣灰星期三，
 当教士用圣灰为所有人画上十字时^①，

^① 四旬斋也叫大斋节，封斋期一般是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40天。天教会举行涂灰礼，要把去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枝烧成灰，在礼仪中涂在教友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象征。——译者注

他们也这么说。

他们在祝福圣灰时说：
记住你是谁，将要回到哪儿去，
因为你之前是灰，
之后必定又变回灰。
不论你是贵族，贵妇或是强大君主，
你终会变成粉末和尘土，
只有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时间才真正开始。”

尸体对蛆虫说：
“天啊，天啊！现在我完全明白。
活着时我是多么无知和愚蠢，
骄傲透顶，目中无人。
因为出众的美貌，
我曾经太过骄傲，太过自负，太过愚蠢，
如此以尘世欢愉为乐，
觉得谁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成了蛆虫的臣民，
每天热情款待它们的忠实信使：
蜘蛛和虱子，还有其他虫子，
完全不知它们从何而来。
我真的再也说不了什么，
必须用耐心的隐忍武装自己，
永远谨守我主的意愿。”

蛆虫说：

“你的宽容不会得到我们的感激，
因为你自愿选择了这种生活。
凭着你高尚心灵的欲望，你应该记得，
《圣经》上说，
女人的美貌不过是虚荣，它转瞬即逝，
敬畏上帝的女人才被赞为神圣。”

尸体说：

“是啊，现在抱怨为时已晚，
只能期冀我主，万王之王的仁慈。
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而那些活着的人还有机会，
永远铭记那将要到来的时间。

他现在怎样，他将会如何：
无论男女和美丑，都要避免骄傲，
它常常给人带来灾难。
因为经文上的确说过，
要小心恶人制造的肉体诱惑。

对于我的抱怨，
请你们不要生气，
让我们成为朋友，尽管我刚发了脾气。
就像以前一样作邻居和爱人，
让我们亲吻着长相厮守，

直到审判日到来。
我要飞到上帝那里。

获得肉身的荣耀，
成为有福进入天堂中的一个，
我们有福的主，真正的保护者，
凭着对他的冥想，
我如他所愿来到那里。
阿门，阿门，此刻皆因你的仁慈。”

现在看见这一切的人说：
“当我从沉睡中醒来，
或者是睡眠中的冥想，
我把这个梦和奇特景象，
告诉了一位著名的圣人。
他嘱咐我努力回忆，真实记录，
语言尽量优美得体。

不仅带给读者消遣，
还有让人不安和触动的训诫，
让男男女女按照我主的要求，
把有害的一切世俗欲望抛在身后，
把我们的救世主唤入脑海，
把我们和他连在一起。阿门。”

来源：由玛格丽特·蒙特维尔德(Margaret Monteverde)译

自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的《尸体和蛆虫的争论》“Disputacioun Betwyx the Body and Worms.” *Archiv für deutsche Studien der neueren Sprachen* 167 (1935): pp. 30—35.

11. 寻找替罪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约 1349 年)

犹太人很早就参与了欧洲城镇的经济生活,他们一般为当地的基督徒提供信贷,成为后者的债权人。瘟疫与犹太人有关系的谣言从西班牙传到了德意志。在“忏悔”和各种所谓官方报告的支持下,原有的憎恨被火上浇油,于是无论是否债务人,恐慌的人们有了摧毁当地犹太社区的借口。宗教和世俗官员起先不愿看到本地犹太人被虐待,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无罪”,后来还是退缩了,任由暴徒行凶。对于熟悉耶稣受难故事的读者来说,他们扮演了彼拉多的角色。下文揭示了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动机,描述了这座莱茵河畔城市中犹太人的命运,并暗示了其他地方的情况。

文献 11

斯特拉斯堡的犹太人

选自《斯特拉斯堡编年史》,1349 年 2 月

1349 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死神从大地这端走到那端,从海的这边走到那边,撒拉逊人的死亡数字要超过基督徒。有的地方成了不毛之地。有的船上船员全部死亡,无人照看货物,任由它在海上漂泊。马赛一半的人丧生,包括主教以及众多教士和僧侣。在其他王国和城市中,死亡数字高得令人恐惧。阿维尼翁的教皇停止一切教廷会议,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禁止任何

人接近并总是在面前生着一堆火。面对瘟疫，所有睿智的老师和医生只能承认那是上帝的意志。它不仅发生在这里，也肆虐其他地方，持续了超过一整年。瘟疫是这年夏天降临斯特拉斯堡的，估计有约 1 万 6 千人死亡。

人们指控犹太人是瘟疫的罪魁祸首，他们被认为向水中和井里投毒，因此从地中海到德意志，许多犹太人都被烧死。但在阿维尼翁，他们得到教皇的保护。

在伯尔尼和祖芬根 (Zofingen, 瑞士北部城市)，一些犹太人在拷打下承认向许多井里投了毒。人们在井里找到了毒药，于是不少村镇里的犹太人都被烧死了。人们还把这件事通知了斯特拉斯堡、弗赖堡和巴塞尔，让那里的人也把犹太人烧死。不过这 3 座城市的当权者不相信这件事。于是巴塞尔市民来到市政厅前示威，迫使市议会同意烧死犹太人，并在今后 200 年里禁止犹太人进入城市。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被全部逮捕。1349 年 2 月 8 日，在班菲尔德 (Benfeld, 属阿尔萨斯) 召开大会，出席者包括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伯特霍尔德三世，该城所有的封建领主以及上述 3 座城市的代表。斯特拉斯堡的代表们被问及如何处理犹太人，他们回答说没有证据表明犹太人有罪。代表反问斯特拉斯堡市民，为何他们封锁井口，还把水桶藏起来。这引起了市民的满腔怒火和激烈抗议。最后，主教、领主和帝国城市一致决定消灭犹太人。在许多城市，犹太人被处以火刑。而被驱逐出城的则落入农民手中，然后被刺死或淹死。（想要保护犹太人的斯特拉斯堡市议会于 2 月 9—10 日被解散，新的议会向暴徒妥协，于是后者从周五，即 13 日开始逮捕犹太人。）

周日，即圣瓦伦丁节，他们在墓地中搭起的木台上对犹太人处以火刑，共处死约 2 000 人。同意受洗的被赦免（据说有约

1 000人受洗)。许多幼童被从火中拖出,在违背他们父母意愿的情况下接受了洗礼。对犹太人的债务被全部取消,犹太人被迫交出所有债权凭据。而议会则把犹太人的现金按比例分给了手工业者。钱才是犹太人被害的原因。如果他们很穷,封建领主又没有欠他们钱,犹太人是不会被烧死的。在忏悔神父的建议下,分到钱的一些手工业者把钱捐给了教堂。

不仅在斯特拉斯堡,这一年莱茵河畔的所有城市都发生了犹太人被烧死的事件,无论它们属于帝国还是领主,或是自由市。在有些地方,犹太人被处死前要接受审判,有些地方则完全没有。有些城市里的犹太人干脆点燃自家房屋自焚。

人们决定今后 100 年间禁止犹太人进入斯特拉斯堡。但仅仅过去 20 年,市议会和市长就同意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允许他们入城。公元 1368 年,犹太人回到了斯特拉斯堡。

来源:雅克布·马尔库斯(Jacob R. Marcus)《中世纪的犹太人史料集:315—1791》*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book: 315—1791*(New York: Atheneum, 1979), pp. 45—47.

12. 15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瘟疫

卢卡·朗杜齐(Luca Landucci, 约 1435—1516 年)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药剂师。他是个普通的行业公会成员,在一生中见证了多次瘟疫爆发。卢卡有 12 个子女,他并不富有,也没有很多社会关系。他于 1500 年前后开始写日记,开头部分实际是回忆录。卢卡死于佛罗伦萨,被葬在多明我会的新圣母修道院。他的观察细致,所记录的死亡人数非常可靠。1498 年 5 月,以宣扬改革,

预言末世的到来而闻名的多明我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以对佛罗伦萨人施加不良影响的罪名被处死。朗杜齐记录,就在萨沃纳罗拉身陷囹圄,两周后将被处决的同时,佛罗伦萨人开始把瘟疫患者赶出医院,甚至赶到城外。对许多人来说,两者都是对上帝犯下的可怕罪行。

文献 12

一位佛罗伦萨人的日记:1496 年 12 月—1499 年 2 月

卢卡·朗杜齐

1496 年 12 月 5 日

已经几个月没发现新病例了,但今天又发现一例。现在,对法国疖子(一种性病)的抱怨已经传遍佛罗伦萨及其周边,甚至意大利的各大城市,它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1497 年 6 月 1 日

许多人发热几天后就死了,有些是 8 天,有些是 10 天,有一个甚至只有 4 天。据说过去半个月各医院和全城共发现 120 个病例。还有人说死神已经降临医院,每 3 天就有 10 到 12 人死亡,在新圣母修道院最近有 24 人死亡。瘟疫还带来精神打击和身体的虚弱,穷人因此感觉麻木,许多人就这样死去。人人都说:“这是场诚实的瘟疫。”

6 月 13 日

今天月圆,在各医院和城中各处,一天内死了约 100 人。

6 月 28 日

据说每天有 68 人死于发热。

6 月 30 日

城里有几户人家爆发了瘟疫,在里科波利村(Borgo di Ricor-

boli)也有 8 家。

7 月 2 日

许多人死于发热和瘟疫。在新圣母修道院,一天内死亡 25 人。

7 月 3 日

更多人家感染了瘟疫,人人都在准备逃亡。现在一对小母鸡要 3 里拉,一对阉鸡要 7—8 个里拉。病人太多了。

7 月 8 日

粮食局将谷物价格限定在 35 索尔多。

7 月 9 日

(多明我会的)圣马可修道院爆发瘟疫,许多修士跑到父母或朋友家的乡间别墅避难。只有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带着几个修士留在圣马可。现在佛罗伦萨已经有 34 户人家出现瘟疫,许多人发烧。

7 月 16 日

佛罗伦萨有约 30 户人家发生瘟疫,还有许多人死于发热。我注意到所有死者都是一家之长而非儿童,年龄从 20 岁到 50 岁。看上去(萨沃纳罗拉)修士关于教会和世界被重建的预言要成真了。

7 月 20 日

许多穷人体力不支,倒在地上,每个钟点都有人用担架把他们送到医院,但抢救无效。

7 月 29 日

出现日食,许多人死于瘟疫和发热。有能力的人纷纷逃往乡下,城里人烟稀少。

8 月 15 日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圣帕格洛教堂(San Pagolo)教堂外的墓

园里,掘墓人正在埋葬尸体。有人的钥匙掉进了坟墓,他进去捡。墓穴里的臭味太厉害了,人们没来得及把他救出来,他已经死了。

10月18日

许多家族长和绅士死于瘟疫,但没有妇女和儿童。

10月19日

发现好几家有人死于瘟疫,市民们继续呆在乡间别墅里。

10月28日

在新市场(Mercato Nuovo)货币兑换商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靠墙的石凳子。今天有人发现上面坐了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用手遮住脸,仿佛想要睡觉。其实他已经死了,但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一动不动。后来有个学徒去碰了他一下,人们才发现他死了。尸体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没有人敢靠近,人们认为他死于瘟疫,就像之前的许多死者一样。

11月7日

迪科马诺(Dicomano,据佛罗伦萨东北25公里)爆发瘟疫。

11月15日

一天凌晨,有个姑娘被发现死在圣帕格洛医院的门廊下。照顾瘟疫病患的人发现了她,他们认为姑娘不是死于瘟疫,而是被勒死的……

1498年4月21日

许多人家发生瘟疫,斯卡拉街(Via della Scala)又有大约4户,我所在的圣潘克拉奇奥(San Pancrazio)附近有4户,最远的在特雷比奥十字(Croce al Trebbio)^①附近。两天内死了好几个

① 相传为了纪念维罗纳的圣佩特罗而建,顶部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形象。——译者注

人,因为正是上弦月。附近居民很紧张。

5月12日

卫生部门的官员把不幸的病人赶出医院。如果病人被发现留在市内,就会被赶出佛罗伦萨。他们甚至残忍到在盔甲公会门外安装了带滑轮的绞索,用来对付胆敢溜回来的人。这实在是残忍而无情的做法。

1498(或1499)年2月16日

最近瘟疫平息了,不再被提及。

来源:卢卡·朗杜齐《1450到1516年一个佛罗伦萨人的日记》*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 to 1516 by Luca Landucci*,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1927), pp. 114—66 passim.
爱丽丝·德·罗森·杰维斯(Alice de Rosen Jervis)编译。

注释:

- [1] 选译见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63—67.
- [2] 两人分别为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天文学家。
- [3] 指地水火风四种元素。
- [4] 一种被认为能像变色龙般改变颜色的鸟。
- [5] 见参考书目中的原始资料部分。
- [6] 根据上下文,我把 tenchrese 译为增减。在中古英语文学作品中,只有这里出现过该词
- [7] 不清楚是什么花。
- [8] 指他的子女全部死亡。

名词解释

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对天主教会机构和人员的不满甚至敌视的情绪,在黑死病结束后常常出现。

脓疮(Apostemata 或 Aposteme):中世纪常用来指淋巴结肿块。

占星学(Astrology):中世纪研究天体(特别是月亮、行星和恒星)对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国家和民族影响的学科。

杆菌(Bacillus):单细胞的杆状细菌。

淋巴结肿块(Bubo):词源在希腊语中指腹股沟。鼠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内部积聚了病菌和死亡的人体细胞。

腺鼠疫(Bubonic plague):由跳蚤传播的耶氏鼠疫菌引起,病菌在淋巴结积聚,导致其肿大。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如果不接受治疗,现代的死亡率为40%—60%。

梳毛工起义(Ciompi Revolt):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要求恢复瘟疫前的生产和工资水平,并在政府内拥有发言权。

共生(Commensal):与人类共享食物和生活空间的动物,如黑家鼠。

须知(Consilium):医生写给病人或其他医生的医学分析和建议。

传染(Contagion):通过身体接触传播疾病。

人口学(Demography):研究人口特点及其变化的学科。

代祷(Divine intercessors):天主教认为,死去的圣人进入天堂后与上帝在一起,他们能够说服上帝帮助地上的人。瘟疫期间,玛利亚、塞巴斯蒂安和罗赫是最常见的代祷者。

人群地方病(Endemic): 存在于特定人群中,为其成员共有的。

动物地方病(Enzootic): 存在于特定动物种群中,为其成员共有的。

流行病(Epidemic): 在特定人群中造成相当高比例影响的疾病。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研究流行病的医学分支。

动物流行病(Epizootic): 在特定动物种群中造成相当高比例影响的疾病。

最后涂油礼(Extreme unction): 罗马天主教为临终者举行的圣礼,包括最后的圣餐和忏悔。

鞭笞赎罪者(Flagellants): 为了祈求上帝宽恕人类的罪,世俗天主教徒组成游行队伍,他们鞭打自己或互相鞭打。该运动被教会和政治领袖镇压。

体液(Humor): 中世纪医学认为,人体内流淌着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液体,保持体液平衡是健康的关键。

影像学(Iconography): 研究艺术图像类型和文化含义的学科。

免疫力(Immunity): 生命体接触到有害物质却不受相应伤害的能力。

死亡率(Lethality): 人群中死于某一疾病的比列,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淋巴系统(Lymphatic system): 人体内运输淋巴液的管道系统。淋巴液是透明液体,它负责清理死亡细胞、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在腋下、腹股沟和颈部有淋巴结,有害物质将被集中到那里。

瘴气(Miasma): 被污染和有毒的蒸汽或空气,中世纪大多数医生认为瘟疫是由瘴气引起的。

发病率(Morbidity): 人群中感染某一疾病的比列,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生育主义(Natalism): 瘟疫结束后,为了恢复当地人口,社会对夫妻生育持鼓励态度,并成为公共政策。

公证人(Notary): 受过训练,被法律授权的书写员,他们为个人、行业公会和组织起草正式的契约、遗嘱和会议备忘。公证人常出现在临终者的床头。

大流行(Pandemic): 对大量人群都造成巨大影响的疾病爆发。历史学家承认的腺鼠疫大流行有三次,黑死病是第二次。

致病的(Pathogenic): 能对生命体造成巨大威胁的。

1381年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 为了恢复瘟疫前的劳动条件,反对增税,英国的穷苦农民和中产阶级向伦敦的进军。

瘟疫的病源地(Plague reservoir): 瘟疫病菌长期寄生的各种野生动物,它们生活的地方通常远离人类。

肺鼠疫(Pneumonic or Pulmonary plague): 耶氏鼠疫菌感染人类肺部引起的疾病。原发性肺鼠疫由患者吸入空气中的病菌引起,继发性肺鼠疫由被感染的跳蚤叮咬引起。死亡率接近100%。

迫害犹太人(Pogrom): 对犹太社区的暴力和破坏行动。

投毒谣言(Poison libel): 该谣言宣称犹太人向基督徒的井里投毒,它煽动了反犹情绪,导致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的犹太人被屠杀。

预防(Prophylaxis): 为防止疾病爆发或传播而采取的行动。

检疫(Quarantine): 隔离被怀疑具有传染性的人畜或物品。

黑家鼠(Rattus rattus): 大家鼠属的啮齿动物,被认为携带了传播腺鼠疫的跳蚤。

败血型鼠疫(Septicemic plague): 由跳蚤传播的耶氏鼠疫菌引起,患者出现败血型休克,死亡率接近100%。

劳工法条(Statute of Laborers):为了抑制瘟疫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1351年英国政府在《劳工法令》的基础上颁布了《劳工法条》,用来限制工人的流动性和工资水平。

禁奢令(Sumptuary laws):用以限制公开炫富的法令,因为过度炫耀浪费资源,还会引起妒忌。内容包括限定衣着的材料和样式,禁止在瘟疫期间举行奢华的葬礼,禁止下层民众穿着与上层阶级类似的服装。

酸果汁(Verjuice):中世纪常见的烹饪用酸性酱汁,能促进消化。瘟疫期间也被用来清洁房间。

毒性(Virulence):某生命体对其他生命体的伤害程度。

印度客蚤(Xenopsylla cheopis):寄生在家鼠身上,被认为是引起腺鼠疫的耶氏鼠疫菌的主要宿主。

鼠疫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腺鼠疫的病原体。公认的变种有古代型、中世纪型和东方型。1894年,亚历山大·耶尔森第一次分离出该病菌。

黄道十二宫(Zodiac):太阳在天空中运行轨迹上的十二个星座,被认为能对人和事件产生影响。它们是占星学这一中世纪伪科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人畜共患病(Zoonosis):通常出现在动物身上,但也能传染给人,如腺鼠疫。

参考书目指南

疾病史研究的一般性书目

- Cartwright, Frederick F. *Disease and History*.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72. 这位医学史专家从重大事件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等角度出发,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全方位的历史概貌。他对教会非常不满,认为它阻碍了中世纪医学知识的进步。
- Giblin, James Cross. *When Plague Strikes: The Black Death, Smallpox, AIDS*. New York: Harper, 1996. 该书面向年轻读者,它在古往今来各种人类疾病的背景下探讨了黑死病。但过于简单,导致有些内容不够准确。
- Karlen, Arno. *Man and Microbes: Disease and Plagues i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为多种人类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大致的背景知识。
- Kiple, Kenneth et al., eds. *Plague, Pox and Pestilence: Disease in History*. New York: Marboro Books, 1997. 收录了一系列涉及古往今来多种传染病疫情的文章,附精美插图。包括安·卡迈克尔对黑死病的综述,虽然简短但很有用。
- McNeill, William H.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5.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人类和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历史的部分有许多猜想,但第二次大流行史料确凿。
- Wills, Christopher. *Plagues: Their Origin, History, and Futur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讨论了多种疾病,有一章

特别关注了最新的生物和生态研究及其影响。

Zinsser, Hans. *Rats, Lice and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34. 总览了疾病和科学的历史。尽管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地方已经过时,但从中可以看到那一代人对黑死病成因和影响的看法。

关于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中世纪瘟疫的一般性书目

Aberth, John. *From the Brink of the Apocalypse: Crisis and Recover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介绍了 14 和 15 世纪战争、饥荒和瘟疫方面的概况,以及它们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Benedictow, Ole J. *Plague in the Late Medieval Nordic Countries: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slo: Middelalderforlaget, 1992. 详细研究了瘟疫的证据及其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影响,作者的结论是由老鼠传播的腺鼠疫而非天气原因是导致该地区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Biow, Douglas. “The Politics of Cleanliness in Northern Renaissance Italy.” *Symposium* 50(1996):75—86.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十分注重卫生,作者认为,这是出于瘟疫是由不洁引起的观点。

Britnell, R. H. “The Black Death in English Towns.” *Urban History* 21(1994):195—210. 英国城市对瘟疫的反应措施通常是由个人和教会,而非市政府做出的。

Cantor, Norman. *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World It Made*. New York: Harper, 2000. 通过一系

列有些离奇的案例阐述黑死病对人类的影响，并把它们同当时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和趋势联系起来。

Carmichael, Ann G.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专注于大瘟疫在佛罗伦萨造成的死亡和由此引发的法律和机构变革，探讨了对当地穷人的有效社会控制是如何实现的。

Corzine, Phyllis. *The Black Death*. San Diego: Lucent Books, 1997. 该书面向年轻读者，讨论了大瘟疫与当时生活的关系和对它的影响。附黑白插图。

Creighton, Charles.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nd ed. 2 vols. London: Cass, 1965. 是 1891 年的瘟疫史概况的更新版本。第一卷讨论了黑死病。医学方面的内容过时，但疾病影响的部分很有价值。

Dols, Michael W.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目前唯一一本关于中世纪晚期伊斯兰世界瘟疫的英语著作。Dols 讨论了瘟疫的传播、冲击和影响，内容覆盖广泛且不失详细。

Dunn, John M.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 San Diego: Lucent Books, 2000. 该书面向年轻读者，讨论了大瘟疫与当时生活的关系和对它的影响。附插图。

Getz, Faye Marie. "Black Death and the Silver Lining: Meaning,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Histories of Medieval Plagu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4 (1991): 265—89. 专注于现代对黑死病影响的各种解释，以及它们是如何受现代文化影响的。

Gottfried, Robert S.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从“生态学角度”研究黑死病及其复发,认为长达 300 年的黑死病时代是一次对欧洲人口影响广泛的“环境危机”。

Herlihy, David.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包括作者生前未出版的,于 1985 年在缅因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附导言和注释。在对大瘟疫做了广泛而具有批判性的概述之后,作者又对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和文化变革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Kelly, Maria. *A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 in Ireland.*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研究了黑死病对爱尔兰的盖尔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包含丰富的最新学术成果。

Naphy, William G., and Andrew Spic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History of Plagues, 1345—1730.* Stroud,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Tempus, 2001. 概述了中世纪的瘟疫以及艾滋病、疯牛病和天花等现代疾病,强调了人类对传染病反应的共性,以及 14 世纪瘟疫对后世的重要性。附精美插图。

Nardo, Don, ed. *The Black Death.*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1999. 收集了 11 位著名现代学者的论文摘要和翻译片段,包括本书参考文献中列出的 Horrox 的 *The Black Death* 中的部分内容。

Nohl, Johannes.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Translated by C. H. Clarke.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26; reprinted in abridged for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0. 对大瘟疫的主要方面和影响做了描述性综述,也包括一

些较为次要的方面,如“色情元素”、狂舞症和儿童朝觐等。引用了大量原始文献,但文献注解不佳。

Norris, John. “East or West? The Geographic Origin of the Black Death.”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1 (1977):1—24. 提出黑死病的源头并非通常认为的中国或中亚,而是俄罗斯南部。作者认为亚洲的瘟疫来自印度和缅甸,与西欧的爆发无关。文章引起了 Michael Dols 很有意思的回答以及 Norris 的反对,这两人的观点收录在同一刊物 1978 年第 52 期的第 112—120 页。

Ormrod, W. M., and P. G. Lindley, eds.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Stam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Paul Watkins, 1996. 收录了与英格兰瘟疫相关的社会、政治、宗教和建筑史方面的论文,特别是 14 世纪的。

Platt, Colin. *King Death: The Black Death and Its Aftermath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讨论了反复爆发的瘟疫对 14 世纪晚期和 15 世纪的英格兰社会和建筑史的影响,附精美插图。

Schamiloglu, Uli.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Role of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lden Horde.” *Central Asian Survey* 12(1993):447—57. 作者认为,虽然缺乏具体的文献证据,但黑死病的确对西方蒙古人分支的迁移产生了重大影响。

Shrewsbury, J. F. *History of Bubonic Plague in the British Is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研究了英格兰的黑死病及同时代的其他传染病,挑战了现代人认为高死亡率是由腺鼠疫造成的观点。

Steffensen, Jon. “Plague in Iceland.” *Nordisk medicinhistorisk*

arsbok(1974):40—55. 研究了 15 世纪爱尔兰肺鼠疫的编年史证据。

Williman, Daniel, ed. *The Black Death: The Impact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Plague*. 选自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第 11 届年会的论文集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Binghamton, NY: 1982. 包括关于艺术、文学、经济、伊斯兰教法和末世学的七篇论文。

Ziegler, Philip.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用英语写的欧洲黑死病标准历史,包括范围广泛的相关主题。

老鼠、跳蚤和腺鼠疫

Davis, David E. “The Scarcity of Rats and the Black Death: An Ecological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1986):455—70. 将老鼠排除出黑死病的图景,证明它们对瘟疫传播的作用既不明显也不必要。

Ell, Stephen R. “Immunity as a Factor in the Epidemiology of Medieval Plague.” *Review of Infectious Diseases* 6(1984): 866—79. 探讨了人类和动物的天然和后天免疫力在瘟疫的产生、人口产生影响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特别关注了铁在中世纪饮食里的作用,以及社会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的特征。

Ell, Stephen R. “The Interhuman Transmission of Medieval Plagu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4(1980): 497—510. 质疑了老鼠与它们身上的跳蚤对瘟疫传播的作用,

认为寄生在人身上的跳蚤才更可能是宿主。

Hendrickson, Robert. *More Cunning than Man: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Rat and Its Role in Hum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Kensington Books, 1983. 宽泛地讨论了人类和老鼠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黑死病的部分虽然有用但观点较传统,不如关于老鼠习性的部分。

Karlsson, Gunnar. "Plague without Rats: The Case of Fifteenth-century Ice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2 (1996): 263—84. 质疑了老鼠对传播瘟疫的必要性,推测冰岛的瘟疫是由一种毒性更强的菌株引起的肺鼠疫。

Lenski, R. E. "Evolution of Plague Virulence." *Nature* 334(11 August 1988): 473—74. 寄生在病源地动物身上的耶氏鼠疫菌株毒性较弱,但“某些点上的变异”使其变得毒性极强并引起了瘟疫。该书对这种理论做了简单介绍。

Marriott, Edward. *Plague: A Story of Science, Rivalry,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and the Scourge that Won't Go Away.* New York: Holt, 2002. 用小说的笔触详细重现了19世纪90年代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争相成为腺鼠疫菌发现者的故事。

Rackham, D. James. "Rattus rattu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lack Rat into Britain." *Antiquity: A Quarterly Review of Archaeology* 52(1979): 112—20. 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存在黑家鼠的考古学证据。

Raoult, Didier, et al.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Suicide PCR' of *Yersinia pestis* as the Agent of the Black Dea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97: 23 (Nov. 7, 2000): 12, 800—803. 对大瘟疫死者牙髓的研究报告,支持黑死病是由耶

氏鼠疫菌引起的观点。

对黑死病本质的新观点

Bleukx, Koenraad. "Was the Black Death (1348—49) a Real Plague Epidemic? England as a Case-study." 选自 *Serta devota in memoriam Guillelmi Lourdaux, II: Cultura mediaevalis* (Mediaevalia Lovaniensia, Studia 21), Werner Verbeke et al. 65—113.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通过解读原始文献,质疑了(腺鼠疫)从鼠到跳蚤再到人的“经典传播理论”,以及 14 世纪 40 年代英格兰人口减少的程度。

Cohn, Samuel K., Jr. "The Black Death: End of a Paradig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2002):703—38. 质疑了关于黑死病本质和影响的主流观点,简要介绍了下一书目的观点。

Cohn, Samuel K.,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在广泛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瘟疫的真相和医学知识提出了非常有趣的新观点。

Scott, Susan, and Christopher Duncan. *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身为动物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作者详细描述了黑死病的特征,特别是发生在英格兰的。他们的结论是瘟疫是类似埃博拉病的病毒性出血热。

Twigg, Graham. *The Black Death: A Biological Reappraisa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详细分析了经历过英格兰瘟疫的人对它的描述,否认它是腺鼠疫,认为炭疽是致死的主

要原因。

Twigg, Graham.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An Epidemiological Dilemma." In *Maladies et societe (XIIe-XVIIIe siec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Bielefeld, novembre 1986*, edited by Neithard Bulst and Robert Delort, 75—98. Paris: Editions du C. N. R. S., 1989. 质疑 1348 年的黑死病是腺鼠疫, 提出中世纪的疾病在季节、潜伏和传播特性上都不同于现代腺鼠疫, 两者的区别无法被忽视和解释。Twigg 认为炭疽是合理解释。

瘟疫与中世纪的医学

Barkai, R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Jewish Doctor from Spai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10(1995):49—63. 一位 1492 年被西班牙驱逐后前往伊斯坦布尔的犹太医生的简述。

Carmichael, Ann G. "Contagion Theory and Contagion Practice in Fifteenthcentury Milan." *Renaissance Quarterly* 44(1991):213—56. 表明否认传染可能性的医学理论是如何与日常观察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行为相矛盾的。

Chase, Melissa P. "Fevers, Poisons and Apostemes: Authority and Experience in Montpellier Plague Treatis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edieval Society*, edited by Pamela Long, 153—69.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85. 通过研究三代由蒙彼利埃大学培养的医生, 显示了从依赖传统权威向依赖自身经验和观察的转变。

Cipolla, Carlo M. "A Plague Doctor." In *The Medieval City: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S. Lopez*, edited by Harry A. Miskimin, David Herlihy, and A. L. Udovitch, 65—7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简述了帕维亚的公共医生文图拉的生平,比较了他和其他公共瘟疫医生的职责和薪水。

French, Roger. *Canonical Medicine: Gentile da Foligno and Scholasticism*. Boston: Brill, 2001. 详细讨论了詹蒂莱同经院医学及其实践的关系,特别是他对阿维森纳《医典》的评论。第六章讨论了黑死病。

Garcia-Ballester, Luis et al. , eds. *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包括关于占星学、犹太人的瘟疫须知、米兰政府的政策以及大学医生所著瘟疫须知的文章。

Henderson, John. "The Black Death in Florence: Medical and Communal Responses." In *Death in Towns*, edited by Steven Bassett, 136—50.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作为与 Carmichael 的米兰案例的对照,Henderson 认为佛罗伦萨人的医学理论认同传染的可能性,公众的反应体现了这种被大众和专家接受的观点。

Jacquart, Danielle. "Theory, Everyday Practice, and Three Fifteenth-century Physicians." In *La Science medicale occidentale entre deux renaissances (XIIe s.—XVe s.)*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567), edited by Danielle Jacquart, Essay XIII, 140—60. Aldershot: Variorum, 1997. 作者认为,黑死病之后的一个世纪内,医学理论和实践几乎没有变化。

Lemay, R. "The Teaching of Astronomy at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of Paris." *Manuscripta* 20(1976):197—217. 将中世纪的医学研究同天文学和占星学研究联系起来。

Ober, W. B., and Alloush, N. "The Plague at Granada 1348—1349; Ibn Al-Khatib and Ideas of Contagion." In *Bottoms Up!: A Pathologist's Essays on Medicine and the Humanities*, edited by Ober, 288—93.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这篇标题别扭的文章概括了安达卢西亚的医生和官僚哈提卜的生平和他对传染的看法。

Palmer, R. "The Church, Leprosy and Plague." In *The Church and Healing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19[1982]):79—99. 比较了宗教和医学界的反应,特别关注了意大利城市。

Singer, Dorothy W. "The Plague Trac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History of Medicine)* 9: 2 (1915—16):159—212. 虽然年代久远,仍不失为对14世纪重要医学须知内容的非常有用的摘要。

瘟疫的死亡数字——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

Blockmans, Wim P.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Plague in the Low Countries: 1349—1500."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Belgisch Tijdschrift voor Filologie en Geschiedenis* 58(1980):833—63. 质疑了低地国家在黑死病中损失较轻的传统看法,研究了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黑死病的特征和影响。

Cazelles, Raymond. "The Jacquerie." In *The English Uprising of*

1381, edited by R. H. Hilton and T. H. Aston, 74—8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作者认为,发动法国 1358 年这次起义的并非农民,而是更高等级的乡民。起义是因黑死病而提速的社会潮流的反应。

Dyer, Christoph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to the Rural Revolt of 1381.” In *The English Uprising of 1381*, edited by R. H. Hilton and T. H. Aston, 9—4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研究了 1381 年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和参与者,特别是黑死病爆发后,乡村精英同领主间激化的矛盾。

Emery, Richard W.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in Perpignan.” *Speculum* 42(1967):611—23. 作者由公证记录得出结论,认为虽然瘟疫造成大量死亡并对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社会秩序未受很大破坏。

Gyug, Richard. “The Effects and Extent of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New Evidence for Clerical Mortality in Barcelona.” *Mediaeval Studies* 45(1983):385—98. 详细研究了关于教士死亡的教会记录。

Harvey, Barbara. *Living and Dying in England, 1100—15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详细研究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僧侣团体,包括医疗以及黑死病对修道院成员数量的影响。

Hatcher, John. *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London: Macmillan, 1977. 在不长的篇幅内详细研究了英格兰长期的人口减少,认为衰退主要是由黑死病的一再爆发造成的。

Henneman, John B., Jr. "The Black Death and Royal Taxation in France, 1347—1351." *Speculum* 43(1968):405—28. 研究了法国人口减少和政府收入下降的财政影响。

Langer, Lawrence N. "The Black Death in Russia: Its Effects upon Urban Labor."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 (1975):53—67. 研究了14世纪50年代俄罗斯城市因农村人口进入而出现的复兴。

Langer, Lawrence N. "Plague and the Russian Countryside: Monastic Estates in the Lat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Canadian American Slavic Studies* 10(1976): 351—68. 研究了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

Livi Bacci, Massimo.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Cynthia and Carl Ipsen. New York: Blackwell, 1999. 在第四章,人口学家 Livi Bacci 讨论了多种疾病在早期现代欧洲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大瘟疫及其影响。

Lomas, Richard. "The Black Death in County Durham."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5(1989):127—40. 关注了利用主教堂的佃户记录来确定瘟疫死亡人数时遇到的问题。

Megson, Barbara E. "Mortality among London Citizens in the Black Death." *Medieval Prosopography* 19(1998):125—33. 简要概括了大瘟疫第一次爆发对人口的影响。

Poos, Larry. *A Rural Society after the Black Death: Essex, 1350—15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关注了婚姻、移民、就业、社会动荡和宗教分歧是如何受瘟疫和其他历史因素影响的。

Smail, Daniel Lord. "Accommodating Plague in Medieval Mar-

seille." *Continuity and Change* 11(1996): 11—41. 利用公证档案勾画了移民、婚姻、债务、财产转移和法律服务等一系列问题的概况。

Smith, Richard M.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Rural England, 1300—1348." In *Before the Black Death*, edited by Bruce M. S. Campbell, 25—79.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如果要将瘟疫同瘟疫前已经存在的影响英格兰人口的因素区分开来,这本书是非常好的研究出发点。

文化、社会和宗教影响

Bernardo, Aldo S. "The Plague as Key to Meaning in Boccaccio's *Decameron*." In *The Black Death: The Impact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Plague*, edited by Daniel Williman, 39—64. Binghamton, N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82. 研究了薄伽丘向读者传达的道德观点,特别是人生的无常,故事集通过对瘟疫的大量写实描写表达了这一点。

Bowsky, William. "The Impact of the Black Death upon Sienese Governmen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209 and Society." *Speculum* 39(1964): 368—81. 详细研究了意大利锡耶纳的社会各阶层与市政府是如何受重大死亡影响的,以及权力的更迭。

Cohn, Samuel K. *The Cult of Remembrance and the Black Dea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hn 从自己对意大利遗嘱的研究得出结论,1362 年瘟疫第二次爆发导致了传统的虔诚和家庭观念的消亡。作者把瘟疫同

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赞助人对个人和家庭的重视联系起来。

Courtenay, William J. "The Effects of the Black Death o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Speculum* 55(1980):696—714. 英语世界唯一一篇关于瘟疫对大学影响的研究。

Dohar, William J. *The Black Death and Pastoral Leadership: The Diocese of Herefor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研究了英国教会及其领袖是如何挺过历次瘟疫爆发的,作者的结论是大瘟疫对赫里福德郡教会的机构和运作的负面影响处于可控范围。

Mate, Mavis E. *Daughters, Wives and Widows after the Black Death: Women in Sussex, 1350—1535.*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1998. 作者质疑了主流观点,认为 1348 年瘟疫对女性的法律、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Palmer, R. C. *English Law in the Age of the Black Death, 1348—1381: 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and Law.*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研究了黑死病期间,王室是如何同教会、上层贵族和乡绅阶级联合,利用王家法条稳定社会下层阶级,从而获得对国家更大控制的。

Powell, James M. "Crisi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12(1984):201—24. 将地价下降同财富更多集中到欧洲上层贵族手中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英格兰世俗文化兴起的原因。

Shirk, Melanie V. "The Black Death in Aragon, 1348—1351."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7(1981):357—67. 以 1348 到 1384 年间已出版的文件为基础,作者简单研究了瘟疫对阿拉贡王室以及当地行政机构和经济的影响。

Shirk, Melanie V. "Violence and the Plague in Aragon, 1348—1351." *Journal of the Rocky Mounta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ssociation* 5(1984): 31—39. 关注了因阿拉贡的行政及司法机构被破坏导致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犯罪。

Tangherlini, Timothy R. "Ships, Fogs, and Traveling Pairs: Plague Legend Migration in Scandinavi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1(1988): 176—206. 研究了斯堪的纳维亚民间对于14和15世纪瘟疫传播的最常见的解释。

Wenzel, Siegfried. "Pestilence and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Friar John rimestone's Poems on Death." In *The Black Death: The Impact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Plague*, edited by Daniel Williman, 131—59. Binghamton, N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82. 研究了14世纪晚期的约翰修士在诗歌中表达的观点,即黑死病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结果。

Zguta, Russell. "The One-day Votive Church: A Religious Response to the Black Death in Early Russia." *Slavic Review* 3 (1981): 423—32. 讨论了瘟疫期间俄罗斯人在一天内建起一座礼拜堂的事件。

屠杀犹太人和鞭笞赎罪运动

Cohn, Norma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将14世纪中期的鞭笞赎罪者同此前的类似运动、反教权极端主义以及反犹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

- Foa, Anna. *The Jews of Europe after the Black Death*. Translated by Andrea Grov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将欧洲反犹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关注了直到 1900 年前后它对犹太人生活的影响。既从历史先例的角度看待 1348 到 1350 年的事件,也探讨了这些事件对此后犹太社区发展的影响。
- Guércherberg, Seraphine.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lleged Sowers of the Black Death in the Contemporary Treatises on Plague.” In *Change in Medieval Society: Europe North of the Alps, 1050—1500*, edited by Sylvia Thrupp, 208—24.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5. 描述了对犹太人向井中投毒传言的不同反应,英译本较法文原版有大量删节。
- Kieckhefer, R. “Radical Tendencies in the Flagellant Movement of the Mi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211 Four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4(1974): 157—76. 研究了后期鞭笞赎罪运动背后的激进反教权主义、反犹主义和其他导致它最后被教会镇压的原因。
- Lerner, Robert E. “The Black Death and Western Eschatological Mentalit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 (1981): 533—52; also in *The Black Death: The Impact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Plague*, edited by Daniel Williman, 77—106. Binghamton, N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82. 在历史大背景下研究了欧洲人对末世的恐惧,将它视为对黑死病的道德反应,而非对即将到来的末世本身的恐惧。
- Rowan, Steven W. “The Grand peur of 1348—49: The Shock Wave of the Black Death in the German Southwest.” *Journal of the Rocky Mounta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ssociation*

tion 5(1984):19—30. 将 1348—1349 年的大屠杀放到德意志西南部的反犹主义这一大背景下, 将这一大众暴力及其传播特征同法国 1789 年的“大恐怖”作了比较。

瘟疫和艺术

Boeckl, Christine. *Images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纵览了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与瘟疫有关的二维图像, 把它们同历史事件和趋势以及文学作品联系起来。附精美插图。

Cole, Bruce. “Some Thoughts on Orcagna and the Black Death Style.” *Antichità viva* 22(1983):27—37. 通过关注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教堂中的斯特罗奇礼拜堂的装饰和功能, 修正了迈斯关于黑死病对 14 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绘画之影响的解释。

Friedman, John B. “‘He hath a thousand slain this pestilence,’ Iconography of the Plagu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In *Social Unres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edited by Francis X. Newman, 75—112. Binghamton, N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86. 介绍了瘟疫图像的演变, 特别是宗教和科学思想对它的贡献。简单但内容丰富。

Lindley, Phillip. “The Black Death and English Art: A Debate and Some Assumptions.” In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edited by W. M. Ormrod and P. G. Lindley, 125—46. Stam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Paul Watkins, 1996. 少见的以 1350 年后英国艺术为题的文章, 提出艺术与建筑的质量和风

格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Marshall, Louise J. "Manipulating the Sacred: Image and Plague in Renaissance Italy." *Renaissance Quarterly* 47 (1994): 485—532. 将大量出现的代祷圣人的艺术形象同大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联系起来。Marshall 认为它们表达了对有效精神保护者的信心,而非面对恐惧的无助。

Meiss, Millard. *Painting in Florence and Siena after the Black Death: The Art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这篇论文讨论了黑死病对托斯卡纳绘画的主题和形式的影响。虽然已经过时且有争议,但它是后世相关研究的出发点。

Neustatter, Otto. "Mice in Plague Pictures." *The Journal of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4(1941):105—14. 研究了与瘟疫相关绘画中出现的老鼠形象,但认为古人把它们当作预警而不是瘟疫的原因。

Norman, Dia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Art and Religion after the Black Death." In her *Siena, Florence and Padua, I: Art, Society and Religion 1280—1400. Interpretative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7—96. 综合了该领域的最新观点,作者从艺术品的质量以及赞助人的品位和精神需求着眼,探讨了瘟疫对艺术的影响。

Polzer, Joseph. "Aspects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Iconography of Death and the Plague." In *The Black Death: The Impact of the Fourteenth-century Plague*, edited by Daniel Williman, 107—30. Binghamton, N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 1982. 罗列了与黑死病相关的主要艺

术主题,包括瘟疫圣人和死神形象。附图。

Schiferl, Ellen. "Iconography of Plague Saints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ian Painting." *Fifteenth Century Studies* 6 (1983): 205—25. 概述了主要的圣人和主题。

Steinhoff, Judith. "Artistic Working Relationships after the Black Death: Sienese Compagnia, c. 1350—1363." *Renaissance Studies* 14 (2000): 1—45. 将瘟疫结束后锡耶纳绘画质量的“倒退”归因于大量艺术家和赞助人的死亡以及艺术家工作室组织方式的变化。

Van Os, Henk. "The Black Death and Sienese Painting: A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Art History* 4 (1981): 237—49. 作者赞同迈斯的观点,认为1348年后锡耶纳的绘画风格发生了变化,但将其归因于赞助人而非宗教情感的改变。

瘟疫在欧洲结束的原因

Appleby, A. B.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lague: A Continuing Puzzl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 (1980): 161—73. 很好的对各种主要理论的概述。

Konkola, Kari. "More Than a Coincidence? The Arrival of Arsenic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y of Medicine* 47 (1992): 186—209. 作者提出,17世纪晚期工业砷被大量生产和突然被广泛用作毒鼠药是瘟疫在西欧和中欧消失的原因。

Slack, Paul.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gue: An Alternative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4 (1981): 469—76. 此文是

对 Appleby 的回应,将瘟疫传播受到控制归功于检疫和贸易限制。

原始文献

Bartsocas, Christos. “Two Fourteenth Century Greek Descriptions of the ‘Black Deat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1(1966):394—400. 讨论并出版了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馆长 Nicephoras Gregoras 和拜占庭皇帝 John VI Cantacuzenos 对黑死病的两段描述的英译。

Boccaccio, Giovanni. *The Decameron.* Trans. Mark Musa and Peter Bondanella. New York: Norton 1977. 薄伽丘《十日谈》的序言生动描绘了瘟疫第一次爆发时人们的感受和反应。

Duran-Reynals, M. L., and C.-E. A. Winslow, “Jacme d’Agramont: *Regiment de preservacio a epidemia o pestilencia e mortaldats.*”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3(1949): 57—89. 1348 年加泰罗尼亚语瘟疫须知的英译,无注释。

Froissart, Jean. *Chronicles.* Trans. Geoffrey Breret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包括《编年史》中 1348 到 1349 年关于黑死病和鞭笞赎罪者的重要内容。

Horrox, Rosemary, ed.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收集了 128 份原始文献或摘录的英译,大部分是 14 世纪英国的。按主题或类型排列,每部分都有非常有用的介绍。

Johannes de Ketham. *The Fasciculus Medicinae.* Translated by Luke DeMaitre. Birmingham: The Classics of Medicine Li-

brary, 1988. 1493 年版德意志医学教科书的英译, 翻译质量上佳。附原插图。

Marcus, Jacob R.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79. 包括 1348 到 1349 年间与犹太人受迫害相关的三份文献。

Pickett, Joseph P. “A Translation of the *Canutus Plague Treatise*.” In *Popular and Practical Science of Medieval England* (Medieval Texts and Studies, 11), edited by Lister M. Matheson, 263—82. East Lansing, MI: Colleagues Press, 1994. 15 世纪中期对一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医学论文的翻译, 原文采纳了蒙彼利埃的“匿名行医者”的观点。

有用的工具书

Bynum, W. F., and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 vol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有用的工具书, 既有关于医学文化的较宽泛条目(如“中医”), 又有对研究黑死病的学生有用的较具体条目。

Kiple, Kenneth,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很好的工具书, 不仅详述了不同文化对待疾病的态度, 也有关于具体疾病的内容(如“腺鼠疫”和“黑死病”)。

Kohn, George C. *Encyclopedia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1. 范围广泛的各类主题的简短条目, 包括第二次大流行的具体阶段。

Strayer, Joseph.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Scribner, 1989. 标准的中世纪参考工具书。

录影带和 DVD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5: King Death. A & E Home Video.

2000. 60 minutes. VHS. 历史学家 Simon Schama 在英国史这个大得多的背景下探讨了瘟疫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History's Turning Points, Volume 3: Black Death/Siege of Constantinople/Conquest of the Incas. Transatlantic Films. 2002. 75 minutes. DVD. 这部纪录片用戏剧化的手法激发人们对瘟疫事件的恐惧和感伤。从瘟疫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出发, 对它做了探讨。

Medieval London: 1066—1500. Films for the Humanities.

1991. 20 minutes. VHS. 在中世纪伦敦历史的背景下简单提到了黑死病。

Scourge of the Black Death. History Channel Films. c. 2000.

50 minutes. VHS. 展现了从古至今人类同腺鼠疫的斗争。

The Seventh Seal. Home Vision Entertainment. 1958. 90 minutes. VHS/DVD. 由英格玛·伯格曼指导, 电影以瘟疫后的德意志为背景。片中死神偷偷跟踪骑士并同他下棋, 目的是获得杀死他和他所有同伴的权力。

Two Thousand Year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7: Heresy, War, and the Black Death: Christianity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Films for the Humanities. 1999. 48 minutes. VHS. 将黑死病和与之相关的对犹太人的迫害置于西方中世纪晚期的宗教和社会背景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3 4 7 □□
2. □□□□□□□□□□□
3. □□□□□□□□□□□□□□□ 1 3 4 8 □□
4. □□□□□□□□□□ 1 3 4 8 □□
5. 1 5 □□□□□□□□□□□□□□□□□
6. □□□□□□□□ 1 4 4 7 □□
7. □□□□□□□□□□□□□□□□□ 1 3 4 8 □□
8. □□□□□□□□□□□□□□□□□□□□□□ 1
3 4 8 □□
9. □□□□□□□□□□□□□□□□□□□ 1 4 □□ 9
0 □□□
10. 1 5 □□□□□□□□□□□□□□□□□
11. □□□□□□□□□□□□□□□□□□□ 1 3 4 9 □
□
12. 1 5 □□□□□□□□□□
□□□□□
□□□□□

□□□□□□□□□□□□
□□□□□□□□□□□□□□□□
□□□□□□□□□□□
□□□□□□□□□□□
□□□□□□□□□□□
□□□□□□□□□□□
□□□□□□□—□□□□□□□□□□
□□□□□□□□□□□
□□□□□□□□□□□
□□□□□□□
□□□□□□□
□□□□□□□
□□□□DV D